

技术官僚的挑战

民主化

本书首次全面研究技术官僚制如何挑战代议制民主，并探讨技术官僚政治如何削弱民主合法性。其对民主制度的挑战强度如何？

本书系统阐述了技术官僚政治的理论框架与概念体系，并通过实证研究，从国家及超国家层面的各类机构与行为体（包括内阁、政党、欧盟、独立机构、中央银行以及直接民主运动）展开多维度分析。研究采用比较政策视角，深入探讨精英主义、精英统治、去政治化、效率主义、中立性、科学依赖性以及对政党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质疑等议题，剖析这些因素在与民主响应机制、问责制度、公民参与及多元竞争相冲突时产生的影响。在当前民主危机背景下，本书评估了技术官僚主义批判对代议制机构的冲击——这些机构被认为难以应对复杂且具有全球性的挑战。该研究分析了对有能力且负责的政策制定的需求，同时结合了民众对专家的民粹主义式抵制。

本书将对比较政治学、政治理论、政策分析、多层级治理领域的学者与学生，以及在官僚机构、媒体、智库和政策制定机构工作的从业者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ri Bertsou是瑞士苏黎世大学比较政治学博士后研究员。

丹尼尔·卡拉马尼是瑞士苏黎世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

路德奇社会政治精英研究

谁是统治世界的精英？本书系列深入剖析精英群体的构成、其兴衰轨迹、运作网络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系列编辑：基思·道丁与帕特里克·杜蒙特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

政治与经济危机中的部长生存 内阁改组

外交、外交政策与战争

亚历杭德罗·基罗兹·弗洛雷斯

Government Formation 和 Minister Turnover

在总统内阁中

美洲比较分析

由 Marcelo Camerlo 和 Cecilia Martinez-Gallardo 编辑

危机时代的政治家选择

由Xavier Collier、Guillermo Cordero和

安东尼奥·M·海梅·卡斯蒂略

国家政治精英、欧洲一体化与 欧元区危机

由Nicolo Conti、Borbala Goncz和Jose Real-Dato编辑

半总统制、议会制与总统制

中欧的总统政治

Milos Brunclik和MichalKubat

政治精英的争议地位

十字路口

由Lars Vogel、Ronald Gebauer和Axel Salheiser编辑

技术官僚对民主的挑战

由Eri Bertsou和Daniele Caramani编辑

有关本系列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www.routledge.com/Routledge-Research-on-Social-and-Political-Elites/book-series/RRSPE>

技术官僚制 对民主的挑战

编辑者

Eri Bertsou 和 Daniele Caramani

2020年首次发表
由劳特利奇出版

2 英国奥克斯顿郡阿宾顿米尔顿公园广场，邮编

OX14 4RN，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

52 纽约州纽约市范德比尔特大道，邮编10017

劳特利奇是泰勒弗朗西斯集团旗下的一个出版品牌，该集团为英美资讯集团 (Informa) 旗下企业。

© 2020 选编与编辑内容，Eri Bertson 和 Daniele Caramani；各章节，贡献者

根据1988年《版权、设计与专利法》第77条和第78条规定，埃里·贝尔苏 (Eri Bertson) 与达尼埃莱·卡拉马尼 (Daniele Caramani) 享有其编辑材料署名权及各章节作者署名权。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商书面许可，本书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机械或其他现有或未来发明的手段，如复印、录音，或任何信息存储与检索系统）进行重印、复制或使用。

商标声明：产品或公司名称可能是商标或注册商标，仅用于识别和解释，无意侵权。

出版物数据在英国图书馆编目中的应用

该书的目录记录可在大英图书馆查阅

国会图书馆出版物编目数据

姓名：Bertson, Eri，编辑。| Caramani, Daniele，1968年编。

《技术官僚对民主的挑战》/ 由埃里·贝尔苏与达尼埃莱·卡拉马尼合编
描述：英国牛津郡阿宾登；美国纽约州纽约市：劳特利奇出版社，2020年。| 包含参考文献及索引。

标识符：LCCN 2019052665（纸质版）| LCCN 2019052666（电子书）| ISBN9780367358280（精装版）| ISBN9780429342165（电子书）

主题：LCSH：民主。| 技术统治。| 技术与国家。分类：LCCJC423.T347 2020（印刷版）| LCCJC423（电子书）| DDC 321.8--dc23

LC记录可在<https://lcn.loc.gov/2019052665>获取

电子书可从<https://lcn.loc.gov/2019052666>获取

ISBN: 978-0-367-35828-0（精装本）

ISBN: 978-0-429-34216-5（电子书）

Times New Roman 字体

由Lumina Datamatics Limited公司提供

目录

图目录	vii
表格列表	viii
贡献者列表	x
前言和致谢	羟丙基
缩略语	十七
导论:技术官僚对民主的挑战	1
丹尼尔· CARAMANI	
第一部分	
概念和理论	27
1 技术官僚制与政治理论	29
克里斯托弗· BICKERTON 和 卡洛· INVERNIZZI ACCETTI	
2 新自由主义技术官僚制:对民主的挑战	
自治	44
IGNACIO SANCHEZ-CUENCA	
3 技术统治与去政治化	61
PIER DOMENICO 托尔托拉	
4 技术官僚的反应性	75
REINOUT 范德维尔	
5 技术官僚制的测量	91
ERI BERTSOU 和 DANIELE CARAMANI	

第六章 目录	
第 II 部分	
机构、行为者和政策	111
6 技术官僚内阁	113
马可 VALBRUZZI	
7 内阁中的技术官僚及其政策效应	131
DESPINA ALEXIADOU	
8 欧洲谈判中的技术官僚内阁	148
西尔瓦娜· TARLEA 和 STEFANIE · 贝勒	
9 话语中的技术统治:直接民主的个案	164
让· NAVA, 米格尔·安赫尔· CENTENO 和拉里· LIU	
10 技术统治与政策过程	183
克莱尔·A· 邓洛普与克劳迪奥·M· RADAELLI	
第 III 部分	
比较视角	197
11 技术官僚与民主合法性之间的欧盟	199
玛丽娜·科斯塔·洛博与伊恩· MCMANUS	
12 拉丁美洲技术统治:稳定与变革	
民主赤字	216
爱德华多· DARGENT	
13 中欧/东欧技术官僚制及其影响	
民主化	232
乔舒亚·A·塔克与简· ZILINSKY	
技术统治与民主:朋友还是敌人?	247
ERI BERTSOU	
附录	271
参考文献	279
索引	312

轮廓

I.1	代议民主、技术官僚与民粹主义的三角关系	20
4.1	技术官僚行政与环境的战略互动	81
5.1	对治理专家的态度	102
5.2	西欧政府的党性——1945-2012	104
5.3	中央银行独立性:经合组织国家的中央银行独立性指数	106
6.1	技术官僚制概念的图形化构型	
	径向分类	115
6.2	欧盟28个成员国政府技术官僚主义程度（%），1945–2018年	128
7.1	财政和社会事务部长的专业背景	138
7.2	技术官僚财政部长预测的经济改革数量	143
9.1	政权的三维类型学	168
9.2	两个活动每月新闻更新次数	171
9.3	语料库中主题流行度及热门主题词	173
9.4	不同竞选活动的主题流行度差异：欧洲地区显著高于英国脱欧阵营	174
9.5	“团体支持竞选”主题下的竞选用词选择	176
9.6	“成本”议题下的世界选择	177
9.7	“运动”主题下不同竞选活动的选词策略	178
9.8	主题19与20的局部内容差异	179
10.1	拓展认识模式	188
10.2	将知识模式概念化为政策学习	192
11.1	“欧盟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解决经济和金融危机最有效的机构”：持此观点的比例	
	（EMU平均值与 GIIPS 平均值对比，2009–13年）	207

表格

3.1	技术统治与去政治化:一个统一的概念框架	73
5.1	技术官僚政治研究的类型学	95
5.2	精英档案分类	97
5.3	技术官僚话语分析代码手册（节选）	99
6.1	“技术官僚类别”的类型学	117
6.2	1945-2018年欧盟28个成员国技术官僚主导的政府	120
6.3	非看护者技术官僚领导的政府及其政策	124
6.4	技术官僚型政府的类型学	125
6.5	1945-2018年欧盟28个成员国技术官僚主导型政府类型	127
7.1	财政与社会事务部门技术官僚与专家任职频率（1980-2012年）	139
7.2	技术官僚型财政部长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	141
7.3	社会福利改革中社会事务部长的作用	142
7.4	财政部长在公共社会支出、老年养老金和卫生方面的作用	144
7.5	财政部长在公共社会支出、养老金和卫生方面的作用	145
7.6	经验丰富的财政部长在公共社会支出、老年养老金和卫生方面的作用	146
8.1	欧洲危机时期技术官僚政府名单	149
8.2	2010-2015年欧洲货币联盟改革谈判期间政府的平均立场	154
8.3	欧盟部长理事会的拒绝和正式声明	156
8.4	技术官僚政府上台后推行的不受欢迎的改革	158
9.1	深入讨论的主题	175
10.1	认知学习的退化	189
10.2	专家的可能作用	193
11.1	支持技术官僚作为欧元区危机管理者（2009-2014年）	206
11.2	GIIPS 国模型	209
11.3	接受政府救助国家的中心效应与左侧效应（2010年、2014年）	212

13.1	主要结果:技术官僚制的政府评价与经验	240
13.2	关于政府绩效提升的若干思考	241
13.3	对威权主义的开放性（LiTS数据）	242
	A.1 问题清单（第8章）	271
A.2	主题模型结果：按估计概率排序的前20个术语，所有主题（第9章）	273
A.3	表13.1的完整模型规范：政府评估与技术官僚制经验（第13章）	276
A.4	表13.2的完整模型规范：关于政府绩效改进的观点（第13章）	277

贡献者

Despina Alexiadou是格拉斯哥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的校长研究员。她是《意识形态家、党派人士和忠诚者: *Parliamentary Cabinets* 的部长和政策制定者》(2016)的作者。她曾在《牛津研究百科全书》和《欧洲政治研究杂志》上发表过关于技术官僚制的文章。

斯特凡妮·拜勒是政治学教授。她任职于巴塞尔大学。研究领域涵盖欧洲及国际层面的决策机制、西欧议会的议员角色与议会生涯,以及欧盟与国际组织的谈判实践。其研究成果已发表于多本学术期刊。

Eri Bertsou是苏黎世大学比较政治学博士后研究员。她曾在《*西欧政治*》(2017)和《美国政治科学杂志》(即将出版)上发表关于公民技术官僚态度的文章。她的研究聚焦于欧洲比较政治行为,具体涉及公民对民主与技术官僚制的态度、政治信任、代表权及党派倾向。

克里斯托弗·比克顿是里德in 现代欧洲。他是剑桥大学皇后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和研究员。他著有《*欧洲联盟外交政策: 从实效性到功能性*》(2011年)、《*欧洲一体化: 从民族国家到成员国*》(2012年)和《*欧洲联盟: 公民指南*》(2016年)。在《*技术统治*》一书中,他写道 牛津手册关于民粹主义(2017)和《*国际社会与政治哲学批判性评论*》(2015)。

达尼埃莱·卡拉马尼 is Professor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Zurich. 他是选区选举档案馆(Clea)的联合主任,著有《*政治的国家化*》(2004年)和《*政治的欧洲化*》(2015年),并编辑了教科书《*比较政治学*》(2020年,第五版)。关于技术官僚制,他曾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2017年)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还有一篇即将发表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上的文章。

米格尔·安赫尔·森特诺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穆斯格雷夫社会学教授。他是《理性中的民主：墨西哥技术官僚革命》（1994年）的作者，《拉丁美洲的专家政治》（1998年）的编辑，并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关于技术官僚制与拉丁美洲的文章。

玛丽娜·科斯塔·洛博现任里斯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同时担任该所民主质量观察站主任及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她目前是欧洲研究委员会（ERC）“枫树”巩固项目（聚焦欧元区危机政治化研究）的首席研究员，也是葡萄牙选举研究项目的创始成员之一。其研究领域涵盖领导人在选举行为中的作用、经济投票机制、政党与制度等方向。其最新著作《人格政治：领导人与民主选举》（2015年）由她与约翰·柯蒂斯合编出版。

爱德华多·达让特是秘鲁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公共政策、发展国家的民主化与国家关系。其学术成果发表于多本学术期刊，2015年出版的专著《拉丁美洲技术统治与民主》广受学界关注。

克莱尔·A·邓洛普现任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政治学教授。作为公共政策与行政管理领域的学者，她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专业知识与知识运用的政治学、知识共同体与咨询政治、风险治理、政策学习与分析、影响评估及政策叙事等方向。她近期与克劳迪奥·M·拉达埃利、菲利普·特雷恩合编的专著《公共政策中的学习：分析、Modes 与 Outcome》（2018年）已出版发行。其研究成果发表于多本学术期刊，同时担任《公共政策与行政》期刊主编。

卡洛·因韦尔尼齐·阿切蒂现任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政治学副教授，同时担任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欧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其著作包括《Relativism 与 Religion》（2015年）和《什么是基督教民主？政治、宗教与意识形态》（2019年）。在技术官僚制领域，他参与撰写了《牛津民粹主义手册》（2017年）和《国际社会与政治哲学批判评论》（2015年）等学术著作。

Larry Liu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研究生。本书中由他共同撰写的章节是他的首篇学术论文。

伊恩·麦克马纳斯现任马尔伯勒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他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员、里斯本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并获得德国学术交流服务局（Otto Suhr政治科学研究所，自由大学）的博士研究资助。

柏林大学)。其研究兴趣包括福利国家政治、社会不平等、政党与制度、政治极化及公众舆论。

让·纳瓦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研究生，现任数据科学家。其研究领域涵盖话语分析、叙事研究、情感分析及政治经济学。他主要研究葡萄牙与拉丁美洲的发展制度，以及美国经济政策，尤其聚焦于二战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演变历程。

克劳迪奥·M·拉达埃利是伦敦大学学院公共政策教授。他发表了关于欧盟循证政策政治、治理、政策学习和技术官僚制的著作，包括与克莱尔·A·邓洛普和菲利普·特雷恩合编的《公共政策学习》（2018年）以及与克莱尔·A·邓洛普合编的《监管影响评估手册》（2017年）。

Ignacio Sanchez-Cuenca是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政治学教授，卡洛斯三世-胡安·马奇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他是《政治暴力的历史根源》（2019）的作者，也是《政府控制》（2008）的联合编辑，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各种文章。关于技术官僚制，他在《政治学年鉴》（2017）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欧盟技术官僚制的文章。

西尔瓦娜·塔尔莱亚现任巴塞尔大学欧洲全球研究学院与政治学系博士后研究员。此前，她从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曾担任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院马克斯·韦伯研究员。其关于欧洲金融危机及教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已发表于多本学术期刊。

PierDomenicotorTortola是格罗宁根大学欧洲政治与社会助理教授，近期参与编辑了《治理欧洲：如何使欧盟更加 Efficient 和 Democratic》（2017），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在技术官僚主义这一主题上，他的兴趣主要围绕欧洲央行在欧元危机期间的角色及其政治化问题。他关于这一主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已发表于《欧洲政治研究杂志》和《共同市场研究杂志》。

约书亚·A·塔克是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兼任俄罗斯与斯拉夫研究及数据科学教授。他是纽约大学社交媒体与政治中心（csmapnyu.org）和SMap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兼联合主任，纽约大学约旦俄罗斯高级研究中心主任，以及获奖博客的联合编辑。

《华盛顿邮报》的“猴子笼子”。他的研究发表在20多份学术期刊上，他是《共产主义的阴影》（2017）的合著者。

Marco Valbruzzi是那不勒斯大学 Federico II Assistant Professor。他是 *Changing Republic : 意大利的政治与民主*（2015年）的作者，以及两本意大利语书籍的作者。关于技术官僚制，他与人合著了两篇发表在 *欧洲政治研究杂志*（2014年）和 *现代意大利研究杂志*（2012年）上的文章。

莱因特·范德维尔是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其研究聚焦于技术官僚型高管对政治环境的响应机制，尤其关注欧盟及其机构与公众反对派之间的互动关系。他关于技术官僚制与欧盟的研究成果已发表于 *《欧盟政治学》*（2018年）和 *《欧洲公共政策杂志》*（2018年）。

Jan Zilinsky是纽约大学政治系博士研究生，同时担任纽约大学社交媒体与政治参与实验室（SMaPP）的研究员。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政治知识、选民学习以及大众政治行为。他曾在 *《比较经济学杂志》*（2016年）上发表过一篇合作论文。

前言和致谢

技术官僚主义的最新表现包括：墨西哥 *new president on the technocrats from the Salinas revolution in the 1990s*, but also 近期在保加利亚、捷克、希腊、匈牙利和意大利组建的技术官僚内阁发表“战争”宣言；葡萄牙任命无党派部长；巴西博索纳罗总统内阁任命新一届新自由主义“芝加哥男孩”。更广泛而言，我们观察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欧盟等超国家技术官僚机构的崛起。典型案例还包括：特朗普总统和希腊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等人对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独立性的民粹主义攻击；意大利前内政部长马泰奥·萨尔维尼对养老基金的抨击；英国小报和瑞士民粹主义者对法院及法官的攻击；以及常被贴上技术官僚标签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引发的黄背心抗议。英国脱欧大臣戴维·戴维斯和英国独立党指控公务员系统破坏英国脱欧进程。同样地，有观点认为气候科学家和专家的行为基于某种‘议程’，且带有政治倾向而非中立立场。另一方面，随着世界日益复杂且相互关联，公众对党派政治和政客的质疑，以及对民主制度效率与能力的不信任，使得对专家的依赖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技术官僚中立性议题、其政治化倾向、作为制衡民粹主义的制衡力量、在民主制度中负责任与响应性代表的作用，以及技术官僚体制的“民主赤字”，构成了本书的核心主题。尽管当技术官僚势力显现时，技术官僚政治问题会被推入公众讨论，但已显而易见的是，这些问题的根源深植于我们治理体系的基础之中，并将在未来数十年愈发凸显其紧迫性。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互联加剧政治体系复杂性，加之民众对高效治理成果的诉求日益高涨，负责任与响应性治理之间的张力必将不断加剧。民主制度如何在不丧失其民主属性的前提下，运用独立的知识与专业能力实现有效治理？当政治领域出现“技术官僚化”（决策权被转移至

技术官僚制（即对民意无响应、未经选举产生的精英阶层）常被视为当前民粹主义反弹的深层根源，但对那些过度响应治理的民主制度而言，它也可能成为矫正力量。因此，我们既视技术官僚制为挑战，也视其为潜在的矫正力量，既是民主的“盟友”，也是其“对手”。本书旨在从理论与实践层面解析这些动态关系，为未来技术官僚政治研究提供统一框架。

本书源于多项研究计划。2006年，苏黎世大学启动了一项由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NCCR 计划）资助的广泛研究项目，旨在探讨21世纪民主面临的挑战。尽管研究主要聚焦于民粹主义与媒体化现象，但其部分内容也涉及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增长的专业化需求与超国家治理。2017年项目收官之际，人们逐渐意识到：相较于民粹主义，技术官僚治理虽未受足够重视，却构成了对代议制民主同样具有挑战性的替代模式。这一发现不仅催生了相关理论研究（卡拉马尼，2017），更推动了技术官僚制的实证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针对欧洲公众技术官僚态度的新型比较调查（贝尔图与卡拉马尼，2017）。2017年10月，苏黎世比较政治学教席新成立的技术官僚制研究集群，率先举办了为期两天的“技术官僚对民主的挑战”研讨会。随后在2018年尼科西亚 ECPR（欧洲政治研究联盟）联合研讨会期间，以及2019年马德里欧洲研究委员会的图书研讨会上，相关研究持续发酵。

在这些研讨会上，技术官僚制及相关领域的顶尖学者首次齐聚一堂，从比较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的视角，系统探讨了当前代议制民主‘危机’中的技术官僚制问题。本书正是这些学术努力的结晶。

我们衷心感谢汉斯彼得·克里西（Hanspeter Kriesi），他发起并主导了NCCR 研究计划的大部分历史进程。特别感谢苏黎世大学资助2017年首届研讨会。同时感谢2018年在塞浦路斯尼科西亚举办的苏黎世研讨会及ECPR 研讨会的所有参与者。莱诺特·范德维尔（Reinout van der Veer）感谢马库斯·哈弗兰（Markus Haverland）和米哈尔·翁德科（Michal Onderco）的深刻见解，并感谢荷兰科学研究组织（Netherlands Organisation for Scientific Research）的财政支持。克莱尔·邓洛普（Claire Dunlop）和克劳迪奥·拉达埃利（Claudio Radaelli）感谢“有效治理程序工具”项目（ERC 资助号694632）的支持，并特别感谢塞巴斯蒂安·沙伊约（Sebastien Chail-leux）、克洛·戴维斯（Cleo Davies）、伊娃·昆塞勒（Eva Kunseler）和帕特里克·马里埃（Patrick Marier）。伊格纳西奥·桑切斯-昆卡（Ignacio Sanchez-Cuenca）感谢玛丽娜·科斯塔·洛博（Marina Costa Lobo）、罗伯特·菲沙姆（Robert Fisham）和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ezworski）的宝贵意见。西尔瓦娜·塔尔莱亚（Silvana Tarlea）和斯特凡妮·拜勒（Stefanie Bail-er）感谢欧盟“地平线2020”研究与创新计划对EMU Choices项目（资助号649532）的资助，并感谢朱莉娅·杜尔（Julia Durr）、拉拉·艾根曼（Lara Eigenmann）和伊琳娜·费尔（Irina Fehr）的研究协助。关于其章节早期版本的评论，PierDomenicoTortolawisheshothankparticipants 于2018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概念形成与比较历史分析’专题讨论会及2018年学术研讨会

格罗宁根大学欧洲政治与社会研究项目。Marina Costa Lobo与Ian McManus的研究工作部分由ERC项目Maple（资助编号：682125）资助。Despina Alexiadou谨此感谢Hanna Back与Patrick Dumont提出的宝贵意见，以及Hakan Gunaydin对其章节的协助。Marco Valbruzzi感谢Stefano Bartolini、Duncan McDonnell和Gianfranco Pasquino对其章节初稿提出的修改建议。

我们衷心感谢索尼娅·阿隆索·萨恩斯·德奥格尔和塞巴斯蒂安·拉维佐洛在2019年马德里欧洲研究委员会图书推介会上的精彩讨论，以及伊夫·梅尼对文稿提出的深刻见解。在出版过程中，我们特别感谢劳特利奇出版社“社会与政治精英”丛书的编辑帕特里克·杜蒙和基思·道丁，以及劳特利奇出版社的安德鲁·泰勒和索菲·伊达马尔戈达的指导。海伦·比利时·库珀对文稿进行了出色的校对工作。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匿名审稿人对初稿提出的富有建设性的宝贵建议。

Eri Bertsou 和 Daniele Caramani

缩略语

ANSES	法国食品、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局
BSE	英国在欧洲更加强大
BU	银行联盟
C字	中欧/东欧
激光工程与 应用会议	选区级数据档案
中心浆液性 视网膜病	针对具体国家的建议
是笔记本// 智能手机系 列电池专业 生产商	欧洲银行管理局
EC	欧委会
电子部件局	欧洲中央银行
伊利县监狱	欧洲法院
ECM	误差校正模型
欧洲海上钓 鱼者联盟	欧洲食品安全局
EFSF	欧洲金融稳定基金
电子接口设 备	经济学人智库
鸛鹑	欧洲货币联盟
ERA	欧洲监管机构
ESFS	欧洲金融稳定基金
ESM	欧洲稳定机制
好的	欧洲联盟
EVS	欧洲价值观调查
GIIPS	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
国际货运公 司	国际金融机构
中介燃料	国际货币基金
INPS	意大利国家社会养老金制度
ISI	进口替代工业化

xviii.缩写

LDA潜在狄利克雷分配

LiTS转型期生活调查

MEFP经济和金融政策备忘录

NGO非政府组织

经合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MT**直接货币交易

PR比例代表制

QE定量宽松

SGP稳定与增长公约

SMaPP社交媒体与政治参与**SSM**单一监督机

制

联合国 联合国

增值税

世界贸易组织

WVS世界价值观调查

介绍

技术官僚对民主的挑战

达尼埃莱·卡拉马尼

导论:民主阴影下的技术官僚制

现代民主制度的起源，可追溯至十九世纪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双重”动员现象。民族革命与工业革命共同构成了近代政治社会动员的两大基石事件。¹这两场革命标志着从地方认同到国家认同、从身份认同到契约认同、从民间社群到城市社会的深刻转型。前者催生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政治组织单位的政体，民主制度取代了专制统治；后者确立了资本主义作为基础生产方式，工业经济取代了农业经济。这种双重动员催生了当代最具包容性的两大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民族）与经济共同体（阶级）。

在并行的过程中，两个节点内部存在着张力。民族革命是民主及其主权虚构的起源。作为其主要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是民主的，模糊了社会的垂直分层。民族从根本上是平等的。这种思维方式本质上也是非理性的。²工业革命延续了另一个延续数百年的虚构理念——本质上是“乌托邦”的³运行社会模式，主要（但不限于）以机器般运作，其指导思想是实证主义的“进步论”，强调知识与才能而非种姓特权。管理复杂性本质上是非平等的。这种理念还蕴含着对理性的信仰，具体表现为国家通过官僚体系和地域组织来实施工业生产模式的程序。人类掌控能源的工业自信，以及后来的泰勒主义，都延伸到了科学管理社会机构的领域。⁴这种双重转型催生的新现实既需要合法性，也需要效率⁵；它既是国家的，也是理性的；因此同时兼具大众性和精英性：国家与国家机器的结合体。

代议制政府（而非“民主”）是调和这种二元性矛盾的产物——就社会冲突的持续性而言，它比民族主义和科学管理更具现实意义，因为后者并未考虑这一因素。最初，其意图是维护精英阶层相对于...的自主性。

2 达尼埃莱·卡拉马尼

这种权力分配方式具有鲜明的伯克式特征。以伯克式特有的方式，限制“受托人”代表权的自治制度机制被摒弃：直接民主、强制性授权、抽签制等参与式民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间接选举（例如通过选举人团制度）和基于财富与教育的有限选举权。⁶随着选举权的扩展和行政机构对议会责任的引入，麦迪逊式的权力分立、制衡机制以及刻意隔离和“去政治化”的公共领域（如独立司法体系、刚性宪法、国际法、国家官僚机构和中央银行）得以维持，以此制衡卢梭式的主权。

或许最重要的是，选举作为精英阶层的基本选拔机制取得了成功。其目标再次在于平衡合法的自治与效率、民众与精英、民意与知情、有能力且理性的政府。⁷与抽签不同，选举竞争能选出“最优秀者”，这正是熊彼特民主定义的核心——精英阶层通过普选争夺选票。尽管竞争的是普选票，但核心仍是精英。二十世纪的政党，尤其是大众政党，逐渐成为连接民主选民（自治）与政府行动（效率）的关键纽带，并通过选举公信力确保政策响应性。⁸

过去两百年间，这种制度的平衡曾多次面临挑战。一方面，那些本应保障少数群体权益、制衡多数人专制、促进精英竞争性选拔的机制，却被视作对‘人民意志’的限制，甚至被指责为将人民分裂为自私派系的工具。另一方面，同样的机制也被认为是导致政治竞争效率低下、政府短视（着眼于（连）任选举以取悦选民）、无能以及特定派系分裂（这些都对社会有序运转有害）的根源。因此，这个旨在维持平衡的模型正受到它本应团结的两个阵营的攻击：大众派与精英派——即民粹主义者与技术官僚（卡拉马尼2017）⁹。

尽管最严峻的挑战发生在约100年前的20世纪20至30年代，当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极权体制正在逐步建立，但21世纪头二十年的代议制民主再次面临挑战。学术界与媒体持续抨击民粹主义的威胁。¹⁰尽管关于技术官僚制的文献浩如烟海，但近期讨论却忽视了这个自代议制民主诞生之初就不断对其构成挑战的额外威胁。¹¹本书旨在重新平衡这场学术辩论。近期文献已探讨了代议制民主面临的双重挑战（Bickerton与Invernizzi Accetti 2017，Caramani 2017），但技术官僚主义这一维度本身仍缺乏充分研究。

因此，“挑战”首先意味着对代议制民主的挑战。然而，我们不应忽视技术官僚体制所带来的挑战。

这是对一种更“激进”民主理念的回应——这种理念主张通过集体自治而非能力选拔来实现民主。这正是对“非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的挑战，后者往往表现为“一意孤行”和“一言堂”。在重新平衡这场辩论时，我们不应忽视技术官僚主义与民粹主义这两个挑战的共性。虽然本书并非专门论述民粹主义，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技术官僚主义实则是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¹²

本导论首先界定挑战者身份——即技术官僚主义。随后探讨其近期重现的深层动因。接着分析技术官僚主义对代议制民主的多重挑战，包括去政治化、整体主义、中立性、责任缺失、问责缺失、排斥性及自主性等具体表现。继而评估这种挑战的强度及其呈现方式，最终剖析其在政权体制、机构设置、行为主体、政策导向、话语体系及个人态度等层面的多元表现形态。结论提出技术官僚制是代表制民主所感知缺陷的威胁还是矫正。

挑战者：技术官僚权力与代表权

若将政治定义为争夺“价值分配”（即决策政策“目标”）权力的博弈，¹³那么技术官僚制便是一种特殊权力形态——其价值分配决策由专家或技术精英基于专业知识独立制定，且始终以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为考量。¹⁴由此定义可推导出若干具体特征。

- 首先，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在于卓越的知识与专业能力（而非大众意志）。
- 其次，政治代表遵循一种“受托人”模式，主张独立于社会且对社会不作回应。由于无能和时间不足，社会无法“授权”决策者，因而无法将民主作为主权自治来实施。¹⁵“民主”被简化（或“贫化”、“贬值”）为精英选拔的程序。
- 第三，政策旨在服务于整体（以及长期前瞻性）的共同利益，而非其组成部分。
- 第四，这种利益是理性且科学地（“客观地”）确立的，而非源于主观、多元、短期利益的聚合。¹⁶

技术统治既是权力形态，也是合法性来源和代表形式。若“技术统治”仅用于执行他人（如民主多数）制定的目标决策并受其控制，便不再是技术统治——因为此时不涉及权力、目标设定与资源分配，仅限于执行、实施及手段建议。此时便成为专业知识、技术性、能力与知识。当技能服务于权力行使时，专业知识便转化为技术统治。作为权力形式定义的技术统治，既不能脱离政治，也不能保持中立。

4 达尼埃莱·卡拉马尼

（关于这种呈现方式的讨论将在后文展开），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该术语所蕴含的贬义。技术统治中的权力，正是源于放弃技术中立性——将目标设定在手段之上。¹⁷

技术官僚制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制度。它将精英群体——基于知识储备、专业造诣、卓越的学术资质和丰富经验——与普通民众区分开来。这类精英最能且理应主导社会发展，其决策应基于专业判断，无需顾及普通民众的诉求——毕竟普通民众在技能储备、时间投入或动机考量上都处于劣势。知识精英更能有效解决复杂社会问题，其决策不受短期党派利益和选举利益的束缚。由于不受特定社会群体选举支持的牵制，他们能以长远眼光负责任地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这种对所谓“特殊利益”的反多元主义怀疑态度，与普遍利益形成鲜明对比，意味着精英阶层并不包含通过政党选举产生的政治阶层。在技术官僚主义视角下，某些决策对整体而言客观上是“好”（或“坏”）的（毋庸置疑，它们无法被简单地“左”或“右”，因为这会偏袒某个群体）。政策制定无需依赖多元利益的聚合。¹⁸政治行动并非基于社会“投入”，而是通过理性推测确立——这种推测建立在实证主义“真理”的信念之上，旨在通过科学方法识别问题与解决方案。

作为权力、合法性与代表性的具体形式，技术统治本质上是一种多维度的精英主义、整体性与科学性现象。正如后续章节将阐明的，这种统治形式在不同政治体系中呈现各异程度。现实中鲜少存在完全“技术统治国家”的绝对化、极端化构想，即便有也鲜少被推崇。¹⁹所有政权都依赖某种形式的民众动员与包容机制。政治体系中完全不存在技术官僚权力的情况也难以想象。即便是最“激进”的民主制度，也往往需要依赖某些独立的专业力量。技术官僚权力则呈现出不同层级，包括顾问专家的决策权、内阁中独立的部长和总理，乃至整个行政机构。在最基础的“原子”层面，即便是单一行为体也可能选择行使技术官僚权力，也可能选择不行使；可能发表某些技术官僚声明，也可能选择保持沉默。²⁰这种技术官僚权力的连续性概念，对判断政权是否具有威权性具有重要影响。由于技术官僚制是所有政权的共性特征，只有当技术官僚权力达到特定阈值时，该政权才具备威权性特征。

挑战的起源

如前所述，技术官僚权力的起源在于现代国家必须适应工业革命后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国家主义的倡导与

自由主义的民主化还必须确保“制度”的有效运作及其在复杂环境和复杂事务中的有效性（Centeno 1994: 235）。

这种双向互动持续进行。一方面，国家通过科学技术进步（尤其是数据收集、官僚体系和领土组织等领域的突破），学会运用理性程序和科学方法，将其应用于从工业政策到教育政策乃至卫生政策的社会治理。²¹特别是欧洲的政治分裂，由于激烈的国际竞争（蒂利，1990年）²²，促进了国家技术官僚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正是政治分裂和国际竞争推动了技术进步，最终促成了工业革命的诞生。²³这种互动既强化了国家建设，又推动了技术进步，二者相互促进。因此，对于技术官僚制的“缘由”，答案在于复杂性和竞争机制。

然而，对于本书所探讨的更具针对性的问题——即对*代议制民主*挑战的“缘由”，答案必须从其主要行为体和机构（政党与议会）被认为缺乏提供此类专业知识的能力中寻找。这一挑战的根源在于代议制民主性质的演变，以及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精英阶层的批判。

政党不仅承担着联结公民、代表与政策的职能，更通过组建政治团队、管理政府机构和决策制定，履行负责任且高效治理的职责。这种运作机制确保了政策的合法性。当政党无法提供必要专业支持时，技术官僚主义的挑战便随之而来。但直到最近，对政党的批评仍聚焦于其代表能力不足，而非治理能力缺失。卡茨与迈尔（1995）提出的政党从“大众”向“卡特尔”的转型理论，常被用来强调其治理功能，却忽视了选民响应性和政策协调性。在日益增长的学术文献中，人们开始质疑的是政策的输入合法性。²⁴因此，学界始终强调的是对代议制民主的民粹主义批判。这种观点严重忽视了近来才重新受到关注的精英主义批判（卡拉马尼 2017；哈贝马斯 2015）。

这种替代性批评的核心观点指出，政党存在过度反应的倾向，其几乎完全专注于通过日益精密的手段与选民保持持续“接触”——包括民意调查、营销工具和社交媒体等工具来监控公众意见。政党并非丧失动员能力，而是通过创新的传播渠道获得了说服选民和培养忠诚度的新手段。根据这种观点，作为“选举机器”的政党因主要追求民众认同而变得责任缺失。一旦确保选举胜利，政策就会被调整为有利于连任。这导致媒体在高频选举周期中对即时结果的渴求，催生了短期反应机制。正是这种批评引发了专家接管的呼声。技术统治被援引，因其涉及的决策者不受民众同意的暴政约束。

基于技术官僚制的功能主义理论（Williams 2006），这种对所谓纯粹“选举主义”的反应主要受两大因素影响。

首先，人们普遍意识到超国家治理和非多数治理模式日益复杂的特征，这些治理模式涉及跨国司法裁决、国际组织与法院、跨政府网络与机构以及独立监管机构的交叉运作。²⁵这种复杂性要求治理者具备更强的技术能力，减少公众参与，更多地承担管理职能而非决策职能（鉴于此类多层次、跨国界安排所涉及的政策约束）。其中，一个特定的复杂领域是改革需求——这些改革要么是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要么是为了使其符合超国家一体化所需的合规规范。

其次，当政策行动成效不佳时，人们对代议制民主的不满情绪会显著上升。这种现象在危机时期尤为明显，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后时期，还是始于2008年的欧盟大衰退之后。²⁶正如爱德华多·达让特在第12章中所指出的，这一现象同样适用于拉丁美洲的危机时期——无论是智利军事政权时期“芝加哥学派”的任命（Silva 1991），还是20世纪80至90年代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秘鲁的各类技术官僚任命（Geddes 1990,1994；Kaplan 2013；Teichman 1997；Weyland 2002），亦或是如今新巴西内阁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任命。

对产出合法性、实效性和效率的要求，不仅是对政党及其在代议制民主中角色的回应，更是对民粹主义（其他政党的头号敌人）的批判——它依赖于自治原则，批判精英阶层，并对专业知识持怀疑态度。

挑战的目标

当前针对代议制民主挑战根源的论述，已明确指出其质疑的核心——即代议制民主的基本特征（达尔，1956）。技术官僚主义通过构建权力、合法性与代表性的替代性范式，批判了政策制定必须服从民主自治与竞争性选举的既定模式。本节探讨技术官僚制直接挑战的代议制民主特征。

“政治”的挑战：去政治化

去政治化的挑战直指政治的本质。技术官僚主义的愿景是将“政治”从“政策”中剥离，它指向一种超越利益冲突的黑格尔式普遍国家理念。这种体制自诩为反政治的，置身于冲突、对抗与对立之外，或自诩“凌驾”于这些之上。首先，它坚信存在对社会“客观”而言或好或坏的政策，而非对政策可能形态的不同意见或偏好。这关乎“事实”本身。²⁷其次，它还存在

这种坚定信念认为，通过分析和科学方法，运用实证数据，完全有可能理性地“发现”出好的政策和解决方案。这种认知无需政治介入，因为理性确立的“真理”本身不存在差异。去政治化、技术官僚代表的非意识形态属性以及实用主义，都表明“选择”实属多余。在技术官僚的视角中，政策制定并不涉及选择——行动方案只需确定方向，而非做出抉择。因此，政策常被包装成必然性，精准指向选择的不可能性。

尽管有些作者（例如，参见Tortola在第三章）将去政治化定义为与立场不同的竞争者保持距离（即，与“政治”保持距离），但去政治化的挑战可以更激进地表述，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未考虑冲突。对此，我们无法保持中立。许多被统称为技术官僚主义的运动，其终极目标都是构建无冲突的社会。这不仅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也适用于技术官僚主义苏维埃或美国技术官僚委员会支持者（如索尔斯坦·凡勃伦和沃尔特·劳滕施特劳赫等人）所构想的社会科学管理理念。这种理念延续了“问题解决”和“知识统治”的路径，旨在“中和”冲突（伯施2016，奥唐奈1994）——这里的“中和”并非在冲突中保持中立，而是彻底消除冲突。政治进程被等同于技术操作，而非冲突、聚合与妥协。非多数制机构和“监管国家”制定规则并监督执行的理念（马约内1994），本质上不需要政治决策，而是规划与指令主义的体现。²⁸甚至人员选拔也不涉及冲突，因其基于客观的择优标准。最后，宪政主义——将福利与市场制度化——可被解读为资源分配的非冲突性解决方案。²⁹

多元主义面临的挑战：整体论

技术官僚主义主张以非对抗性方式寻求解决方案，这本质上意味着“整体”优先于“部分”。所谓优劣标准应适用于整个社会，而非其某个特定领域，且不涉及“取舍”或优劣之分。因此，冲突仅当某部分利益与整体利益相悖时才会产生，而非针对其他部分。技术官僚主义的愿景在于体现国家的共同利益，其政治决策旨在为全体民众服务，而非在不同偏好之间进行分配或聚合。

诚然，聚合现象确实存在，但其运作遵循的理性法则与机器通过不同部件协同工作的原理相似，而非竞争机制。理性推演与科学程序的实现，旨在识别普遍利益并制定实现该利益的措施。因此，技术官僚主义与民粹主义一样，本质上是反多元主义的——它不允许局部利益凌驾于整体利益之上。由此产生的结果是，这种体制具有反党派性特征。

由于各方利益代表的是特定群体而非社会整体利益，³⁰通过“调解”来协调群体偏好，这种做法被视作对公共利益的扭曲。反对理性制定的政策，就等于反对“正确”的选择。³¹因此，基于非理性理由的反对行为是不合法的。政治分歧无立足之地，社会经济多样性才是唯一应被尊重的。

意识形态的中立性挑战

政治意识形态既是社会现实的解读，也是推动变革与政治行动的蓝图。怀有执政抱负的政党会提出整合多元利益的替代性愿景，这些政党对社会有着整体性规划。³²代议制民主与技术官僚制（及民粹主义）的区别在于，社会福祉的实现存在多种竞争性方案。意识形态实质上是政策选择的集合体，使选民能够做出明智抉择。关键在于，投票机制将政党与选民通过准契约关系或授权关系紧密绑定。这意味着对基于“承诺性”提案的授权承诺（Converse和Pierce 1986，Mansbridge 2003，Pierce 1999）。³³

选举授权与选择的理念并不适用于技术官僚式的权力观。首先，选民既不具备制定政策的权限，也无法在政策间进行选择。其次，若通过理性推测就能确定“最佳方案”，那么提供选择就毫无意义。技术官僚主义因此自诩为非意识形态的。其话语体系标榜“实用主义”与中立性（阿道夫，2013）³⁴。然而正如桑切斯-昆卡在第二章所揭示的，即便这种论述以非意识形态的术语呈现，技术官僚主义在实践中也从未真正中立。所有知识的生产与传播都是社会建构的活动，其本质反映了价值与权力关系（费因特与奥尔斯，2005；费舍尔，1990；福柯，1980；贾萨诺夫，1990）。

首先，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法西斯国家和新自由主义制度都可以作为技术官僚主义的典型。20世纪60至70年代以“发展主义”专家（农业、卫生、社会政策及扶贫领域）为特征——正如达让特在第十二章所述，拉丁美洲尤为典型——但 replaced by economically “neoliberal”，“orthodox” economists in the 1990s replaced by economically “neoliberal”，“orthodox” economists in the 1990s（巴布2001年、森特诺与麦克斯菲尔德1992年、格林德尔1977年、西金克1991年）。因此，技术官僚主义可被理解为一种“空洞意识形态”，其内涵可与民粹主义类似，充满多元内容。

其次，更具争议的是那些被包装成必要性的政策案例——当政治行动受制于外部约束，阻碍了替代性政策的实施和真正的选择空间时。一方面，国际市场的准入、信贷与贸易（即卡勒尔1990、1992年提出的“调整政治”），另一方面，超国家一体化与合规要求，都压缩了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施展空间。这种局面迫使政策走向自由化、私有化、金融改革以及由欧盟委员会（EC）、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主导的“紧缩政策”。

引言：技术官僚的挑战9 基金（IMF）和世界银行或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资格所要求的。此类政策以“中立”语言“改革”为依据。

以及“现代化”，尽管其背后隐藏着新自由主义议程（Crouch 2011）。³⁵

第三，技术官僚理论指出，技术官僚可能受雇于商业机构、国际金融机构，甚至某些政客，后者将他们当作推行改革的工具（Magaloni 2006）。这意味着他们可能缺乏自主性，这一问题将在本引言后续部分展开讨论。

对代表权的挑战：责任， 不问责任制

技术官僚制还挑战了代议制的基本原则——即决策者应响应选民、定期接受问责并包容社会各阶层。相反，从技术官僚主义视角看，响应性必须让位于负责任的治理，选民不具备制裁精英的权限，代表应仅由通过才能选拔的‘最优秀者’组成。

1. **责任。**近期学术界普遍指出，技术官僚制过于强调责任与治理，必要时甚至会忽视对选民“授权”的响应，这种做法与民众偏好存在明显脱节（卡拉马尼，2017）。政策制定不应以选民偏好的分布为指导，因为民众缺乏识别社会共同利益的能力。这种“受托人”式的代表理念，不仅与民粹主义背道而驰，也违背了代议制民主中政党通过提案竞争的自治原则。政党执政主要基于预期的“授权”，而技术官僚制则不然。更关键的是，这种观点对直接民主制度具有破坏性。

与文献中对技术官僚无响应性的关注相辅相成的是，范德维尔在第四章提出的论点呈现了一个更为微妙的图景。³⁶首先，通常对响应性的接受与多数人偏好的一致性联系过于紧密，忽视了对少数群体以及要求稳定的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响应性。其次，精英阶层不仅要回应民众偏好，还需应对各类风险——特别是社会风险、制度风险和声誉风险。³⁷再者，技术官僚的决策未必完全无视民意，当其未遵循民主授权时尤其如此。在裙带关系盛行、腐败横行，或官僚体系薄弱、政局动荡的环境中，民选政治家往往比技术官僚更不重视民众诉求（达让特，2015）。此类情境下，公共利益常被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取代，导致公众利益被忽视，这与意识形态政党运作模式如出一辙。

2. **问责制缺失。**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技术官僚制的不可问责性。首先，由于其治理并非基于既定纲领

（授权），我们无法确定承诺是否得到兑现。其次，如果技术官僚制依赖于专业知识和权威地位运作，那么让能力较弱的选民来评判通过理性程序制定的政策就毫无意义。因此技术官僚制缺乏问责机制。³⁸尽管代表制政府的核心特征之一，但技术官僚制的批判恰恰在于：政党与领导人总是“预判”选举结果——因此再次将政策调整为取悦而非解决问题。³⁹

需要再次强调，这类论点需要细致考量。虽然选民或许无法评判技术细节，但他们仍能判断问题是否被发现并得到解决。因此，选民具备垂直问责能力（即对精英阶层进行监督的可能性）是合乎情理的。如果合法性基于实际成效，那么即便无法评估达成这些成果的手段，至少可以对结果进行评判。此外，技术官僚精英并非铁板一块。其他专家（如学者或记者）也能对政策措施和实施效果提出批评。这表明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横向问责机制，其中精英群体受到质量控制、科学方案准确性、“同行评审”、数据来源及事实核查等约束。

3. **排斥。**最后，技术官僚制在描述维度上挑战了我们对代表制的理解——不过这种挑战仅限于一定程度，因为代议制民主并非主要作为社会多样性的“镜像”或“微型社会”而存在。代议制民主的核心在于“行动”与“实践”，而非“存在”与“代表”⁴⁰。其强调选举而非抽签来实现“贵族民主”（马宁，1997）的高质量代表，以及推崇“理念政治”而非“在场政治”，这些都表明对将描述性群体纳入代表职能持怀疑态度⁴¹。在技术官僚制中，这种怀疑被推向极端，但并未构成与代议制民主的质的断裂。描述性代表应当精简至必要限度，技术官僚的选拔应基于实绩证明（即“择优录取”和“人才选拔”），而非照搬社会的多样性。这种代表制以能力而非政策纲领为基础，因此信任建立在差异性之上——在教育、智力与专业领域——而非相似性（如民粹主义所主张的）。其核心原则在于排除大众而非通过自治实现包容，同时将决策者与民众的选举过程隔离开来。⁴²

自治的挑战：自主性（独立性）

技术官僚权力必须具有自主性，否则它就不是一种权力形式，而仅仅是一种执行机构。在这方面，技术官僚制似乎对民主的自我治理，即对民粹主义，比对代议制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这种民主制度将民主的自我治理理念与代表选举机制相结合（参见第一章和第二章）。技术官僚制与代议制民主还有一个共同点——都反对民粹主义，即承认存在不受民众控制的独立决策空间。这些自主权被写入基本权利，超越了选举多数或直接民主的范畴，但同样存在于中央银行、司法机构、国家广播机构、特定政府部门及外交机构的自主权中。因此，这一挑战主要针对代议制民主中具有自主性特征的部分，即更激进的“民主”理念——民粹主义所主张的主权自我治理型民主。

当然，技术官僚制作为政权意味着非民主决策具有广泛的自主性，而在代议制政府下，这种自主性则更为有限。然而，这似乎更多是一个程度问题而非质的断裂。无论哪种情况，自主性对民主政府构成的挑战都是双重的——一方面，当技术官僚被视为行动者时；另一方面，当他们被视为代理人时。

首先，从宏观抽象层面来看，技术官僚的自主性挑战着民主制度的两种形态——代议制民主与“激进”民主，因其将决策领域与民主监督相隔离。决策领域越广泛、越核心，“民主赤字”就越严重。这种自主性的核心目标是“屏蔽”决策过程中的党派影响，而央行的独立性则明确旨在避免政客通过货币印刷机来博取民众支持（参见第四章）。这种必要性导致其削弱了决策的民主合法性。这正是技术官僚作为“行动者”带来的挑战。⁴³政治家与普通公民与专家之间的专业不对称性，使得后者获得了巨大权力。政客依赖于他们的专业知识（想想军队），这使技术官僚在战略上推进他们自己的利益方面具有优势，并在追求不反映社会需求和利益的目标方面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即使他们是客观和中立的。⁴⁴

其次，在更具体和实际的层面上，形式上的自治并不必然意味着技术官僚机构在实践中也具有自主性。技术官僚或许不需要选举认可，但必须由议会及其多数派任命。这类机构和人员与其说是自主的，不如说是特定利益集团的“代理人”。摆脱民主控制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能免于其他“委托人”的约束——比如那些利用他们来执行导致“泪谷”（迪帕尔马，1990）的艰难改革或游说活动的政治家。事实上，工具主义理论认为技术官僚是社会主导群体的执行者和代言人（森特诺与席尔瓦，1998）⁴⁵。对这两种代表（*vie*所谓民主的“自治”成分及其“激进”版本，实质上是一种虚假的自主权，它赋予了企业与私人利益集团权力。

挑战的强度

技术官僚制的挑战有多严峻？其具体表现有哪些？这种制度在政治体系中的呈现形式各不相同。实证案例呈现出连续谱系。比克顿与因韦尔尼齐·阿切蒂在第一章（沿袭拉达埃利1999a的研究）中，将传统非民主技术官僚制论点与尊重民主价值观及制度的当代论点进行对比。具体表现形式既有明确的制度变革（如对现有民主机构如内阁的改造，或建立新的国家及超国家机构），也有作为话语体系的隐性体现。在这一连续谱系的极端两端：一端是完全“技术官僚国家”，仅由专家制定目标；另一端则是完全排除独立专家参与，目标仅由民意决定，专家仅负责执行。实证案例大多处于中间地带。完全摒弃技术官僚权力的模式，实属难以想象。民主国家都存在技术官僚体系，包括国家官僚机构、顾问专家、独立部长、总理乃至整个行政系统。反之，即便是最接近技术官僚制的案例（如苏维埃政权或神权政体），也必须依赖一定程度的民众动员。

技术官僚权力作为一种连续体，其威权性质具有重要影响。技术官僚的挑战可能始终存在于民主体制内部，也可能突破体制边界，从而演变为“反体制”。只有当技术官僚权力达到特定阈值时，才能将政权定性为威权主义。因此，具体政治体系包含多少技术官僚成分，本质上是一个实证研究问题。同样，技术官僚理念获得的支持程度也需通过实证调查来验证。在这两个维度上，必须从不同层面审视体制的技术官僚特质及其支持基础：国家整体架构、其机构体系、技术官僚群体及其政策制定角色、他们的话语体系，以及公民对技术官僚主义的支持程度。⁴⁶下文将逐一探讨这些层面，为本书的实证分析构建理论框架。

技术官僚国家

技术官僚制需要国家。它通过国家组织运作，该组织提供决策和高效、有效行动的机制。

- 首先，国家的控制论功能在于“思考”——即获取社会与环境信息，处理复杂性，并通过制定合理程序来确立目标与手段，从而建立良好、长期且负责任的政策（另见脚注21）。
- 其次，它指的是在约束性国际体系中行事的国家，该体系要求对市场力量进行“调整”（正如依附理论所强调的，以确保信贷）并遵守国际金融机构（IFI）的协议；这对于世界边缘的现代化国家尤其相关，但在超国家谈判中也同样适用（正如塔尔莱和拜勒在第8章中讨论的欧盟成员国的情况）。

- 第三，从内部来看，技术官僚制需要国家（压制性）机构来实施其意志并执行决策，必要时原则上违背人民的意愿。⁴⁷

强大的国家结构不仅高效且有效，更能确保专家群体不受社会主导力量的左右。正如森特诺（1994:34）所言，技术官僚国家不能完全与世隔绝（毕竟需要掌握所服务社会的信息），但必须保持独立（即成为自主的“行动者”）。这种理念与新制度主义高度契合：技术官僚国家既非主导利益的映射，也不是特定社会群体的工具或“代理人”。但必须以社团主义方式，与社会各领域、“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建立“网络”关系，并积极回应他们的需求。国家与社会的纽带往往由单一的大众政党维系。在多个技术官僚国家的案例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例如墨西哥、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地区和苏联等现代化国家（霍夫曼与莱尔德，1985年），这使技术官僚主义演变为选举专制的治理模式。显然，若从国家层面面对技术官僚主义进行极端定义，它便构成了对民主制度的专制性挑战。

然而并非所有形式的威权主义都属于技术官僚主义。技术官僚国家不可能纯粹是压制性的——因为它需要与社会多元利益建立联系——这将导致纯粹军事政权被排除在这种国家类型之外。国家的高能力建设与封闭性并不必然意味着其技术官僚色彩更浓。历史上，军事政权确实需要依赖技术官僚体系。但智利独裁政权与其说是技术官僚主义，不如说是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验，这种政策需要限制民主自治。正如桑切斯-昆卡在第二章中强调的，新自由主义预设了一个能将市场从民主干预中解放出来的国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会走向技术官僚主义——相反，它实际上是在推行市场规则。

关于技术官僚制的经典文献反复强调，其与威权军事政权或半威权官僚体制之间存在复杂关系（科利尔1979，奥唐奈1973），这种现象在拉丁美洲等地区尤为突出。然而对民主制度的挑战在民主化进程中依然存在，例如1990年代学者指出技术官僚的影响力在民主环境中依然持续（森特诺与席尔瓦1998，多明格斯1997）。专家群体在民主制度下仍是重要参与者，甚至能巩固其影响力（达让特2015）⁴⁸。多位学者强调技术官僚对民主政治的制约作用，并提出“技术官僚民主”的概念⁴⁹。政策制定权始终掌握在技术官僚手中。政客们常常违背竞选承诺和纲领。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威权技术官僚国家与民主制度下的技术官僚制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除了乌托邦式的空谈之外，国家能否被认定为技术官僚制，只能依据某些任意设定的门槛来判定。

民主国家与技术官僚制

自治并不等同于国家走向专制。在民主国家中，自治同样以不同形式存在。以部长级官僚体系为例，中央银行和各类监管机构亦是如此。立法机构中同样存在专业性，各职能部门通过准备案卷材料和向议员提供简报来支持议会工作。政党自身也提供专业支持。在权力分立的广泛原则下，司法独立及其日益增强的政策影响力——即政治的“司法化”——构成了国家自主活动的另一领域。⁵⁰本卷后续内容并未涵盖民主国家中所有这些不受政治竞争和选举合法性约束的广阔领域，因为它们不会对代议制程序民主构成挑战。

然而，本卷确实探讨了将技术官僚自治领域扩展至行政部门的挑战（第六章），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影响（第七章和第八章）。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政策制定（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政策启动）正是通过这一分支实现的。近几十年来，技术官僚主导的内阁逐渐兴起，取代了较为理想的政党政府模式（卡茨，1986）。这类内阁在多个国家相继形成，包括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芬兰、希腊、意大利、立陶宛、葡萄牙和罗马尼亚等国。这些国家在2000年代和2010年代因经济危机、丑闻频发、联合政府组建失败等原因——总体而言是“政党失灵”的结果——相继出现此类内阁。⁵¹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非党派性”的内阁构成呈现出程度差异，其“非党派性”程度从最高到最低存在连续变化（安德韦格，2000）。近期研究已提出评估行政官员技术官僚特质的标准（布鲁克利克，2016；麦克唐纳与瓦尔布鲁齐，2014；科斯塔·平托等，2017），而瓦尔布鲁齐在第六章中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技术官僚型政府的特征表现为：政府决策由非政党招募的非民选官员作出，且政策制定不通过政党内部程序。根据内阁的组成、履职范围（职权范围）及任期长短，实证案例可分为两类：(1)技术官僚内阁的优劣程度不一，(2)以技术官僚内阁类型为分类标准。这种分类法区分了两类内阁：一类是维持现状的短期看守内阁，另一类则是推动政策变革的变革型内阁。我们发现完全技术官僚内阁（即内阁多数成员为非民选、无党派官员，包括总理）和技术官僚主导内阁（由非民选官员领导的党派部长占多数）是典型代表。唯有这类内阁具备价值分配权，这正是技术官僚制的核心特征，而看守内阁则不具备此能力。技术官僚内阁是技术官僚制最显著的表现形式，体现了其反党派本质——对政党追求短期利益、搞票选政治和党派偏袒的不信任。此外，这类内阁也折射出对政党政府低效运作的批判。

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在于其冗长的决策流程。与技术官僚制国家不同，民主国家的内阁具有临时性，仅在政党失势时才会介入。选举机制既能确保内阁成员接受问责，也能让议会中的支持者承担责任。选民与行政机构（尤其在议会民主制国家）之间的民主联系得以维系。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很难称之为“挑战”，因为真正放弃执政职能的往往是政党自身，而非被积极进取的技术官僚所挑战。

技术官僚、技术官僚机构与技术官僚政策

确定内阁组成（进而界定其‘技术官僚制’特征）的核心难题，在于界定何人符合技术官僚的资格标准。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内阁，更关乎国家机构的整体架构。由此催生出技术官僚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以‘文职’身份任职的非民选官员，这类人员既非职业政客，又缺乏政治经验，更未加入任何政党组织。这种观点预设了对“谁”——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可被定义为技术官僚的界定。⁵²

首先，文献强调这种专业能力源自特定的培训、教育或职业经历（无论是在商业领域、学术界还是其他行业）。关键在于，这些专家并非政治领域的行家，而是来自其他特定领域（森特诺和席尔瓦，1998）⁵³。这种专业能力既适用于“外行人”（即此前未在政府机构任职者），也适用于被委任担任行政职务的“内行人”（即来自国家官僚体系者）（伯施，2016）。虽然专业能力是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

作为第二个要素，这类人才必须担任与政策执行无关的国家要职。技术官僚不仅是专家，更掌握着政策制定的实权——即决定政策采纳方向或否决议。技术官僚是活跃于政治舞台的专家。梅诺（1969）指出，专家一旦成为技术官僚，便不再只是专家，而是真正融入了政治领域。因此，没有权力的技术人员不是技术官僚。⁵⁴

第三点关键在于，这类人员并非通过选举产生，而是通过任命（选拔）产生，因此不受选举竞争和党派之争的约束（Malbin 1980, Tucker 2018, Vibert 2007）。要被定义为技术官僚，必须具备以下特征：缺乏公职经验、政党活动经历及成员身份，且不认同明确的政治倾向（例如通过媒体声明体现）。

将技术官僚定义为具有行政职能、自视为中立且独立于政治竞争的专家，并不意味着政治行为者（无论是个人政客还是政党）缺乏专业素养。事实上，政党长期以来在培养政治人才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堪称培养政客的‘摇篮’。在政党承担的诸多‘职能’中，除了凝聚政治力量这一核心使命外，

在投票和治理结构之外，还有在各个政策领域“招募”合格人员的问题。

55

技术官僚究竟擅长什么？这里有个关键区别在于超国家层面与国家层面。在超国家层面，欧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联合国各机构的技术官僚特质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机构非选举产生且具备专业技术背景，堪称由技术官僚主导的理想范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独立于政治动机（主要来自国内影响）和意识形态偏见，这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此外，技术专长在不同领域的应用案例也颇具代表性，几乎涵盖了所有政策领域。⁵⁶

但在国家层面并非如此，技术官僚主要与经济学家（来自学术界、中央银行、私营企业或国际组织）同义。显然，这种对经济和金融的关注没有必要。如第12章所示，技术官僚的任命领域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涵盖卫生、社会政策、教育及扶贫等多个领域。不同地区亦存在差异：东欧在欧盟一体化领域拥有更多技术官僚，而拉丁美洲则主要集中在社会政策领域。不过，经济学始终是其核心领域。

技术官僚主义程度的差异，以及由此对代议制民主构成挑战的强度，同样体现在政策制定和政策过程层面，正如邓洛普与拉达利在第十章中所阐明的。第七章表明，技术官僚内阁与政治内阁的行为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各国之间乃至同一国家内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技术官僚化政策过程（体现在对知识的运用及专家参与与公共政策的程度上）。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时期，同一时期不同政策领域间也存在差异。在这一中观层面，我们可以观察到科学界、技术官僚、研究机构和智库等技术官僚行为体的显著程度——即整个知识共同体的影响力。第10章的贡献正是为解决政策过程，而非机构和人员问题。

技术官僚话语

技术官僚话语与技术官僚行为的表现形式并非仅限于技术官僚及其机构（如内阁）。非技术官僚的领导者和组织（例如政党）同样能够且经常采用技术官僚式的论述方式、发表技术官僚式的声明并采取技术官僚式的行动。⁵⁷政治领袖常援引自身专业能力，引用专家意见、统计数据、事实报告，并强调程序规范与长期责任。当政策方案被贬损性地称为“不负责任”或“目光短浅”时，这表明技术官僚主义并非仅通过技术官僚群体展现——非技术官僚群体同样可能形成技术官僚式的论述体系。

正如第五章关于分析层次的论述所阐明的，这属于微观层面。在极简主义的“原子”层面，即便是单一行动者也可能采取技术官僚式行为（或不采取），并发表某些技术官僚式的声明（但并非总是如此）。分析的基本单位变成了单个声明，以及由这些声明（和行动）构成的更广泛论述。对专业能力、胜任力、长期责任、公共利益、中立性以及政治争议中立性等概念的引用，就成为政治行动者（无论是否被视为技术官僚）可用的论述“工具”，就像非民粹主义行动者也能发表民粹主义声明一样。

事实上，话语与话语分析的概念在民粹主义研究中已得到广泛发展，尽管存在不同接受标准（Poblete 2015）。埃内斯托·拉克劳传统下的后结构主义是最为宽泛的，它涵盖所有创造意义的社会实践，而不仅限于狭义的话语。话语超越了语义现象的范畴，需要进行阐释。⁵⁸后现代主义同样认为话语具有广泛而潜在的含义，这些含义虽无法量化，但可通过言语和文字明确识别（因此依赖整体性评估；参见Hawkins 2009）。内容分析则将话语理解为语义、语言表达、交际表现与风格（包括复杂性和学识），最终聚焦于文本中的陈述、句子及单个词汇。其表现形式既可通过基于代码手册的手动编码量化，也可通过基于词典的自动化软件实现量化。⁵⁹

作为话语形式，技术官僚主义在特定社会中可能具有不同程度的显性或霸权性。它既能体现社会规划与国家认同，又包含象征性元素。⁶⁰为识别可计数或可阐释的实证现象，技术官僚主义话语可划分为以下维度：

- 精英主义包含对专业知识、精英群体的排他性特征以及功绩的强调。
- 科学方法在政策制定中体现为：关于客观性、理性推测与“真理”（证据）、实用主义及必然性（无选择余地）的论述。
- 政策被宣称是为整个社会（而非其多元部分）长期而制定，旨在为社会福利和社会作为一个形成身体或机器的复杂功能体系带来进步。
- 目标导向以效率、成本优化、务实和灵活性为特征，专注于解决问题。
- 反政治话语强调官员非选举产生的特性，因而具有独立性、无党派性、超脱政治及不具分裂性等优势。
- 最后，技术官僚话语与一种将精英与大众区分开来的特定风格相关，包括着装、技术术语、对数据、事实、数字、统计数据的引用，以及缺乏情感、戏剧性和冲突性语调。

第五章以代码书为例展开论述。纳瓦、森特诺和刘在第九章中，将英国脱欧的技术官僚式框架与基于公投机制的“直接民主”框架进行对比。这种分析方法使我们能够以更宏观的视角审视社会中的技术官僚主义现象。⁶¹同时，通过分析民粹主义行为体的此类话语，既能发现两者之间的共性，也能揭示其话语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单个公民同样属于这类具有特定话语特征的“行为体”范畴。

技术官僚公民？

然而，技术官僚主义在普通公民中并非通过声明体现，而是体现在他们的个人态度上。正如第11章和第13章所示，公民对技术官僚治理（尤其是技术官僚内阁）的态度可能较为积极或消极，这削弱了对自由主义代议机构的支持，从而构成一个更广泛、更分散的挑战来源。

与公民的民粹主义态度不同，后者以“政治应由人民意志主导，不受程序和精英阶层约束”为信念核心，⁶²技术官僚主义态度表现出将决策权下放给专家的倾向，必要时甚至会无视民意。第五章探讨了通过调查获取此类态度的具体案例。专家被认为更具备以负责任方式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不会被短期选举利益所误导——例如政客需要迎合穿制服的市民。然而与民粹主义态度类似，技术官僚主义态度普遍对政党政治和代议制民主持怀疑态度。“技术官僚公民”（若可如此称呼）具有精英主义倾向（而非反精英主义），他们相信专业知识应作为政策制定的指南（而非民意），并表现出反政治倾向。

迄今为止，关于技术官僚态度的研究仍较为有限。首项基于调查数据的研究（普特南，1977年）针对公务员的技术官僚心态展开，但其关于客观性、政治中立性及科学决策观的条目同样适用于普通公民。“隐形民主”概念（希宾与泰斯-莫尔斯，2002）通过评估公民对减少直接参与、转而非民选专家或商界人士高效决策的偏好来衡量。研究发现，相当比例的美国人欢迎这种能绕过政治分歧与分裂的、更客观高效的治理方式。⁶³近期，Bertsou 与 Pastorella（2017）采用“专家而非政府”主导政治决策的调查项目作为技术官僚态度的替代指标，探究其在欧洲各国的形成因素与差异根源。伯特苏与卡拉马尼（2017，即将发表）则在九个欧洲国家实施了技术官僚态度的创新性问卷调查。

目前对持技术官僚主义积极态度的公民知之甚少，但可以推测“技术官僚公民”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特征（如较高教育水平）和态度特征。

（例如对政党及议员的信任度较低，同时对政治表现出高度兴趣与能力）。事实上，新调查的初步结果正指向这一方向。通过纳入左右立场等变量，还能验证技术官僚制在个人层面宣称的‘中立性’是否成立，进而预测‘技术官僚公民’的投票行为。

在一个民主政体中，这类公民群体规模越大，对代议制民主的挑战就越强烈，因为这种民主将缺乏公民参与并认可其合法性的必要广泛支持。在所有挑战中，认为自己应当退出政治的公民群体，对自由主义民主理念而言无疑是最令人担忧的——尤其是当这种担忧与另一类持有民粹主义态度的公民群体交织时，后者坚信精英阶层必然腐败堕落。迄今为止，研究中只涉及了民粹主义的挑战；而技术官僚主义的加入可能会导致一个更黯淡的前景，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过去两个世纪中代表制民主所面临的风险。⁶⁴

结论：技术官僚挑战是威胁还是矫正

过去两百年间，现代政治始终在寻求平衡：既要满足主权国家自我治理（即“民主”）所固有的民众参与诉求，又要兼顾基于能力选拔领导者的社会需求，以及现代化国家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对社会复杂性提出的效能要求。民主包容性回应前者，理性国家则回应后者。代议制民主正是这两类诉求的完美融合。

民主的双重性特征已被多角度阐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卡诺万（1999）提出的民主的“救赎性”与“实用主义”两面，以及桑切斯-昆卡在第二章中提出的“凝聚性”与“自由主义”属性。前者以信仰与救赎为基础，后者则依托规则与制度。从达尔提出的民主化维度来看，前者主张广泛包容（动员与参与）和竞争机制（达尔，1971年）；后者则体现为非自由民主与非民主自由主义的对立（蒙克，2018年）。前者兼具合法性与响应性，同时追求效率与责任（梅尔，2009年；沙普夫，1999年）；后者则表现为对抗性民主与无冲突社会中管理行政的对立（穆夫、拉克劳与罗桑瓦隆）。这种二元性——无论是国家与民族、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制（卡拉马尼，2017年），还是“主权”与“政府”的对立（比克顿与因韦尔尼齐·阿切蒂沿袭卢梭理论，详见第一章——构成了本导论的起点。尽管民粹主义常被视作民主的影子，或是不时浮现的幽灵（阿尔迪蒂，2004年），但技术官僚制却并非如此——本书试图完善这一图景。

图1.1展示了代表性机构及其最成功的解释者（即“责任方”）所实现的“桥梁”作用（McCall Rosenbluth和Shapiro 2018）。尽管代议制民主与民粹主义存在共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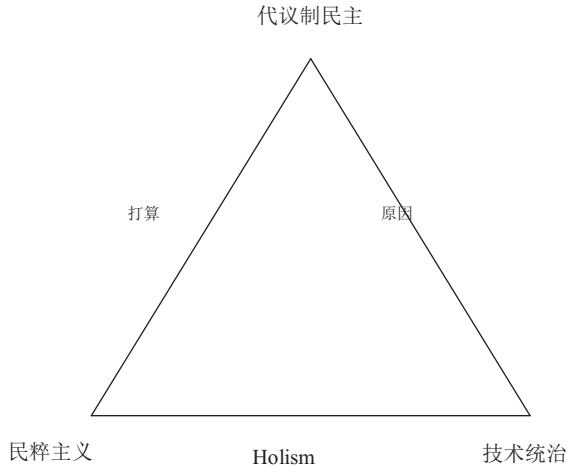


图1.1 代议制民主、技术官僚制与民粹主义的三角关系

尽管存在不完全重合，但代表民主通过多种民主渠道（从群众政党、选举到直接民主，以及由公民权利保障的其他形式，这些形式在空间和时间上存在差异）展现出广泛的包容性和民众参与。代表民主与技术统治虽有共同点，但同样存在不完全重合，其有效治理和相互制衡机制体现为权力分立、少数群体保护及自治领域（独立司法和货币政策）。两者最大的分歧在于对社会“一体性”的观念——这种整体性理念是民粹主义和技术统治共同反对多元主义、党派政治和特殊利益的共同立场。相反，民粹主义最大的分歧在于“理性”或“真理”（Shils 1956），而技术统治的最大分歧则在于“人民意志”，即民主的救赎性或凝聚性理念。

在不同历史时期，各国政治体制在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的两极间不断摇摆。即便是代议制民主国家，其内部也存在国家间差异，且随着时间推移，政治形态会在两极间持续演变。超越代议制民主范畴，没有任何“激进”民主政体能彻底消除那些独立于民众支持或对抗性政治的官僚机构。同样，即便是那些接近“技术官僚国家”形态的政体，也始终无法摆脱其制度背后民众动员的现实。然而，若固守静态图景则有失偏颇。即便在制度稳定时期，对两极化诉求的呼声也从未停歇。当下正是这种双重诉求的典型体现——既要求扩大民众参与度，又需要强化...

有效性——这需要较少的民众参与。尽管代议制民主长期以来在弥合这些相互矛盾的需求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其在当今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正受到质疑。

这正是本书要探讨的“挑战”。首先，这种“挑战”究竟存在到何种程度？何时会演变为威胁？其次，现有代表性机构能否应对这些相互矛盾的要求？大量文献聚焦于民粹主义的挑战——即当实用主义过度膨胀时，对实用主义与救赎主义之间不对称性的反应。本书则迈出了更平衡分析的一步，将另一种挑战（或潜在威胁）纳入考量：即在民主问责之外，那些缺乏响应性、反多元主义且缺乏自主性的政策制定，尽管仍受社会主导阶层影响，但其诉求表达方式却非主流。

将代议制民主包装成连接民众参与诉求与理性有效政策制定的桥梁，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当对技术官僚制的诉求何时不再构成威胁，反而成为改革性动力？学界已多次论述民粹主义通过重新引入竞争机制与参与（或包容）可发挥矫正作用⁶⁵。技术官僚制同样需要这样的改革路径，结论部分的任务正是要回答它究竟是民主的盟友还是敌人。针对选举主义、过度反应及迎合大众需求的倾向，以及民粹主义本身，技术官僚制的诉求或许能产生“良性”效应——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中注入专业素养、能力储备与长远规划。这种矫正机制还能限制多数主义对少数群体的保护。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愿景，其以保护自由作为民主制度的终极目标（参见第二章）。在以抗议性表达为主导的语境中，程序、法治、权利与制度可能需要重新确立其作用。此外，当政治分化到使多数主义（尤其在属性性分歧背景下）变得危险时，去政治化或许是一种必要的限制。⁶⁶作为矫正措施，技术官僚制可在不同层面发挥作用：制度层面、人员层面以及更知情、有能力的公民层面。

当民粹主义不再为制度内的更多包容、参与和平等提出正当诉求，也不废除那些限制权力、破坏公平竞争的规则与权利时，它便对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构成威胁。技术官僚主义的威胁在于：当它不再作为公民、媒体和政党进行负责任辩论的技术专长，不再为各方提供关于不同“聚合”方案的评估依据，转而用不负责任的科学共识幻象取而代之时。⁶⁷当它设定超越民主控制的目标——即完全自主时，这种威胁便显现出来。

代议制民主是复杂大众社会在平衡民众参与、包容性与政策响应性及问责性（一方面）与专业性、决策效率及政策实效性（另一方面）时进行的“实验”——换言之，即投入的合法性与产出的合理性。如同谚语中的自行车，其平衡需要持续调整。本卷所述的技术官僚挑战可被视为

这既是对抗民粹主义浪潮引发的失衡的制衡，也是对代议制民主自身‘过度矫正’的反制——若过度干预，反而会威胁到民主制度。显而易见的是，自行车要前进就必须保持平衡。为此，需要有参与度高、能力强且支持的公民，他们认同制度并对其产生归属感。

记下

- 1 对两次“革命”的标注源自Rokkan（1970年）。“双革命”这一表述则来自Bendix（1964年）、Mann（1993年）和McNeill（1963年）。
- 2 关于人民的“发明”，可参阅Kalyvas（2005）与Morgan（1988）；关于“想象的”民族，参见Anderson（1991）。民族主义相关研究，可参考Gellner（1983）。政治民族化过程的探讨，可参阅Caramani（2004）。
- 3 从柏拉图的哲学王到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洋*和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再到当今的“监护制度”，这种乌托邦思想反复出现。
- 4 这些变革并非偶然地伴随着社会科学及社会教育政策的诞生。马克斯·韦伯（1922年）专门对官僚国家进行了分析（参见Poggi 1978年研究）。
- 5 在当代学术语境中，这种张力表现为响应型政府与责任型政府的对立（Mair 2009），或民主参与与有效产出合法性的冲突（Scharpf 1999）。
- 6 Caramani（2000）对民主化进程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引用了相关历史文献。关于不同形式的政治代表制，可参阅Manin（1997）、Pitkin（1967）及Urbinati（2006）的论述。
- 7 正是马宁（1997）谈到了选举对“抽签”的“胜利”和“民主贵族”，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修辞，捕捉到了民主/效率的二元性。这种双重民主概念是桑切斯-昆卡第二章的主题。
- 8 政党在协调公众诉求与责任要求之间的双重角色，最早由伯奇（1964）和达尔（1956）提出。正因如此，沙茨施奈德将现代民主描述为“唯有政党制度才可实现”（1942:1），萨托里则将公民定义为“通过由党派代表”（1968: 471）。这种政治架构后来被学界称为“责任政党模式”（APSA 1950）。
- 9 精英主义批判在米歇尔斯、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莫斯卡和熊彼特等理论家的著作中最为明显。民粹主义批判则可追溯至卢梭和施密特。达尔（1956）、奥唐奈（1994）与里克（1982）的著作中可见其与多元主义的对立观点。近年来，拉克劳（2005，另见拉克劳与穆夫1985）和罗桑瓦隆（2011）的研究亦呈现类似立场。
- 10 民粹主义领域的主要贡献者包括 Albertazzi 和 McDonnell（2008）、Canovan（1999）、Kriesi（2014）、Meny 和 Surel（2002）、Mudde（2007）、Mudde 和 Kaltwasser（2012）。关于民粹主义民主观的理论研究，可参阅Urbinati（1998,2014b）。
- 11 关于技术官僚制的文献包括Centeno（1993,1994）、Dahl（1985）、Dargent（2015）、Fischer（1990,2009）、Meynaud（1969）、Radaelli（1999b）和 de la Torre（2013），这些文献均被引用于本引言部分。
- 12 这些共性与差异在Caramani（2017）中进行了详细讨论。
- 13 这是伊士顿的表述（1953年）。另见拉斯韦尔的“谁得到什么”逻辑（1936年）。
- 14 在新自由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对民主作为自治的批判中，市场作为集体决策工具，并不被视为技术官僚主义的实例（参见第二章 作者：Sánchez-Cuenca。

- 15 此外，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桑切斯-昆卡在第二章讨论的弗吉尼亚学派与罗切斯特学派），由于通过民主方式汇总偏好会产生任意结果（阿罗1951，里克1982）。
- 16 皮特金（1967）将积极表征定义为“代表他人利益的行为”，与涉及“存在”而非“行动”的象征性或描述性表征形成对比。政治行动的长期目标可能涉及未来世代，这被称为“责任”（戈茨2014，马加洛尼2006，汤普森2010）。皮特金将整体性要素称为“非依附性利益”（区别于各社会群体特有的主观利益），而雷菲尔德（2009）则称之为“惠及所有人”。关于技术治理的表征特征综述，可参阅卡拉马尼（2017:60-61）。
- 17 从术语学角度而言，“技术统治”（technocracy）指代权力（并延伸为一种政治合法性与代表形式）——即通过技术知识（如金融、环境等）所获得的权力。）——正如该术语中的*cracy*所暗示的那样（尽管托尔托拉在第3章中将它扩展到决定手段而非目标的权力）。
- 18 这种聚合通过选举竞争、利益代表及其他形式的政治系统“输入”，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多元民主。对多元主义的怀疑态度与民粹主义具有共同特征，后者反对精英主义，坚信人民意志而非科学理性。
- 19 关于美国技术官僚运动的发展历程，可参考阿金（1977）与埃尔斯纳（1967）的研究。苏联、神权政体或军事政权或许能作为典型案例（详见霍夫曼与莱尔德1985年关于技术官僚社会主义的论述）。森特诺（1994）将这一术语应用于1990年代萨利纳斯“革命”（萨利纳斯特罗伊卡）期间建立的墨西哥国家体制。
- 20 技术统治被定义为话语（见下文和第5章），它可以成为行动者（无论是否被认为是技术统治者）使用的工具，就像非民粹主义行动者可以发表民粹主义言论一样。
- 21 马克斯·韦伯对现代国家官僚制的论述是经典参考。重商主义、人口迁移（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增强了国家作为‘国家科学’通过统计手段监控社会的‘控制能力’（Flora 1977: 114）。关于国家统计学的起源，可参阅Caramani（2000: 1005-15）的论述。
- 22 正如蒂利所言，“战争”（即国际竞争）与国家发动战争同样重要。从沃勒斯坦（1974:348-49）到森特诺（1994:21-26）的全球体系理论，都强调了竞争在西方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森特诺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墨西哥案例。该理论进一步指出，国家不仅需要在超国家体系中参与竞争，还需“适应”这些体系，因此必须依赖经济与法律领域的专业能力。
- 23 工业革命研究者们明确指出，其起源在于欧洲的领土分裂，而非中国等帝国政体。参见Landes（1969年）的研究。
- 24 关于政党因与国家关系密切而脱离社会的后果，以及政党间日益增长的意识形态相似性削弱选举中‘选择’的广泛综述，可参阅Mair（2009）及Bardi等学者（2014a, 2014b）的研究。
- 25 非多数制机构被归类为第二类治理（Hooghe和Marks，2003年）。关于拉丁美洲总统如何通过技术官僚应对此类复杂性，可参阅Schneider（1998年）的研究。
- 26 不出所料，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纷纷组建技术官僚内阁，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由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洲中央银行组成的国际金融官僚团队（即‘三驾马车’）开始介入，正如

24 达尼埃莱·卡拉马尼

希腊金融危机案例。关于技术官僚内阁的任命，可参阅马尔科·瓦尔布鲁齐在第六章的论述，以及Wratil和Pastorella（2018年）的研究，以及本引言后续部分。

- 27 用皮特金（1967）的术语来说，这种认同是“非附着的”，即并非源自个体偏好的聚合。早在经典精英分析中，米尔斯（1956）就已指出公共领域整体的去政治化趋势。
- 28 在社会学领域，圣西门、孔德与卡尔·曼海姆（相关研究可参阅Fischer 1990及2009年著作）等思想家的观点亦可见诸文献，甚至古希腊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亦有类似论述。关于非多数制制度的探讨，可参考Thatcher与Stone Sweet（2002年）的研究。
- 29 参见Bickerton与InvernizziAccetti（2017）、Bourdieu（2002）、Laclau（2005）、Laclau与Moufe（1985）、Pettit（2004）以及Rosanvallon（2011）关于福利国家与市场作为消除冲突的‘统一逻辑’的去政治化倾向。
- 30 这种政党愿景并未涵盖其为社会共同利益制定愿景与项目（尽管是替代性方案）的能力。这更像是一种整体协作的视角，如同机器或身体中各部件协同运作的景象。
- 31 技术官僚制中的多元性被简化为正确（专家）与错误（无能者）的对立，正如民粹主义中所体现的那样，其对立被简化为有德之人与腐败精英之间的对抗（参见Caramani 2017:64）。
- 32 对于以“协调”而非政府职能为主要目标的政党（如小众或单一议题政党）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
- 33 责任方模式的这一特征在政党制度中表现得更为显著，这类制度通常具有更严格的党纪和更强的凝聚力（Birch 1964, Katz 2014），且具有国家化特征（Caramani 2004,2015:284–86, Pierce 1999, Pitkin 1967: 175）。
- 34 在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1977年关于公务员心态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公务员心态具有客观性、政治中立性、科学性等特征。
- 35 根据宪法或条约所载意识形态内容的深度（或其被视为意识形态驱动的程度），司法机构同样会丧失中立性。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欧洲法院（ECJ），其裁决依据欧盟条约。由于这些条约涉及具体政策，ECJ并非意识形态中立的机构（Schmidt2018）。关于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可参阅Arce（2006）、Biglaiser（2002）、Boylan（1998）、Conaghan and Malloy（1994）、Silva（1991）以及Teichman（1997,2002,2004）的研究。
- 36 关于“责任性与响应性”之争的批判性论述，可参阅Goetz（2014）的著作。
- 37 关于响应型技术官僚制，参见Rauh（2016）。关于风险，参见Rothstein（2006）和Rothstein等人（2006）。关于声誉风险，特别是对公众、媒体和政界人士的问责问题，参见Gilad（2015）和Maor与Sulitzeanu-kenan（2016）。
- 38 “不负责任”虽非理想表述，但相较“不负责任”（尽管“责任”有时被用作“问责”的同义词）而言，其误导性更小（Sartori 1976: 19）。尤其在议会制国家，后者特指前文所述的另一种代表维度——即“良善”与长期执政。
- 39 关于预期表征，参见Mansbridge（2003年）。
- 40 自伯克探讨爱尔兰天主教代表与美国殖民者在议会中的存在作用以来，政治代表领域的研究便持续关注‘存在’对‘行动’的影响（特别是信息供给功能）。相关论述可参阅曼斯布里奇（1999）、威廉姆斯（1998）及杨（2000）的著作。
- 41 关于存在政治与思想政治的讨论，可参阅菲利普斯（Phillips，1998）的研究，但该学者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存在及其被弱化的“社会意义”。
- 42 本文未探讨表征的另一维度——符号表征。关于该主题的简要讨论，可参阅Caramani（2017:62–63）及后文脚注60。

- 43 关于技术官僚作为代理人或行为者的论述，可参阅Dargent（2015：14-19）。
- 44 这是对国家与官僚自治的更普遍观点（Skocpol 1985:9）。当然，对于那些声称其立场由理性分析所塑造的专家而言，谈论“偏好”是存在问题的。
- 45 工具主义对技术官僚角色的阐释将专家视为“工具”。但严格来说，根据上述定义，作为行动主体的技术官僚机构及其人员已不再具备“技术官僚”属性——他们不制定价值标准，仅作为执行者行事。这类人员仍停留在技术人员和专家的层面，缺乏决策权。技术官僚的本质在于：他们独立于群体制定并追求目标，其判断依据是基于专业知识的个人判断。
- 46 这些水平是相互关联的。界定技术官僚的资格标准至关重要，这有助于评估特定内阁中技术官僚成分的占比（第六章），并分析其对政策制定及谈判行为的影响（第七、八、十章）。同时，将机构或行为体归类为技术官僚有助于解读其话语体系（第九章），并评估选民对其的支持度（第十一、十三章）。
- 47 关于国家的理性功能，可参阅Birnbaum（1988）和Badie与Birnbaum（1983）的研究，他们并非偶然地将强大的中央集权法国国家作为参照。这也揭示了一个悖论：技术官僚虽常力挺新自由主义，却需要国家来推行改革（关于‘正统悖论’，参见Kahler1990、1992）。
- 48 爱德华多·达让特的第12章对技术官僚活跃于拉丁美洲的政权进行了回顾。其论点是，技术官僚（拉丁美洲文献中称为“专家”）因其在复杂事务上的专业知识而成为至关重要的技术官僚，但专家们也利用他们的知识积极建立自己的自主权。因此，清除它们的成本持续上升。
- 49 关于20世纪90年代自治且最终不相容的技术官僚对民主质量的更具体负面影响，可参阅Centeno（1993）、Centeno和Silva（1998）、Conaghan和Malloy（1994）以及Teichman（1997）的研究。Dargent（2015）的分析证实了非民选行为者对民选政治家的长期支配作用，以及拉丁美洲民主制度的严重缺陷。
- 50 关于司法机构是否属于技术官僚体系，学界始终存在争议。但若从其对政策制定和价值分配的影响力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在高度“司法化”的司法环境中，宪法审查与权利裁决俨然成为政策制定的延伸，甚至直接参与立法修订（参见萨杜尔斯基2013年、夏皮罗1964年及夏皮罗与斯通1994年的研究）。这种技术官僚特质的佐证，正是民粹主义者将法院称为“人民公敌”的论调。
- 51 关于这些案例，可参阅Brunclik（2015）、Marangoni和Verzichelli（2015）、Pastorella（2014,2016）以及Pasquino和Valbruzzi（2012）。
- 52 不同语言对这类个体行为者的标注存在差异。有影响力的拉丁美洲文学经常使用*tecnicos*（或*technocratas*，与*topolíticos*相对）；同样，意大利语会使用*tecnici*（或*technocrati*）。
- 53 这与亚历克西阿杜在第七章中提出的“技术政策”存在差异。另见Alexiadou和Gunaydin（2019）以及乔因甘（2011）。
- 54 科利尔对技术官僚的定义包含两个核心要素：“[具备高水平专业学术训练的个体，其专业素养是选拔他们担任大型复杂组织（包括公共和私营机构）关键决策或顾问职位的主要依据]”（科利尔，1979：403）。
- 55 这一功能既见于前文所述的责任方模型，亦见于后续文献中关于“党派技能”（Rose 1969）与“官员招募”（Sartori 2005, Katz 1987, Mair 2008）的论述。

- 56 本书特别涵盖了这样一个超国家组织——欧盟:参见Costa Lobo和McManus关于欧盟政策合法性的第11章,以及Van der Veer关于欧盟应对能力的第4章,这些都涉及这一层面的治理。
- 57 本节聚焦于论述层面,同时也涵盖可定义为技术官僚主义的行为(例如,以负责政策为名对选民偏好作出不响应的决策)。
- 58 本文未探讨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 59 关于两种定量内容分析方法的比较,可参阅Rooduijn和Pauwels(2011年)的研究。
- 60 巴西国旗上镌刻的‘秩序与进步’字样,彰显了1889年确立的共和主义蓝图。这一蓝图蕴含着实证主义理念,主张由开明精英阶层依据科学方法治理国家,以推动工业化进程并实现社会福利。这种等级森严、社团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观,也深刻影响了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墨西哥,弗朗西斯科·G·科斯梅斯等思想家便是典型代表。
- 61 这种论述延伸至个别代表,对其代表“角色”的解读存在差异,更多将其视为受托人而非选民的代表。可以预见,民粹主义代表会将自身角色视为传达人民意志,而技术官僚型代表则对这种意志的响应性较低。
- 62 关于民粹主义态度,可参考Akkerman等学者(2014,2017)、Castanho Silva等学者(2019)、Oliver与Rahn(2016)、Schulz等学者(2017)以及VanHauwaert与VanKessel(2018)的研究。
- 63 调查问题包括:(1)「政客们若能停止空谈、专注于解决实际问题,国家会更好」;(2)「政治妥协实质上是出卖原则」;(3)「若将政治决策权交给成功的企业家,国家治理将更有效」;(4)「若将政治决策权交给专家而非政客和公民,国家治理将更有效」(希宾与泰斯-莫尔斯,2002)。类似观点的最新案例可参阅Ruiz-Rufino与Alonso(2017)的研究。
- 64 当学者们宣称民主是无知与非理性的统治时(尽管这呼应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关切,布伦南2016),这种挑战的强度以及对代议制民主现状的悲观看法便愈发凸显。此类观点批判公民的能力,指出政治参与和民主协商往往会使人更加非理性且带有偏见。知识统治被援引为“知识者的统治”,以取代公民民主。
- 65 这是激进民主主义的立场。Laclau和Moufe(1985)尤其主张通过对抗与竞争来纠正卡特化、意识形态趋同、宪政主义、共识、市场和福利管理。关于概述,可参阅Rovira Kaltwasser(2012)。
- 66 欧盟的案例具有特殊意义,与其他联盟民主国家的情况相似,因其指令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这使其区别于联合国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其他超国家组织。与所有多元文化政体一样,由于国家间存在属性化的裂痕,多数主义在此类政体中无法适用。
- 67 关于这些观点,可参阅Dickson(1981)、Habermas(1970)和Ofe(1973)等人的著作。

第一部分

概念与理论



Taylor & Francis

Taylor & Francis Group

<http://taylorandfrancis.com>

1 技术统治与政治理论

Christopher Bickerton 和

卡洛·因韦尔尼齐·阿切蒂

导论:对古典与当代的批判

技术官僚主义的概念始终是当代政治讨论的核心议题。2011年11月欧元区经济危机最严重时期，意大利和希腊的总理均由被广泛视为技术官僚的人物接任（多纳迪奥，2011；韦尔尼与博斯科，2013）。在关于欧盟所谓“民主赤字”的争论中，其机构常被描述为技术官僚性质（Føllesdal 与希克斯，2006；哈贝马斯，2015；马约内，1998；莫拉夫奇克，2002）。最后，在2016年“脱欧”公投前的讨论中——以及此后美国、法国等国的多次大选中——这种选择常被框定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技术官僚主义”的对立（比克顿，2016；比克顿与因韦尔尼齐·阿切蒂，2015；卡拉马尼，2017；朱尼与鲁比内利，2015；因韦尔尼齐·阿切蒂，2016；伦纳德，2017）。

支撑这些技术官僚制论述的核心假设是：该制度以专家权威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根基。学术界对该术语的定义正体现了这一前提。让·梅诺在其1969年关于该主题的开创性著作中，将技术官僚制定义为“由技术训练有素的专家凭借其专业知识及在主导政治经济机构中的地位行使统治权的政府体制”（梅诺1969:31）。类似地，在当代案例中，邓肯·麦克唐纳与马可·瓦尔布鲁齐提出了将总理或部长归类为技术官僚的三项标准（另见瓦尔布鲁齐，本卷第六章关于技术官僚内阁的论述）。第一项标准是：在任命时，其从未以政党名义担任过公职；第二项标准是未成为任何政党的正式成员；第三项标准则是需具备“被认可的非党派政治专长，且与政府所担任的职务直接相关”（麦克唐纳与瓦尔布鲁齐2014:657-58）。

由此定义可知，技术官僚制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张力。民主建立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同一性”的原则之上，其中“人民”被构想为.....

政府不仅是其主体，更是政治合法性的终极基础（博比奥2005，达尔1956，哈贝马斯1989，凯尔森1929）。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技术官僚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合法性原则。该术语意味着，某些人凭借其技术能力或行政专长，能够合法地统治他人（森特诺1993，森特诺与席尔瓦1998，达让特2014，费舍尔1990,2009，拉达埃利1999b）。

本章我们并不否认技术官僚制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张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今技术官僚制的拥护者鲜少直白地强调这种矛盾。相反，当代技术官僚制的论点往往以技术官僚制与民主制度的互补性为理论基础。学者指出，技术官僚制的政治架构通过提升特定政策领域的“产出合法性”（Scharpf 1999），从而强化了民主政府体系的整体效能。因此，Claudio Radaelli在本章中区分了我们所称的经典技术官僚制论证，即“主张专家直接掌权”，以及更当代的论证，即“在形式上尊重民主价值观和制度”（Radaelli1999b:24）。

当代技术官僚制理论的提出，旨在为专家在政治体系中开辟相对自主的决策空间——这个体系仍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身份认同”的民主理想作为合法性根基。以国家层面为例，专门负责特定政策领域的“准自治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埃尔吉2006，吉拉迪2002，罗桑瓦隆2011）。类似现象也体现在将具体政策权限下放给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等超国家机构（比克顿2012,2016；马约内1994,1996；莫拉夫奇克2002）。

本章指出，尽管常有人提出技术官僚制与民主互补的论调，但当代支持技术官僚制的论点仍对民主集体自治理念构成重大挑战。这些论点通过隐含假设民主决策领域与技术官僚决策领域的界限本身即属于技术专长范畴，最终将专家而非“人民”置于主权地位。由此，民主与技术官僚制的关系再次引发一个核心问题：在一个政治体中，终极权威究竟应归属何处？当代关于民主与专业知识互补性的主张，回避了这一更根本的冲突——这种冲突正是现代社会发展及其对专家知识依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哈拉德·拉斯基1931年在《专家的局限》小册子中所言，专家应当“随时待命，而非高高在上”（拉斯基1931）。这一原则在理论上比在实践中更容易表述，但在实践中却难以落实。关于最终管辖权归属的问题，随着具体事态发展和政策创新的不断涌现，这一议题始终被重新提出，这一点在本章后文对欧盟民主赤字的讨论中已得到充分印证。

为论证这一点，本章将分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通过探讨，重构了技术官僚制的“经典”论点。

在作者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柏拉图以最有力且持久的方式构建了这一理论框架。我们揭示了他主张赋予哲学家权力的论证，其核心在于将古典希腊政治文化中原本严格区分的两个领域——被理解为“自我实现”领域的政治，与被视为满足物质“需求”领域的经济学——进行了融合（阿伦特，1958）。这种融合使柏拉图得以将政治描绘成一种技艺，即需要特定知识的“艺术”或“工艺”。基于此，柏拉图主张唯有掌握此类知识的人（即他所称的哲学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专家）才应享有统治权，而无需征求民众的同意。

在本章的第二部分，我们指出，尽管这种“古典”技术官僚制的论点在今天的一些圈子中仍然存在，但将权力移交给专家的主要理由是分离不同政策领域。虽然某些领域应当通过民主程序由“人民”来决定，但另一些领域则因各种原因更适合由专家决策。技术官僚制绝非民主的替代品，反而能补充并增强民主的合法性。在第二部分中，我们指出这种论点存在多种表现形式，并列举了若干用于界定技术官僚政策领域与民主政策领域边界的不同标准。然而我们注意到，这些不同观点都基于一个共同假设：不同政策领域的边界本身属于技术专长范畴，因此不应受政治博弈动态影响。这种论调最终将民主集体自治的行使置于技术能力的先决条件之下，从而破坏了民主政治中常见的授权链条。我们还可以看到，当代技术官僚权威的赋权实践与更广义的“自由主义宪政”（埃尔斯特与斯拉格斯塔德1988年，霍姆斯1988年）存在明显差异。后者虽致力于强化非多数制机构，但这些机构的设立本就是与实现人民主权相关的更广泛宪政安排的一部分。正如马丁·洛格林所言，自由主义中的非多数制要素，与其说是对人民自治基本原则的限制或外部约束，不如说更应被视为该原则的体现或阐释（洛格林2003年）。

当代将权力委托给技术官僚机构的实例不属于任何此类宪法时刻，它们的合法性更多地取决于对某些政策领域特定特征的假设。¹技术官僚与司法权力之间的区别也是如此。法律领域具有专业性特征，法院实践要求冲突必须去政治化，且双方均接受第三方仲裁（Bickerton 2017, Carr 1995）。然而，法律本身源于民选机构的审议与决策，因此

司法权与技术官僚制之间的界限已十分明确。正如安东尼·金所言，近年来法官引发争议并非源于他们试图以牺牲议会或行政部门为代价扩大权力，而是因为政客们邀请法官作出有争议的裁决（2015:273）。

本章第三部分指出，相较于柏拉图及其后继者提出的古典论证，当代技术官僚制的辩护方式对民主政治体系更具破坏性。柏拉图式的技术官僚制论证将其视为乌托邦理想，可作为民主政体内部政治项目的理论基础（例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技术官僚制”运动）。而当代技术官僚制的论点则通过预先划定技术官僚制与民主制度各自合法性的客观边界，从根本上消解了公众对二者优劣进行公开辩论的空间。

技术官僚制的古典论证

学界普遍认为，柏拉图主张哲学家应当执政的论点，其理论基础在于他先前对政治作为技术的界定——这个术语现多译为“艺术”或“技艺”，但在柏拉图的论述中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哈维2009，瓦迪亚1987，怀尔德1963）。该概念的两大核心特征在于：一是以特定目标为导向的活动理念（*ergon*），二是要求具备特定知识体系的前提（*episteme*）。柏拉图最常引用的两个典型例子是：医学——其目标被设定为“健康”，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知识是“人体知识”；以及他所谓的“牧羊业”，即放牧绵羊，这需要了解“绵羊的天性及其需求”（班布罗1963）。类似地，柏拉图认为政治的目标是“人类的放牧”（*The Statesman*: 267c），而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知识则是“人性知识”及其“需求”。

在此基础上，柏拉图得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结论：哲学家（即掌握特定知识因而具备相应技能的人应当统治社会。以《政治家》的对话为例，主人公曾断言：“医生堪称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无论他们是否违背我们的意愿治愈我们——通过手术、烧灼或其他方式施加痛苦——只要他们以技艺或科学手段行使权威，我们仍称其为医生”（293b）。类似地，该角色进一步补充道：“在各种政体中，唯有当统治者真正掌握科学而非仅表面拥有科学时，这种政体才是至高无上的正确选择，无论臣民是否愿意”（293c）。

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技术统治的经典论点的核心。然而，仍然需要解释的是柏拉图认为政治可以被理解作为一种技术的基础。一些评论家已经提出了建议

他只是“将此视为理所当然”（如Accattino 1997: xv），但这意味着他对技术官僚制的全部论证不过是偷换概念。实际上，柏拉图提出了有力论证来支撑其核心前提。在《理想国》中，当苏格拉底与阿德曼托斯开始构建柏拉图的“理想城邦”时，苏格拉底明确指出人类最初建立城邦的根本原因在于满足物质“需求”。“城邦的起源”，他如此阐述，

关键在于我们都不具备自给自足的能力.....因此，不同个体会与某人结成同盟以满足特定需求，又与他人结盟以满足不同需求。面对这种多样化的诉求，他们可能将众多伙伴与盟友聚集于同一居住地，而我们便将这种共同居住称为城市（269b-c）。

这一前提标志着与柏拉图所处时代（及其批判对象）的古雅典政治文化核心特征的彻底决裂。汉娜·阿伦特（1958）和摩西·芬利（1973）都强调，古典希腊政治文化明确区分了家庭（被理解为满足“物质需求”（即生产与再生产）的领域）与城邦（被理解为自由人平等相聚、共同追求“自我实现”的领域）的范畴。从这一视角来看，“经济”被理解为适用于家庭的一套规范（*诺莫斯*）。正如阿伦特进一步指出的，这些规范必然具有“专制”性质，因为满足物质需求是一种允许存在正确与错误方法的技艺。相比之下，城邦则被假定为自由人基于平等相遇、集体追求个人“自我实现”的领域（阿伦特1958:28-37）。

柏拉图提出人类最初进入城市是为了满足物质需求，这一主张彻底颠覆了传统认知框架，暗示政治本质上就是他同时代人所说的经济活动。这正是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1252a:1-7）开篇对他的批判。通过将政治与经济领域混为一谈，柏拉图得以主张政治是一种技艺，因此只有掌握特定知识的人才能统治。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希腊人认为满足物质需求是一门科学，因此需要特定知识才能正确实施。相比之下，政治活动的独特之处在于以平等身份与他人相遇，并为实现共同自我价值而携手行动，这种活动并不需要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具备特定知识。

这一观点以神话形式体现在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中，主人公试图用民主制度来对抗苏格拉底基于能力的教育理念。他认为，虽然其他“技能”最初由神明以不同比例分配给不同动物和人类，但“政治能力”却被平等分配给所有人（320d1-322a2）。更深层的含义在于：若将政治视为自由的领域，并以参与者“自我实现”为导向（而非

如果政治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那么严格来说就不可能存在于政治科学。人类只有在被允许以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方式追求自我实现时，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正因如此，我们认为柏拉图将政治视为技艺的论点，其前提在于将政治与经济领域混为一谈。这种做法将自由概念从政治领域剥离，从而将政治降格为一门以满足物质需求为导向的科学实践。

柏拉图在《政治家篇》的对话中对此有明确阐述。当主角提出“政治家、国王、主人和管家是否同为一类人，还是各自对应一门学问？”（358e）时，他随即自答：“大宅可比作小国”，由此推论：“所有这些都属于同一门学问，且……这门学问可称为‘王政学’、‘政治学’或‘经济学’——我们不必争论名称”（359c）。柏拉图进一步区分了“真正的政治家”与“单纯的政客”，谢尔登·沃林通过关注两者所代表的不同“选民群体”来阐释这一概念：

这位广受欢迎的统治者之所以能掌权，关键在于他善于洞察民众情绪与诉求，善于权衡各种变量并寻求灵活应对方案……相比之下，柏拉图式的统治者则拥有不同的群体基础，因为他首先并非“政治人物”，而是一位被赋予政治权力的哲学家……遵循真正的治国之道，[他]遵循哲学所揭示的认知规律，履行了哲学家追求真理的使命。当统治者遵循哲学家的艺术准则而非社会意愿时，其统治目标与社会利益完全契合，从而满足了统治者的正当诉求（沃林 2004: 42-43）。

若将前文中的“哲学家”替换为“专家”，我们便能清晰地看到当代语言中仍被广泛认为区分技术官僚与职业政治家的核心标准。职业政治家主要对“社会意愿”负责，而技术官僚则首要对“真理”负责。柏拉图最初提出这一区分，旨在论证反对民主制度——他认为，若政治家既要对“社会意愿”负责，又无法履行“真正政治家”的核心职能，这种矛盾便暴露无遗。因此，古典技术官僚制理论的核心，实则是（主观）自由与（客观）真理之间的根本对立。

当代技术官僚制的论辩

尽管柏拉图式技术官僚制的论证在后世数百年间始终是政治常识的基石，但现代民主时代的技术官僚制对民主的批判策略已发生转变。在此背景下，某些明确反对民主的技术官僚制论点被提出。

例如，所谓“技术统治”运动在大萧条初期的美国兴起（阿金1977，埃尔森1967），这种思潮的回响至今仍存在于硅谷及其周边地区盛行的“技术解决方案主义”中（克林1996，莫罗佐夫2014，施密特与科恩2013，塞格尔1985，蒂尔2014，特纳2006）。但总体而言，主张用技术统治取代民主的理念已逐渐式微。

然而，将权力从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治家”手中转移给自认为更胜任的“专家”这一政治构想，远未走到尽头。当代技术官僚制的论据已呈现出新形态。相关案例不胜枚举：既有对“知识统治”的哲学探讨，也有科技研究领域关于“专业知识政治”的大量著述（柯林斯与埃文斯2002年、埃斯特伦德2008年、费舍尔2000年、霍尔斯特2012年、贾萨诺夫2012年、德弗里斯2016年）。本章通过分析学界关于欧盟所谓“民主赤字”的持续讨论，探讨当代技术官僚制的论点。与欧盟自身民主属性的争议并行的是，学界已形成大量文献主张：欧盟的设立初衷在于补充国家层面民主自治的运作。其实现方式是将特定政策领域“隔离”于民主博弈之外，从而让专业人才能以更专业的手段进行规范（如马约内1998年、蒙蒂与古拉德2012年、莫拉夫契克2002年研究）。这些文献虽承认欧盟存在技术官僚制的指控，但认为这种机制有助于提升欧洲整体民主质量。

尽管欧盟作为一个政治体系与国家层面的制度存在差异，但关注欧盟的“民主赤字”辩论仍具有充分理由，这有助于考察技术官僚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一方面，鉴于欧元区危机以及意大利和希腊技术官僚政府的教训，学界和政界围绕这一议题展开了大量讨论，重点恰恰在于界定技术官僚体制的合法性（或缺乏合法性）（例如贝尔苏和帕斯托雷拉2017年、帕斯托雷拉2016年）。基于这些讨论，重新审视欧盟“民主赤字”的奠基性文献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尽管欧盟政治体系独具特色，但其根基深深植根于成员国的政治架构，尤其是宪法制度。支持将权力下放给欧盟层面技术官僚机构的论据，折射出对民主国家如何应对非民选权力现象的普遍认知（塔克2018年）。因此，我们关于欧盟“民主赤字”问题的若干结论，同样适用于技术官僚与民主关系的广泛讨论。事实上，特别是在将政策制定权下放给专家机构方面，欧盟层面下放机构数量的增长，与国家层面出现的类似现象——即所谓‘国家代理化’（Pollitt 2015）——相比，显得相形见绌。

在题为《捍卫民主赤字》的文章中，安德鲁·Moravcsikhaswrittenthat: “Within the multi-level governance system prevailing 指出，欧盟官员之所以享有最大自主权，恰恰源于那些先进工业民主国家（包括欧盟多数成员国）通常避免直接政治博弈的领域（莫拉夫契克2002:613）。基于此，他得出了看似矛盾的结论：“正因如此，欧盟可能更‘民主’，恰恰因为它在狭义上更少‘代表性’”（2002:614）。在此，柏拉图著作中技术官僚与民主的张力被彻底消除。相反，我们发现只要专家权力被限制在特定政策领域，就能增强民主自治。将权力转移给专家不再基于混同家庭与城邦的逻辑，而是通过政策领域的区分来实现。部分问题通过“民主”方式解决，另一些则通过“技术官僚”方式处理，总体上提升了民主的质量。

政策领域的划分方式多种多样。所有理论都基于一个共同前提：划界本身属于技术性工作，需要专家评估。在本章后续内容中，我们将详细阐述三种构建框架的尝试，用以区分“民主型”与“技术型”政策领域。第三部分将对这些不同观点展开批判性讨论。

安德鲁·莫拉夫契克在其关于欧盟“民主赤字”的研究中，提出了三个规范性论据，主张将某些政策领域“隔离”以避免“直接争议”（2002: 613）。其一基于以下假设：普通公民对某些议题存在“理性无知”，即获取必要信息以有效参与政策讨论的成本，超过了参与所能获得的利益。基于此，Moravcsik推断公民将决策权委托给环境政策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领域的受过培训的“专家”是“理性的”（2002: 614）。

其次，莫拉夫契克指出，将政治权力下放给“独立机构”是保护少数群体免受“多数人暴政”的必要手段，尤其在“司法行政”和“个人权利保障”等领域（2002: 614）。第三，他认为对集体决策进行“隔离”可能有助于防范“特殊利益集团”对民主进程的操控风险。他以贸易政策为例说明，组织严密的保护主义势力可能在消费者和整体经济的分散性自由贸易支持者面前“占据上风”（2002: 615）。由于“独立机构”不受即时选举约束的制约，能够兼顾“整个集体”的更广泛利益，从而有效防范此类风险（2002: 615）。

在关于欧盟“民主赤字”的持续辩论中，吉安多梅尼科·马约内是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参与者。他在多篇独立撰写的评论文章中，

马约内提出,要理解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反多数主义”特征,需将欧盟置于更广泛的“规制国家”理论框架中(马约内,1994,1996,1998)。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区分“帕累托改进”政策与“再分配”政策。前者主张“让部分人受益而不损害他人”,而后者通过“在社会群体间分配资源(原文如此),必然导致部分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受损”(1994:65)。

欧盟作为典型代表的监管型国家,其核心特征在于只专注于“帕累托改进”政策领域。马约内指出,“再分配”政策必然引发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因此需要通过“政治”与“民主”(他将这两个术语互换使用)程序来合法制定并实施(1996:124)。相比之下,“帕累托改进”政策原则上可成为所有相关方达成“共识”的对象。因此,在马约内看来(1996:125),将相关事务委托给“独立监管机构”并不构成规范性问题。与莫拉夫奇克的论证思路相似,马约内指出欧盟被赋予的具体职权范围,因其具有帕累托改进特性,本应广泛对应于“独立监管机构”的职权范畴。欧盟所谓的“民主赤字”因此并非问题,因为“监管机构”无需遵循与再分配政策相同的民主标准(1998:18-19)。

在深入探讨技术官僚制相关论点的问题之前,需要指出的是,莫拉夫契克和马约内均未考虑到一个关键因素:他们所采用的决策标准可能存在重大政治分歧,这些标准本应决定哪些政策领域应通过民主程序或专家审议来处理。马约内主张,监管应当“通过纠正市场失灵来提升经济效率”

(1994:82)。但他也承认,政府完全可以选择采用公有制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监管目标已不再局限于市场矫正,更需要以市场标准取代“政治和行政标准”(1994:82)。因此,监管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建立由专业人才组成的监督、管控和规则制定体系,来纠正市场失灵。然而,选择走监管道路的决策本身,其实早已作为监管国家发展的前提条件潜藏在幕后。马约内指出,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西欧部分地区更倾向于选择公有制而非监管。因此,界定监管政策与再分配政策的边界,绝非简单套用客观标准就能解决。这本质上是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考量,最终决定选择其中一条路径而非另一条的产物。

关键的是,这提出了一个由谁来做出这样的决定的问题。当马约内将向监管的转变描述为“重新绘制”时

“以某种方式划定公共领域的边界，将某些更适合私人活动的领域排除在外”（1994:80），但他并未说明是谁在重新划定这些边界。他仅用被动语态写作，而显然正是他（即专家）在划定这些界限。在讨论“反主流机构的独特制度能力”时，他主张这些机构在决定参与哪些政策领域时应保持“自律”（2009:169）。因此，主流与反主流机构之间的边界管控，最终由独立专家的“自我约束”来实现。这类论点表明，尽管马约内主张技术官僚与民主之间应建立“基于能力的分工”，但两者的界限最终仍由专家掌控。

本文所考虑的民主与技术官僚制互补性的最后一个论点是马里奥·蒙蒂和西尔维·古拉德在他们2012年关于*欧洲民主*的专著中提出的。在撰写本文时正值欧洲危机最严峻时期（这场危机在2011年11月马里奥·蒙蒂被提名为意大利总理时具有核心政治意义），蒙蒂与古拉德着重强调了政治中时间维度的重要性。他们坚持认为，民主是所有政治合法性的基石，但同时也受制于“短期暴政”。由于民选政治家不可避免地定期选举的时间框架内运作，其时间视野永远无法延伸至遥远未来（2012:37-38）。而非民选专家则能进行更长远的博弈，做出兼顾未来可能性与不确定性的决策。蒙蒂与古拉德称这类专家为“长远规划的祭司”（2012:40）。基于此，他们反对所谓“专家妖魔化”现象。在他们看来，需要实现“技术官僚制与民主的正确结合”，才能使政治行动既能在“紧急情况下作出反应”，又能“预见长远趋势”（2012:41）。本文探讨技术官僚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其核心在于寻求二者间的恰当‘平衡’：二者不可完全牺牲于对方，因为唯有两者并存，才能确保政治体系实现蒙蒂与古拉德（2012:41）所提出的‘时间相关性’。

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当问题的短期或长期框架具有重要影响时，如何准确解决权限冲突？蒙蒂与古拉德在分析中反复提及的欧元区货币政策委托给“独立”央行的案例，正是这种困境的典型例证。该方案的合理性在于主张所有经济主体都“对价格稳定具有长期利益”，而民选政府可能出于“短期选举利益”而操纵利率（蒙蒂与古拉德，2012:39）。但需要指出的是，²并非所有经济主体都“对价格稳定具有长期经济利益”。在债务人与债权人并存的社会中，债务人显然能从名义金额实际价值的下降中获益，而债权人则恰恰相反。即便从长远来看，双方都对信贷的可持续性抱有共同利益。

该系统本身已被证明与一系列——无论是正向还是负向——的通货膨胀率相容，其分布后果截然不同（另见本卷第二章Sanchez-Cuenca）。³

与莫拉夫奇克和马约内类似，蒙蒂和古拉德也默认不同政策领域之间的界限可以完全以“客观”和“价值中立”的方式界定。事实上，正如我们所指出的，只要对他们的职权分配方案——即如何将决策权分配给技术官僚机构和民主机构——提出几个具体问题，就能发现这本质上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和规范考量的决策。其他学者虽然也探讨过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对知识型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中核心的“信息性决策”与“分配性决策”区分提出质疑（如兰德韦尔2009、2010年研究），但并未深入分析技术官僚制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具体关联。尽管上述作者声称仅是通过技术官僚主义的专家诉求来补充民主制度，但实质上他们将民主集体自治的行使降格为技术能力的先决条件。这种做法通过否定如何划定不同政策领域边界这一决策的正当政治属性来实现。在本文讨论的论述中，关于边界划定这一根本性政治决策的责任被完全推给专家。虽然技术官僚主义的辩护形式有所不同，但实质上关于民主与技术官僚主义互补性的论点，竟与本章第一节详述的柏拉图式论证惊人地相似。

对当代技术官僚制论点的批判

当代技术官僚制的论点表面上对民主表现出形式上的尊重（通过将自身定位为调和民主与技术官僚制的论据），这种姿态虽仅停留在象征层面，却暗含着对民主理想——集体自治——规范价值的认可。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种间接论证技术官僚制的方式，实际上比我们在本章前半部分阐述的经典论证更具挑战性。

当我们探究当代技术官僚主义倡导者试图调和的专业知识与民主的具体理念时，首先会发现这一现象。“麦迪逊式”（或称“新麦迪逊式”）民主概念，始终是莫拉夫奇克、马约内等学者研究的核心（赫里蒂埃，1999；基欧汉等，2009；尼科拉迪斯，2001；齐隆卡，2006）。马约内在论证欧盟所谓的“民主赤字”问题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么严重时写道：

“纯粹的多数制民主模式反对将权力委托给非多数制机构，而旨在共享、分散、限制和委托权力的多元制或麦迪逊模式，则为这类机构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宪法环境”（1998: 18）。“麦迪逊式”这一概念

此处所指的民主，是对“纯粹多数主义”民主观念的反面表述。其核心特征在于权力的“分权”与“委托”，将权力下放给多个相互竞争的政治机构，这些机构的功能在于彼此“制约”与“互补”（1998: 18）。

这种民主理念之所以更“支持”将权力下放给非多数制机构，主要源于技术官僚机构（如独立监管机构）可被视为“麦迪逊式”政府体系所创建并相互竞争的多种政治机构中的一个分支。即便严格来说，这些机构的职能仅是“限制”和“补充”民主集体自治的行使，但它们仍被纳入广义民主的范畴。事实上，部分学者已将专业能力理论化为民主政府的新“支柱”或“分支”，与司法、立法和行政分支并列（维贝尔特，2007）。然而，真正麦迪逊式的民主观念与Majone、Moravcsik、Monti和Goulard等作者所提出的论点之间仍存在一个关键差异，他们旨在以建立新的权力分立的名义调和民主与技术官僚制。⁴

对麦迪逊而言，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石始终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身份认同”的民主理想（比克顿2011，伍德1998,2003）。这一点从美国宪法开篇便可见一斑——麦迪逊参与起草的宪法开篇便以“我们，人民”明确界定制宪权。其《联邦党人文集》第39篇中“共和国即”直接或间接从全体人民获得全部权力的政府”（鲍尔1987: 255）的论述亦印证了这一理念。正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注释中所阐释的那样...⁴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实为人民的不同代理人与受托人，其权力构成与职能定位各不相同.....[然而]无论衍生权力存在于何处，最终的权威始终属于人民本身”（鲍尔 1987: 297）。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代技术官僚制理论主张将民主集体自治的行使从属于技术能力的先验性实践，其核心在于将政策领域的边界划定视为一种客观中立的价值中立行为。这些理论的提出者最终将 *自己*——作为自诩中立的“专家”——置于主权者的位置，而非代表全体“人民”。这种立场不仅挑战了麦迪逊所认为的“共和主义”核心原则，更使得当代技术官僚制理论与民主制度的兼容性变得难以想象，即便从广义的“麦迪逊式”视角来看亦是如此。

若参照卢梭关于‘主权者’与‘政府’的区分——麦迪逊在该段落中有所提及——当代技术官僚制主张对民主构成的挑战亦可清晰显现。《联邦党人文集》第46页（前文已引述）。卢梭认为，主权者是所有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础，其特权只能归属于全体人民（卢梭 1997: 51-53）。相比之下，政府被定义为连接人民与国家的“中间”机构。其

其宗旨在于“实施”主权者的决策（1997:82-86）。卢梭认为，政府由具备“实施”主权者决策能力的群体组成（即现代语境中的“专家”）是完全合理的。正因如此，他才著名地指出民主政府“不适合人类”，因为需要一个“神之子民”（1997:92）。

然而他的核心观点在于：主权者（即人民）必须始终保持凌驾于政府之上，因为制定最根本政治决策的责任本就属于政府。而后者——即政府——仅承担着“实施”这些决策的职责。若将此与当代主张“调和”技术官僚制与民主制的论点进行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后者实际上将专家置于主权者的位置，而将“人民”降格为被授权的（即政府的）权力。事实上，将权力分配给不同政府机构的权限常被用作主权的简略定义。但本文分析的论点表明，真正的主权实则掌握在专家手中，而非“人民”。当代主张“调和”民主与技术官僚制的论调，最终将主权的光环赋予了专家，而“人民”则沦为从属权力。专家们被赋予了决定哪些政策领域适合适用选举竞争规则的权力。

从民主主义视角来看，相较于“古典”技术官僚制论证，这种论证方式更具隐蔽性。柏拉图通过对话形式提出主张，使其主张获得某种公共争议的表象；而当代技术官僚制论点则通过将不同政策领域间的区分呈现为客观且价值中立，从而削弱了对这一根本性政治议题进行正当争议的空间。此外，柏拉图对技术官僚制的辩护蕴含着一种“乌托邦式”愿景，旨在克服政治冲突的问题与局限。这种理念激励了后世诸多尝试，人们试图通过技术官僚原则来弥补民主制度的缺陷（迈尔，1970）。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要完成民主事业，而是要彻底消除柏拉图及后世思想家所认为的民主政府主要弊端与潜在危机。

技术官僚制的论点若能以独立的政治项目形式呈现，在民主政治秩序框架内仍具说服力。但当代论点却陷入两难困境：它们试图用专家决策取代人民主权原则，却未能对民主制度提出真正具有挑战性的质疑，这些质疑本应通过集体审议和公开辩论来实现。这并非主张通过强调民主至上就能化解技术官僚制与民主之间的矛盾。此类断言对于依赖专家知识的复杂政策问题所提出的具体问题鲜有解答。关键在于论证

主权与政府的区分及其所蕴含的人民主权至高无上原则，可作为衡量专家与政治代表权衡的规范性标准。这一原则更直接地触及谁拥有最终权威的问题，同时并不否认基于专家知识的权威主张与基于公众授权的权威主张之间固有的张力。

结论

正如本章所揭示的，技术官僚制与民主制度之间始终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柏拉图在古典时期为技术官僚制辩护时，其核心诉求就是用专家治国取代民主自治。但若将当今的技术官僚视为柏拉图笔下哲学王的现代化身，这种认知显然有失偏颇——尽管当前关于技术官僚统治危害的讨论，确实暗示着这种观点的合理性。事实上，当今的技术官僚及其所处的非多数制机构，通常都置身于一个表面上依附于集体自治和人民主权原则的政治格局之中。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用技术官僚制取代民主，而在于两者之间关系的本质，尤其是专业知识在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本章论证指出，若从这个角度审视，当代支持技术官僚制的论点实际上对民主制度构成的挑战远比表面看起来更为严峻。尽管选举政治竞争仍有一席之地，但普遍观点认为技术官僚制最适合某些特定类型的政策。这些论点暗含的前提是：决策体制与政策议题的匹配本身属于学术范畴。通过这种方式，它们主动承担起界定哪些政策领域需要接受公众审议和政治竞争的责任。

在本章的最后阶段，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建立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身份认同”的政治体制中，专家当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卢梭关于“主权者”与“政府”的区分在此处再次具有参考意义。只要具有政治决策权的主权者始终不可分割地归属于全体“人民”，专家既能作为“咨询机构”在政治决策之前提供相关信息，也能作为“执行机构”在人民做出决策后负责将这些决策付诸实施。

从这个角度看，当代技术官僚对民主的挑战核心在于：它颠覆了民主制度中主权者与政府之间通常遵循的权威等级关系。这种制度本应建立在人民统治的基础上，但技术官僚却将专家置于主权者的上位，而将“人民”置于政府的下位。在技术官僚制理论的最新版本中，这一挑战因主权利力的转移而变得更加复杂。

从‘民众’到专家的转变，实则是在某种虚假借口的掩护下进行的两者之间的互补性，实际上削弱了围绕民主与技术官僚制相对优劣问题展开有意义政治博弈的空间。

记下

- 1 对两次“革命”的标注源自Rokkan（1970年）。而“双革命”这一表述则来自Bendix（1964年）、Mann（1993年）和McNeill（1963年）。
- 2 关于人民的“发明”，可参阅Kalyvas（2005）与Morgan（1988）的研究；关于“想象的”民族，可参考Anderson（1991）的论述。民族主义相关研究，可查阅Gellner（1983）的著作。政治民族化过程的探讨，可参阅Caramani（2004）的专著。
- 3 从柏拉图的哲学王到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大西洋*和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再到当今的“监护制度”，这种乌托邦思想始终反复出现。
- 4 这些变革并非偶然地伴随着社会科学及社会教育政策的诞生。马克斯·韦伯（1922年）专门对官僚国家进行了分析（参见Poggi 1978年研究）。
- 5 在当代学术语境中，这种张力表现为响应型政府与责任型政府的对立（Mair 2009），或民主参与与有效产出合法性的冲突（Scharpf 1999）。
- 6 Caramani（2000）对民主化进程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引用了相关历史文献。关于不同形式的政治代表制，可参阅Manin（1997）、Pitkin（1967）及Urbinati（2006）的论述。
- 7 正是马宁（1997）将选举的“胜利”与抽签制度相对比，并提出“民主贵族”这一概念——该概念本身即为民主与效率二元对立的矛盾体。桑切斯-昆卡在第二章中探讨了这种双重民主理念。
- 8 政党在协调公众诉求与责任要求之间的双重角色，最早由伯奇（1964）和达尔（1956）提出。正因如此，沙茨施奈德将现代民主描述为“唯有政党制度才可实现”（1942:1），萨托里则将公民定位为“通过政党代表”（1968:471）。这种政治架构后来被学界称为“责任政党模式”（APSA 1950）。
- 9 精英主义批判在米歇尔斯、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莫斯卡和熊彼特等理论家的著作中最为明显。民粹主义批判则可追溯至卢梭和施密特。达尔（1956）、奥唐奈（1994）与里克（1982）的著作中可见其与多元主义的对立观点。近年来，拉克劳（2005，另见拉克劳与穆夫1985）和罗桑瓦隆（2011）的研究亦呈现类似立场。
- 10 民粹主义领域的主要贡献者包括 Albertazzi 和 McDonnell（2008）、Canovan（1999）、Kriesi（2014）、Meny 和 Surel（2002）、Mudde（2007）、Mudde 和 Kaltwasser（2012）。关于民粹主义民主观的理论研究，可参阅Urbinati（1998,2014b）。
- 11 关于技术官僚制的文献包括Centeno（1993,1994）、Dahl（1985）、Dargent（2015）、Fischer（1990,2009）、Meynaud（1969）、Radaelli（1999b）和 de la Torre（2013），这些文献均被引用于本引言部分。
- 12 这些共性与差异在Caramani（2017）中进行了详细讨论。
- 13 这是伊士顿的表述（1953年）。另见拉斯韦尔的“谁得到什么”逻辑（1936年）。
- 14 在新自由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对民主作为自治的批判中，市场作为集体决策工具，并未被视为技术官僚主义的实例（参见桑切斯-昆卡第二章论述）。
- 15 此外，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桑切斯-昆卡在第二章讨论的弗吉尼亚学派与罗切斯特学派），由于通过民主方式汇总偏好会产生任意结果（阿罗1951，里克1982）。

- 16 皮特金（1967）将积极代表定义为“为他人利益而行动”，与涉及“存在”而非“行动”的象征性或描述性代表形成对比。政治行动的长期目标可能涉及未来世代，这被称为“责任”（戈茨2014，马加洛尼2006，汤普森2010）。皮特金将整体性要素称为“无依附利益”（区别于各社会群体特有的主观利益），而雷菲尔德（2009）则称之为“惠及所有人”。关于技术代表性的特征概述，可参阅卡拉马尼（2017:60-61）。
- 17 从术语上讲，“技术统治”指的是权力（以及延伸到一种政治合法性和代表形式）——通过技术知识（金融、环境等）获得的权力——正如术语中的*cracy*所暗示的（尽管托尔托拉在第三章将其扩展到决定手段而非目标的权力）。
- 18 这种聚合通过选举竞争、利益代表以及其他形式的政治系统“输入”，最终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多元民主。对多元主义的怀疑态度与民粹主义具有共同特征，后者反对精英主义，坚信人民意志而非科学理性。
- 19 关于美国技术官僚运动的发展历程，可参考阿金（1977）与埃尔森（1967）的研究。苏联、神权政体或军事政权或许能作为典型案例（参见霍夫曼与莱尔德1985年关于技术官僚社会主义的论述）。森特诺（1994）将这一术语应用于1990年代萨利纳斯“革命”（萨利纳斯特罗伊卡）期间建立的墨西哥国家体制。
- 20 技术官僚主义被定义为话语（参见下文及第五章），它可成为行动者（无论是否被视为技术官僚）的工具，正如非民粹主义行动者也能发表民粹主义言论一样。
- 21 马克斯·韦伯对现代国家官僚体制的论述堪称经典。重商主义、人口迁移（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增强了国家作为‘国家科学’通过统计手段监控社会的‘控制能力’（Flora 1977: 114）。关于国家统计学的起源，可参阅卡拉马尼（Caramani）2000年著作第1005-115页的论述。
- 22 “战争”（即正如蒂利所言，国际竞争与国家间的战争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从沃勒斯坦（1974: 348–49）到森特诺（1994: 21–26）的全球体系理论，均强调竞争在西方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森特诺尤其将其应用于墨西哥案例。这一理论还指出，国家需要在超国家体系中“适应”并参与竞争，因此必须依赖经济与法律领域的专业能力。
- 23 工业革命研究者们明确指出，其起源在于欧洲的领土分裂，而非中国等帝国政体。参见Landes（1969年）的研究。
- 24 关于政党因与国家关系密切而脱离社会的后果，以及政党间日益增长的意识形态相似性削弱选举中‘选择’的广泛综述，可参阅Mair（2009）及Bardi等学者（2014a, 2014b）的研究。
- 25 非多数制机构被归类为第二类治理（Hooghe和Marks, 2003年）。关于拉丁美洲总统如何通过技术官僚应对这类复杂性，可参阅Schneider（1998年）的研究。
- 26 不出所料，这一时期欧洲各地技术官僚内阁数量激增，尤其是金融危机期间，由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洲中央银行组成的国际金融官僚团队（即‘三驾马车’）开始介入干预，希腊金融危机便是典型例证。关于技术官僚内阁的任命，可参阅第六章Marco Valbruzzi的论述，以及Wrátil和Pastorella（2018年）的研究，本导论后续部分亦有相关论述。

- 27 采用皮特金（1967）的术语，这种认同是“非依附性的”，即并非源自个体偏好的聚合。事实上，对精英阶层的经典分析已指出公共领域整体的去政治化趋势（米尔斯，1956）。
- 28 在社会学领域，圣西门、孔德与卡尔·曼海姆（相关研究可参阅Fischer 1990及2009年著作）等思想家的观点亦可见诸文献，甚至古希腊的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亦有类似论述。关于非多数制制度的探讨，可参考Thatcher与Stone Sweet（2002年）的研究。
- 29 关于福利国家和市场的去政治化倾向，可参考Bickerton和InvernizziAccetti（2017）、Bourdieu（2002）、Laclau（2005）、Laclau 和 Mouffe（1985）、Pettit（2004）以及Rosanvallon（2011）的研究，这些理论将市场和福利国家视为消除冲突的‘统一逻辑’。
- 30 这种政党愿景并不包含其为社会共同利益制定愿景与项目（尽管是替代性方案）的能力。相反，它是一种将各组成部分视为机器或身体般协同运作的整体主义愿景。
- 31 技术官僚体系中的多元性被简化为正确（专家）与错误（无能者）的对立，正如民粹主义中所体现的那样，这种对立被进一步简化为道德高尚者与腐败精英之间的对抗（参见Caramani 2017: 64）。
- 32 对于以“表达诉求”而非执政为主要职能的政党（如小众或单一议题政党），情况则有所不同。
- 33 责任方模式的这一特征在政党制度中表现得更为显著，这类制度通常具有更严格的党纪和更强的凝聚力（Birch 1964, Katz 2014），且具有国家化特征（Caramani 2004,2015: 284–86, Pierce 1999, Pitkin 1967: 175）。
- 34 在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1977年关于公务员心态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公务员心态具有客观性、政治中立性、科学性等特征。
- 35 根据宪法或条约所载意识形态内容的深度（或其意识形态驱动程度），司法机构同样会丧失中立性。欧洲法院（ECJ）便是典型例证，其判决依据欧盟条约作出。就这些政策而言，ECJ并非意识形态中立的机构（Schmidt2018）。关于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可参阅Arce（2006）、Biglaiser（2002）、Boylan（1998）、Conaghan and Malloy（1994）、Silva（1991）以及Teichman（1997,2002,2004）的研究。
- 36 关于“责任性与响应性”之争的批判性论述，可参阅Goetz（2014）的著作。
- 37 关于响应型技术官僚制，参见Rauh（2016）。关于风险，参见Rothstein（2006）和Rothstein等人（2006）。关于声誉风险，特别是对公众、媒体和政界人士的问责问题，参见Gilad（2015）和Maor与Sulitzeanu-kenan（2016）。
- 38 “不负责任”虽非理想表述，但相较“不负责任”（尽管“责任”有时被用作“问责”的同义词）而言，其误导性更小（Sartori 1976: 19）。尤其在议会制国家，后者特指前文所述的另一种治理维度——即“良政”与长期执政。
- 39 关于预期表征，参见Mansbridge（2003年）。
- 40 自伯克探讨爱尔兰天主教代表与美国殖民者在议会中的存在作用以来，政治代表领域的研究便持续关注‘存在’对‘行动’的影响（尤其是信息供给功能）。相关论述可参阅曼斯布里奇（1999）、威廉姆斯（1998）及杨（2000）的著作。
- 41 关于存在政治与思想政治的讨论，可参阅菲利普斯（1998）的研究，但该学者特别指出弱势群体的存在及其被弱化的“社会意义”。
- 42 本文未探讨表征的另一维度——符号表征。关于该主题的简要讨论，可参阅Caramani（2017: 62–63）及后文脚注60。
- 43 关于技术官僚作为代理人或行为者的论述，可参阅Dargent（2015: 14–19）。
- 44 这是对国家与官僚自治的更普遍观点（Skocpol 1985: 9）。当然，对于那些声称其立场由理性分析所塑造的专家而言，谈论“偏好”是存在问题的。

- 45 工具主义对技术官僚角色的阐释将专家视为“工具”。但严格来说，根据上述定义，作为行动主体的技术官僚机构及其人员已不再具备“技术官僚”属性——他们不制定价值标准，仅作为执行者行事。这类人员仍停留在技术人员和专家的层面，缺乏决策权。技术官僚的本质在于：他们独立于群体制定并追求目标，其判断依据是基于专业知识的个人判断。
- 46 这些层面具有内在关联。要确定技术官僚的资格标准，是评估特定内阁中技术官僚成分占比（第六章）及其对政策制定和谈判行为影响（第七、八、十章）的关键。反过来，将某个机构或行为体界定为技术官僚，有助于解读其话语体系（第九章），并评估选民对其的支持度（第十一、十三章）。
- 47 关于国家的理性功能，可参阅Birnbaum（1988）和Badie与Birnbaum（1983）的研究，这些文献并非偶然地将强大的中央集权法国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这里也存在一个悖论：技术官僚们虽常力挺新自由主义，却需要国家来推行改革（关于“正统悖论”，参见Kahler 1990, 1992）。
- 48 爱德华多·达根特在《第十二章》中对拉丁美洲技术官僚活跃的政权进行了评述。其核心论点指出，*技术官僚*（拉丁美洲学术界称其为“专家”）之所以成为*政治官僚*的关键，不仅因其精通复杂事务，更在于这些专家会运用专业知识主动构建自身自治体系。这种双重属性使得清除他们的成本持续攀升。
- 49 关于20世纪90年代自治技术官僚（最终导致体制不兼容）对民主质量的更具体负面影响，可参阅Centeno（1993）、Centeno和Silva（1998）、Conaghan和Malloy（1994）以及Teichman（1997）的研究。Dargent（2015）的分析证实了非民选行为者对民选政治家的长期支配作用，以及拉丁美洲民主制度的严重缺陷。
- 50 司法机构是否可被视为技术官僚机构尚存争议。其争议焦点在于法院对政策制定过程及价值分配的影响力。在高度‘司法化’的司法实践中，宪法审查与权利裁决往往演变为政策制定的延伸和立法修订的补充（参见Sadurski 2013、Shapiro 1964及Shapiro与Stone 1994的研究）。这种技术官僚主义特征的典型例证，便是民粹主义者将法院污名化为‘人民公敌’的攻击言论。
- 51 关于这些案例，可参阅Brunclik（2015）、Marangoni和Verzichelli（2015）、Pastorella（2014, 2016）以及Pasquino和Valbruzzi（2012）。
- 52 不同语言对这类个体行为者的称谓各不相同。有影响力的拉丁美洲文学中提到*技术官僚*（或*技术官僚*，与*政治官僚*相对）；同样，意大利语会使用*技术官僚*（或*技术官僚*）。
- 53 这与Alexiadou在第七章提出的“技术政治”概念存在差异。另见Alexiadou和Gunaydin（2019）以及Joignant（2011）的研究。
- 54 科利尔对技术官僚的定义包含两个核心要素：「具备高水平专业学术训练的个人，其专业素养是选拔他们担任大型复杂组织（包括公共和私营机构）关键决策或顾问职位的主要标准」（科利尔，1979：403）。
- 55 这一功能既见于前文所述的责任方模型，亦见于后续文献中关于“党派技能”（Rose 1969）与“官员招募”（Sartori 2005, Katz 1987, Mair 2008）的论述。
- 56 本书重点探讨了一个超国家组织——欧盟。具体而言，可参阅科斯塔·洛博与麦克马纳斯合著的第11章，该章深入剖析了欧盟政策的合法性；以及范德维尔在第4章中对欧盟治理效能的论述，这些内容均聚焦于这一层级的治理机制。
- 57 本节聚焦于论述，但也涵盖可定义为技术官僚主义的行为（例如，以负责任政策为名对选民偏好作出不响应的决定）。

- 58 本文未探讨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 59 关于两种定量内容分析方法的比较，可参阅 Rooduijn 和 Pauwels（2011年）的研究。
- 60 巴西国旗上镌刻的‘秩序与进步’字样，彰显了1889年确立的共和主义蓝图。这一蓝图蕴含着实证主义理念，主张由开明精英阶层依据科学方法治理国家，以推动工业化进程并实现社会福利。这种等级森严、社团主义的社会观也影响了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墨西哥，弗朗西斯科·G·科斯梅斯等思想家便是典型代表。
- 61 这种论述延伸至个别代表，对其代表“角色”的解读存在差异，更多将其视为受托人而非选民的代表。可以预见，民粹主义代表会将自身角色定位为传达民意，而技术官僚派代表则对民意的响应度较低。
- 62 关于民粹主义态度，可参考 Akkerman 等（2014,2017）、Castanho Silva 等（2019）、Oliver 与 Rahn（2016）、Schulz 等（2017）以及 VanHauwaert 与 VanKessel（2018）的研究。
- 63 调查问题包括：(1)「政客们若能停止空谈、专注于解决实际问题，国家会更好」；(2)「政治妥协实质上是出卖原则」；(3)「若将政治决策权交给成功的企业家，国家治理将更有效」；(4)「若将政治决策权交给专家而非政客和公民，国家治理将更有效」（希宾与泰斯-莫尔斯，2002）。类似观点的最新案例可参阅 Ruiz-Rufino 与 Alonso（2017）的研究。
- 64 当学者们宣称民主是无知与非理性的统治时，这种挑战的力度以及对代议制民主现状的悲观看法便愈发凸显——尽管这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关切不谋而合（布伦南，2016）。这类观点批判公民的理性能力，指出政治参与和民主协商往往会使人更加非理性且带有偏见。知识统治被援引为“知识者的统治”，以取代公民民主。
- 65 这就是激进民主主义的立场。Laclau 和 Mouffe（1985）尤其主张，对抗与竞争可作为对卡特化、意识形态趋同、宪政主义、共识、市场及福利管理的矫正手段。相关综述可参阅 Rovira Kaltwasser（2012）的论述。
- 66 欧盟的案例具有特殊意义，与其他联盟民主国家的情况相似，因其指令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这使其区别于联合国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其他超国家组织。与所有多元文化政体一样，由于国家间存在结构性分歧，多数主义原则在此无法适用。
- 67 关于这些观点，可参阅迪克森（1981）、哈贝马斯（1970）和奥菲（1973）的研究。
- 1 关于2000年代欧洲一体化进程——特别是频繁将权力下放给专家机构的举措——是否构成‘宪法性时刻’，学界存在争议。这正是由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主持的宪法会议所追求的目标。然而2005年法荷两国否决所谓‘宪法条约’的举动，似乎表明这并非真正的宪法性时刻。最终促成的是2008年《里斯本条约》的签署，各国政府以与先前欧盟条约相同的程序完成批准。同样适用于创建由独立欧洲央行管理的共同货币的决定——这一重要决策虽未融入更广泛的政治变革浪潮，但各国政府仅在现有欧盟程序框架下作出了这一决定。
 - 2 蒙蒂和古拉德提出这一论点时，援引了经济学家所谓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该理论由 Kydland 和 Prescott 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一篇开创性论文中首次引入政治经济学领域，该论文阐释了为何‘政策规则’比‘政治自由裁量权’更受青睐。

政策制定。当时的争论焦点正是政府难以遏制通胀压力的问题。不过，当时对通胀的理解并非“技术官僚主义”，而是将其视为分配结果引发的社会矛盾所导致的结果。例如可参考约翰·戈尔德索普（John Goldthorpe）1987年的研究。另可参阅本书第二章桑切斯-昆卡（Sanchez-Cuenca）关于“新自由主义技术官僚制”的论述，该章节探讨了其中部分主题。

- 3 价格稳定带来的另一个反常效应是，反而让大型企业得以暂缓资本投资。高通胀率会促使企业将现金储备降至最低，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之一，就是投资那些能提升企业所在行业长期增长率的项目。如今，全球一些最大型的公司正囤积着巨额现金，因为在通胀高企时期，企业缺乏动用这些资金的经济动力。
- 4 关于这一‘新麦迪逊主义’论点的深入批判，可参阅Bickerton（2011）的论述，其研究范围不仅限于欧盟研究，还延伸至国际组织领域的学术探讨。例如Keohane等人（2009）的研究成果。
- 5 英国前首相迈克尔·戈夫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期间曾表示‘民众受够了专家’，此言便是典型例证。类似言论还包括对欧元区危机期间希腊和意大利引入技术官僚统治的回应。
- 1 在新自由主义历史研究中，琼斯（2012:129）将里克与罗切斯特学派视为公共选择理论的延伸。
- 2 其条件是：(1)社会选择规则必须产生某种集体决策；(2)社会选择规则必须适用于任何类型的个人偏好（无限制域）；(3)如果个人偏好是一致的，那么首选的替代方案就是集体选择（帕累托原则）；(4)两个替代方案之间的选择不受其他替代方案的影响（无关替代方案的独立性）。
- 3 详见Hinich和Munger（1997年）的综述。关于这些理论结果的实证相关性讨论，参见Mackie（2003年）。
- 4 若允许对效用进行人际比较，阿罗定理对福利经济学并无影响，尽管其对投票程序仍具有有效性（Sen 2002: 77）。
- 5 任何形式的功利主义推理都与奥地利新自由主义格格不入。
- 6 如前所述，弗里德曼提出了一项经济权利法案，旨在补充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权利法案。
- 1 需注意的是，本书其他作者（如引言部分的Caramani）可能使用“技术性”而非“技术官僚式”这一术语，以指代本文所述的基于专业知识的决策方法。
- 2 范德维尔在本书第四章提出了一种超越责任与响应性传统二元论的尝试，这一二元论是当前规范性讨论的基石。
- 3 技术官僚机构当然可能受到非严格政治性质的社会行为体影响甚至被其操控——例如，参见Braun（2018）和Jacobs与King（2016）分别关于金融部门对欧洲央行和美联储影响力的论述。若将这些社会行为体视为党派利益的载体，此类案例与前文所述的政治化类型具有相似性。
- 4 本书整体立场如下，详见卷首导言。
- 5 与本卷导言中卡拉马尼的做法不同，我避免使用‘政权’一词来指代这些技术官僚专制案例，以免与下文提出的‘技术官僚政权’不同含义产生混淆。

本章的这一节中，名词“regime”被用来指代在正式民主框架内非正式的权力与影响力模式。

- 6 在这方面，意大利人——他们在这一领域获得了近几十年的经验——没有将这种类型的行政称为技术官僚政府，而是称之为“技术官僚政府”（*governo tecnico*或*governo dei tecnici*），这可能并非巧合。
- 7 这种话语去政治化与卡拉马尼在本书导言中讨论的、作为对政治冲突的否定的去政治化概念并无太大差异。
- 8 最值得注意的是，European Union 法院在 *Peter Gauweiler 等人诉 Deutscher Bundestag* 案（案号C-62/14,2015年6月16日判决）和 *Weiss 等人案*（案号C-493/17,2018年12月11日判决）中的裁决。法院通过确认欧洲央行的直接货币交易（OMT）和量化宽松（QE）政策与法定授权的一致性，实质上否定了原告方对欧洲央行的解读——即认为其在货币联盟中实为技术官僚式的权力篡夺者。
- 1 虽然这一定义并不完全排除技术官僚制作为决策方式的可能性，但“自由裁量权”这一前提条件，使得本章更侧重于探讨技术官僚制作为政权或政府形态的特征（参见本卷第三章）。这是因为只要行政机构在塑造政治结果时拥有自由裁量权，且不同结果会产生不同的“赢家”与“输家”（参见本卷第一章），那么行政机构就对手段与目标都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掌控力。
- 2 有关技术官僚制与时间性的详细讨论，请参阅第1章。
- 3 这种临时性简单多数的政治建构，无论其真实存在还是由民粹主义者通过修辞构建，同样可能在最比例的政治体系中实现。
- 4 技术官僚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排除政治冲突，而是假设一旦找到最优技术解决方案，政治冲突便会得到解决。
- 5 这不包括那些直接或间接对政府或立法机构负责的中央银行，例如威斯敏斯特体系下的英格兰银行。
- 6 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经济论证，可参阅第二章。
- 7 在技术官僚型高管的语境下，本章将“监管”作为动词使用：虽然部分技术官僚型高管可能制定监管规则，但多数（甚至全部）高管都在对社会的某些领域实施监管（即控制）。
- 8 与第三章的用法不同，此处政治化指的是观察者群体中行政行为显著性及政治争议性的实证现象。
- 9 实际上，受众与（尤其是制度性）风险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泾渭分明，因为受众本身既能引发风险，也可能成为声誉威胁的源头。下文欧洲委员会的案例，生动展现了受众与（制度性）风险之间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
- 1 这些政府分别是：捷克共和国的菲舍尔政府（2009-2010年）、匈牙利的巴伊奈政府（2009-2010年）、意大利的蒙蒂政府（2011-2013年）、希腊的帕帕季莫斯政府（2011-2012年）以及罗马尼亚的乔洛斯政府（2015-2017年）。关于这些政府的任期和组成，详见第六章马尔科·瓦尔布鲁齐的论述。
- 2 参见Dargent（2015）与Fischer（2009）的研究。Bickerton和Invernizzi Accetti（2017）在拉克劳、穆夫及罗桑瓦隆等思想家的理论影响下，从批判分析视角探讨技术官僚制。Caramani（2017）则深入剖析了技术官僚制与政党代表制的关联性，系统阐释了二者与民粹主义的共性与差异。
- 3 尽管本文提出的诸多论点可延伸至其他情境，但我们仍将技术官僚制的实证研究限定于代表性民主国家。

各类威权体制（关于拉丁美洲的政权，可参阅Centeno 1993、1994，Centeno与Silva 1998，Dargent 2015及de la Torre 2013）。

- 4 这一讨论主要围绕‘响应性’与‘责任性’表征的对比展开，该对比最早由伯奇（1964）和梅尔（2009）提出，并在巴迪等人（2014a，2014b）的研究中得到深入探讨，同时在民粹主义相关文献中亦有广泛论述（关于定义与综述，可参阅克里西2014年的研究）。
- 5 这与代表制政党民主的另一显著差异在于，后者认为最佳结果源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竞争与妥协。
- 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科学方法可能被滥用，某些政策或理念的支持者可能会利用“伪科学”手段来推广其观点。
- 7 技术官僚政府的角色在2010年代初引发学术界关注，欧洲民主国家涌现出多位杰出代表，由此催生了首个系统性技术官僚政府分类体系（Brunclik 2015，2016；McDonnell与Valbruzzi 2014；Pastorella 2016）。
- 8 根据对“技术官僚”（包括社会学特征与态度）的定义，可依据政党与内阁的组成、政治人物的提拔、对外部专家的依赖等因素进行分类。
- 9 在官员分类的公共讨论中，另一个被纳入考量的因素是其就读教育机构的资质。虽然精英学校是技术官僚制的精英化特征，但在此情境下未必构成评判标准。
- 10 这引发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当具备治理技术专长的官员加入选举竞争并在政党中履职时，他们是否就不再是技术官僚？2013年技术官僚内阁解散后，马里奥·蒙蒂组建政党并以该党领袖身份参选意大利大选。尽管得票率仅为8.3%，该党仍成功获得37个众议院席位和19个参议院席位，并作为支持短暂执政内阁的大联合政府成员参与其中。同样地，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奥朗德总统任内担任无党派财政部长，后来创立了自己的政党，并于2017年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他任命了大量虽无政治经验但具备专业领域专长的人士。马克龙致力于推进必要改革，并欢迎具有政策制定专长的人才加入，因此被媒体称为技术官僚。
- 11 编码分析确定了文本的说话者或作者，并识别出日期、文本类型、篇幅、受众、语言、来源及语境信息等变量。评分范围为-2至+2（对应高技术官僚话语强度、低技术官僚话语强度、无技术官僚话语、低技术官僚话语、高技术官僚话语）。编码单元为演讲中无法分割段落的段落或主题性部分。各段落间取平均值，而五个维度间则取总和。
- 12 该项目由媒体与传播系主导，对12个欧洲国家的媒体与政治话语展开分析，涵盖高质量报刊、小报、免费报纸、电视辩论、推特、脸书帖子及政党宣言等内容。通过抽样选取约55,000篇文本，由87名专业编码员使用Angrist工具进行编码，并通过试点验证评估者间信度。详见Wirth等人（2016）的研究报告。
- 13 这种操作化方式的潜在弊端包括：政治家们在代表角色方面愿意接受的透明度程度，以及他们违背选民、政党乃至全体民众意愿的倾向。以政党代表项目（Deschouwer和Depaw，2014）为例，其中关于“是否应将更多决策权下放给专家和独立机构”的第11.4项问卷，就体现了这种倾向。

- 14 此类分析可实现跨国比较，并识别出对技术官僚治理态度或偏好的纵向趋势随时间的变化。
- 15 《世界与欧洲价值观调查》中有个耐人寻味的提问：‘您认为让专家而非政府根据其判断为国家做决定，是治理国家的糟糕/尚可/尚可/优秀方式吗？’该问题后来被用于其他研究，以解释并追踪技术官僚倾向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欧洲晴雨表和拉丁晴雨表中均未包含与技术官僚态度相关的条目。
- 16 该调查于2017年6月在9个欧洲国家开展，共包含约45个问题。除社会经济指标及技术官僚偏好与态度测量项目外，问卷还包含民粹主义态度条目，旨在与现有研究（Akkerman等，2014,2017）进行比较。
- 17 近期研究兴起了一种新方法——将联合实验嵌入问卷调查，让受访者对政策倡议、决策流程以及独立专家参与政治的选项进行选择。这种方法不仅能评估民众对专家主导治理的接受度，还能比较不同决策模式的偏好，并在不同政策领域间进行横向对比（Strebel等，2019；Bertsou与Caramani，2017）。
- 18 可以理解的是，但这也存在局限性，大多数研究聚焦于高管层及其构成要素：例如技术官僚在内阁职位中的数量（及其重要性），尤其是首相是否属于技术官僚。
- 19 关于类似案例的尝试，可参阅Brunclik（2015,2016）、Marangoni 和 Verzichelli（2015）、Pastorella（2014,2016）以及Costa Pinto 等（2017）的研究。
- 20 这表明责任方模式是民主得以强化的民主载体。就政党而言，民主是不可想象的安全的（参见 APSA 1950、Sartori1982、Schattschneider1942）。
- 21 另见本卷导言。桑切斯-昆卡（第二章）对两种去政治化方式作出了有效区分：直接方式是将政治决策权下放给独立机构；间接方式则是通过制定严格规则，迫使民选官员遵循既定行动路线（另见桑切斯-昆卡2017年研究）。关于该议题的更多论述，可参阅皮埃尔·多梅尼科·托尔托拉在第三章的论述，以及莱诺特·范德维尔在第四章的分析。
- 22 此处的核心问题在于独立机构与政治体制之间形式与实质层面的关联，这与制度分析层面所呈现的特征截然不同——即政治关联性任命人员对官僚体系及非选举机构的普遍渗透，这种现象被称为这些机构的‘党派性’。
 - 1 关于技术官僚制概念中这些层级的分析及其各自的操作化，参见本卷第五章 Bertsou与Caramani的论述。
 - 2 如本章所述，技术官僚制这一概念可被解释为一种“辐射型”而非经典范畴（Collier和Mahon，1993年）。然而，这一规范性要求并不意味着应当放松或摒弃概念分析的逻辑；正如Collier与Mahon（1993: 848）所言：“这可通过应用某种形式的多维标度法来实现，该方法可确定用于比较案例的潜在维度”。
 - 3 本节复现了McDonnell 和 Valbruzzi（2014）提出的概念分析框架。
 - 4 值得注意的是，卡茨的标准经过轻微调整以适应民主国家的技术官僚政府：尽管委托-代理关系是此类政府的争议焦点，但将技术官僚部长和总理完全不受政党控制作为条件并不合理。因此，卡茨第一个条件的第二部分已被省略。同样，在

第三种情况，若认为技术官僚制的部长和总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政党问责（至少在欧洲民主国家中），这种观点是不合逻辑的（卡茨标准中的第3b点）。

- 5 虽然有人可能质疑这种分类方式排除了由技术官僚组成但由政党代表领导的政府，但基于三个主要原因决定不予考虑：(1)总理在议会制政府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波根特克和韦伯，2005）；(2)技术官僚政府的定义标准在于其与政党政府的差异——即政党代表占据关键职位（首要的是总理职位）。因此，将由政党代表领导的政府纳入技术官僚政府范畴似乎存在矛盾；(3)迄今为止在欧洲，尚未出现过政党代表在由多数技术官僚部长组成的内阁中担任总理的政府案例。
- 6 例如，在意大利任命马里奥·蒙蒂后，内森·加德尔（2012: 30）提到“蒙蒂总理推行的去政治化民主”。
- 7 在科塔（2018:272）的最新研究中，非党派部长被定义为“所有在首次获任部长前未曾担任过政党全国或地方领导职务，且未担任过国会议员（除非在部长提名前当选）的人员。他们从政党政治圈外进入内阁，通常基于不同资质（典型但非仅限于在某一领域具备专业专长）”。尽管存在诸多例外和局限，这一定义作为非党派部长的总体分类仍具有分析价值。但技术官僚型部长因其专业专长，实为非党派政治家中的特殊类型。遗憾的是，科塔提出的通用定义中仍残留着这一特定属性。
- 8 另一个边缘案例是意大利五星运动与联盟党（瓦尔布鲁齐，2018）在朱塞佩·孔特总理任内组建的内阁。孔特身为律师兼私法教授，其内阁组建虽符合技术官僚的三大标准，但存在争议——2018年大选前，五星运动曾承诺若胜选将任命他为内阁成员。
- 9 关于费舍尔内阁的特殊性，参见Brunclik（2016）和Hanley（2018）。
- 10 政府技术官僚主义程度可通过某一内阁中无党派部长占全体部长的比例来衡量。
- 1 八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案例之一当属雅克·德洛尔。这位法国政治家因推动八十年代初法国社会党实施硬通货政策而闻名，该政策被称为法国著名的“U型转向”（Bearce 2007: 101）。
- 2 Adolph（2013: 15）采用类似的职业路径方法来理解中央银行家的偏好。例如，他指出：“相较于同一监管机构的环境科学家，转行从事监管工作的从业者往往对政府干预的限度有着更坚定的认知，对监管成本也更为敏感。”
- 3 由于尚不明确社会福利领域中何为专家资格，所有拥有任何学科博士学位的社会福利部长均被归类为专家。
- 4 法国实行半总统制民主政体，而芬兰此前也被视为半总统制政体，直到近期改革削弱了总统的权力。
- 1 欧洲货币联盟（EMU）的改革远未完成，2018年欧盟委员会否决意大利预算案即为明证（Euractiv 2018, Neue Zürcher Zeitung 2018）。
- 2 选民们既关心又抗议，最终因欧元危机导致政府垮台（Bosco与Verney 2012; Giugni与Grasso 2016; Hernandez与Kriesi 2016; Laffan 2014）。

- 3 学术界已开始关注民主解体现象，尤其涉及维克托·欧尔班领导的匈牙利以及由法律与正义党执政的波兰（Berman 2018）。
- 4 要被纳入数据集的议题讨论范围，相关问题必须在欧洲层面存在争议，即各国对该议题存在分歧。由于每个议题仅在投票当年被观察一次，这种编码方式形成了横截面数据结构。我们对技术官僚政府与民选政府在欧盟层面谈判中行为差异的比较属于描述性分析，无法将技术官僚主义与欧盟立场形成因果关联。
- 5 我们选择了一个较长的谈判期，研究技术官僚的投票行为是否与党派政府存在差异。这使得我们能够进行更广泛的比较，并探究技术官僚政府在整体投票行为上是否存在差异。
- 6 在前四个月期间，技术官僚政府还得到了右翼的人民正统集会（老挝）党的支持。该政党曾向内阁提名一名部长，但于2012年2月撤回了支持。
- 1 自2010年以来，英国选民持续承受紧缩预算政策的冲击，导致社会福利、住房、食品及医疗服务支出缩减，进而引发健康状况恶化、饥饿问题加剧以及死亡率上升（Stuckler等，2017）。
- 2 班恩是蝙蝠侠漫画及电影系列中的经典反派角色。在2012年华纳兄弟影业出品的《黑暗骑士崛起》中，这位反派在释放囚犯时发表了极具煽动性的反精英宣言：“我们从腐败集团、权贵阶层和压迫者手中夺回哥谭，他们用机会神话压制了你们几代人，现在我们要把这座城市还给你们——普通民众。哥谭属于你们！”唐纳德·特朗普的就职演说曾被网友戏称为模仿了这位漫画反派的台词，特别是那句“我们正将权力从华盛顿特区转移回你们——普通民众手中”。
- 3 数据最终将予以公开。在此之前，数据将根据请求共享。
- 4 “投票离开”的网站是<http://www.voteleavetakecontrol.org/>，“英国在欧洲更强”的网站是<http://www.strongerin.co.uk/>。一些新闻更新在网站上不再可用。在这些情况下，使用了Wayback Machine，archive.org。Wayback Machine是一个保存网页及其内容的互联网档案。
- 5 术语“随机地”以概率方式使用，例如随机分布。
- 6 潜在狄利克雷分配（LDA）就是这一概念的典型代表。
- 7 该主题实际上被标记为成本I主题，因为并非唯一涉及成本相关议题。
- 1 例如，可参阅Fischer（1990、1993、2009）关于智库与专业知识政治的论述，以及Radaelli（2003b）关于欧盟（EU）中专业知识表征的研究。
- 2 本文将始终采用简明的语言表达。为便于与比较政治学领域的同行交流，我们不会援引政策过程理论中的特殊术语（如多流理论、间断均衡、倡导联盟等；参见Weible和Sabatier 2017年的研究）。
- 3 我们参考该文献是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发展出本章核心的分类学方法。然而，我们承认技术官僚制存在其他分类方式——例如，有人可能认为技术官僚制也存在于突出的政策议题中，如卫生或紧缩政策。
- 4 这些并非虚构案例。关于参与政策制定的科学家可能存在的缺陷，可参阅Dror（1971a，1971b）的更全面论述。
- 5 Schon 和 Rein（1994年）阐述了偏好变化的范围条件。

- 1 使用了以下调查:EB72.4 (2009), EB73.4 (2010), EB76.3 (2011), EB7,8.1 (2012), EB79.3 (2013) 和 EB80.1 (2014), 可在 <https://www.gesis.or eurobarometer-data-service/search-data-access/data-access>.
- 2 欧洲晴雨表调查仅在2010年和2014年提供了关于技术官僚治理信任度及左右政治认同的数据。
- 3 在希腊,受访者对欧盟的信任度越高,支持三驾马车(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概率就高出三倍以上。
- 4 需注意的是,针对2014年数据运行了三种模型,分别用于检验政府救助、银行救助及技术官僚政府国家的左右效应。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针对每个交互变量分别建立了独立模型。
 - 1 关于“局外人”与“局内人”技术官僚的区分,参见Bersch (2016年)的研究。
 - 2 关于这一时期,可参阅Centeno (1993)、Conaghan 和 Malloy (1994)、Dominguez (1997)、Teichman (1997、2002、2004) 以及 Weyland (2002) 的研究。
 - 3 有关本研究项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Dargent (2015年)的研究。
 - 4 本章主要将这些行为者互换地称为专家或技术官僚。
 - 5 然而,与Collier的观点不同,此处仅指担任公共决策或顾问职务的个人,而不包括私营部门的个体。
 - 6 以下四段内容基于Dargent (2015)的结论。
 - 1 Mudde (2017)指出,匈牙利已成为‘欧洲非自由民主国家的典范’。Djankov (2015)梳理了匈牙利的相关政治事件,Djankov 与 Zilinsky (2016)则阐述了波兰民选领导人所采用的若干巩固策略。
 - 2 评论人士将大学毕业生、大城市居民、当选政客、富人、新闻从业者等群体贴上了冷漠或精英主义的标签。
 - 3 以美国为例,尽管巴拉克·奥巴马选择罗伯特·盖茨担任政府要职的决定并非民主党人当初推举总统候选人时所期望的任命,但无人会认为此举‘违背民主’(盖茨身为共和党人)。
 - 4 Caramani (2017: 54)指出:“尽管民粹主义代表形式已受到广泛关注,但技术官僚主义代表形式却长期被忽视。”
 - 5 然而,Mair采用的评估指标基于汇总数据——即简单累加特定选举中所有获胜政党的总得票数。其样本中的选举波动性在1990年代达到峰值,得分高达12.6%(较前几十年上升4个百分点)。Powell 和 Tucker (2014)的研究记录了后共产主义社会中显著的选举波动性,并指出新党派的加入与既有党派的退出共同构成了波动的主要来源。
 - 6 当然,支持某一理论的证据将推翻另一理论。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我们正在进行一项验证单一理论方法的尝试——该方法由现有文献提出,并暗示技术官僚政府应产生下游效应——同时观察我们能否推翻该理论。
 - 7 然而,经济变量(包括国际贸易暴露程度)并不能解释1980年至2016年间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
 - 8 在后共产主义社会中,仅有略低于半数的公民收入增速超过G7经济体(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016年数据)。换言之,收入趋同并非普遍现象。
 - 9 这些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FYR 马其顿、格鲁吉亚、匈牙利、哈萨克斯坦、科索沃、吉尔吉斯共和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

蒙古、黑山、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塔吉克斯坦、土耳其、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

- 10 另外两种观点分别是：“民主优于任何其他政治体制”和“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政府是民主还是专制并不重要”。
- 11 我们已验证，采用逻辑回归而非线性概率模型不会改变结果。
- 12 表A.3完整呈现了表13.1的所有规格参数，包含全部控制变量。此外，该表还包含另一模型规格（第二列），去除了技术官僚遗产指标变量，以便提供人口统计变量与政府批准之间的基线偏相关分析。
- 13 该刀片钳估计值为-0.021，t统计量为-1.0（p值=0.324）。
- 14 表A.4列出了表13.2的完整规格。
- 15 这些情绪的来源尚未明确：在政府能力被公众认可度提升的地区，民众满意度更高。尽管高效政府确实可能提升个人幸福感，但本章研究的重点并非探讨生活满意度或信任度的多元决定因素。
- 16 我们还注意到，对威权主义的接受程度难以预测。年龄、收入和教育水平并非有效的预测指标，令人意外的是，对经济状况的满意程度也无显著影响。数据显示，快乐人群对威权主义持开放态度的可能性仅降低1个百分点，而社会流动性较强的受访者平均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威权主义可被接受的可能性也下降了2个百分点。民众对政府反腐成效的认知与对威权主义的支持度呈显著负相关，但即便是第四栏报告的扩展模型也表明，民主热情不足的根源仍难以捉摸。
- 17 如需获取可针对这些目的进行调整的基线实验框架，请参阅 Klasnja 和 Tucker（2013年）的研究。
 - 1 本章中，我使用“人民”一词指代政治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即民主体制中的“demos”（民众）。界定各政治共同体的边界及‘人民’归属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与公众热议的焦点（马宁，1997；摩根，1988）。尤其在近几十年来，随着传统民族国家边界的逐渐模糊，政治极化、身份政治与民粹主义的兴起，这一议题愈发引人关注（克莱默，2016；穆勒，2016）。
 - 2 马里奥·蒙蒂领导的意大利政府（2011年）和卢卡斯·帕帕季莫斯领导的希腊政府（2011年）最受关注，这主要因其政策方案以实施财政紧缩措施为核心。欧洲近期还出现了其他技术官僚内阁任命案例，例如匈牙利的巴伊奈政府（2009年）、罗马尼亚的乔洛斯政府（2015年）以及克罗地亚的奥雷什科维奇内阁（2015年）。
 - 3 费希曼（2016）警示，即便完全依赖定期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即便其运作原则是民主的），这些机构仅以纯粹的受托人身份行事，所形成的民主形式也相当肤浅，缺乏民众自治的实质内涵。
 - 4 关于在许多成熟民主国家中，究竟是经济诉求还是社会文化诉求在“民粹主义反弹”的形成过程中更为重要，学界始终存在激烈争论。需要明确的是，这种特定现象的识别绝非意味着只有经济结果才具有决定性。双方论点各有可取之处，将这两种诉求模式视为相互交织而非彼此割裂的观点更具启发性。全球化推动的经济增长对各国社会群体产生了差异化影响，而社会文化诉求则与相对..

社会经济地位（关于此议题的进一步讨论，参见De Vries 2018年及Norris与Inglehart 2019年的研究）。

- 5 Scharpf（1999）将“产出合法性”定义为以欧盟机构能否有效治理人民为中心的绩效标准，将“投入合法性”定义为人民的政治参与和代表。
- 6 这一论点同样适用于民粹主义政客的行为模式。当这些政客以巩固自身地位和确保长期执政为目标时，在决定执政后，他们需要适当调整自身的“响应性”，以确保政治体系能够实现负责任的治理并产生积极成效。希腊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的执政记录便是明证——在最近一次选举后，该党已确立了在新两党制框架下作为合法反对派的地位。
- 7 马里奥·蒙蒂（2017年6月23日），在意大利米兰大学举行的欧洲政治科学协会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 8 McDonnell 和 Valbruzzi（2014）发现，技术官僚主导的政府往往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改革；而Alexiadou（本书第七章）则指出，技术官僚出身的财政部长更倾向于削减社会支出。然而，我们无法确定技术官僚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究竟是源于其个人政策偏好，还是迫于他们常需应对的危机。
- 9 更多案例可参阅Alexiadou（2018）及 Norris 和 Inglehart（2019）的研究。

参考文献

保罗·阿卡蒂诺（1997）。《柏拉图·政治家篇：译文与导论》（*Platone, Politico. Traduzione e introduzione*）。巴里：拉特扎出版社。埃马努埃尔·阿德勒与彼得·M·哈斯（1992）。《结论：认识论共同体》（*Conclus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World*）

《反思性研究项目的秩序与创建》*国际组织*46(1):367–90。

阿道夫·克里斯托弗（2013）。《银行家、官僚与中央银行政治：中立性的神话》。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凯特琳·安斯利（2017）。中央银行任命的政治因素。《政治学杂志》第79卷第4期：1205–1219页。

艾特肯，Mhairi（2010）。Why We Still Don't Understand the Social Aspects of Wind-Power: 文献中的关键假设批判。《能源政策》38(4):1834–41。

Akin, William E.（1977）。《技术官僚与美国梦：技术官僚运动，1900–1941》。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

阿克曼、阿格尼丝、Cas Mudde 和 Andrej Zaslove（2014）。民众有多民粹？——选民民粹主义态度测量。《比较政治研究》47(9):1324–53。

阿克曼，阿格尼丝，Andrej Zaslove 和 Bram Spruyt。（2017年）。“我们人民”还是“我们各民族”？荷兰民粹主义激进右翼与民粹主义激进左翼支持度的比较。《瑞士政治科学评论》23(4):377–403。

Albertazzi, Daniele and Duncan McDonnell (eds)（2008）。《二十一世纪民粹主义：西欧民主的幽灵》。Basingstoke: Palgrave。

Alesina, Alberto 和 Guido Tabellini（2007）。官僚还是政治家？第一部分：单一政策任务。《美国经济评论》97(1):169–179。

Alexiadou, Despina（2012）。为货币紧缩寻找政治资本：失业保险与货币党派周期。《欧洲政治研究杂志》51: 809–36。

Alexiadou, Despina（2015）。思想家、党派人士与忠诚派：议会民主制下的内阁大臣与社会福利改革。《比较政治研究》48(8): 1051–86。

Alexiadou, Despina（2016）。《意识形态家、党派人士与忠诚派：议会内阁中的部长与政策制定》。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阿莱克萨迪乌、德斯皮纳（2018）。技术官僚政府与经济政策。载于威廉·汤普森主编的《牛津政治研究百科全书》，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1–24页。

Alexiadou, Despina 与 Hakan Gunaydin（2015）。《技术官僚与专家型部长的任命及其政策效应》。芝加哥：中西部政治科学协会。

Alexiadou, Despina 和 Hakan Gunaydin（2019）。《承诺型专家？技术官僚任命作为应对经济危机的政治回应》。《欧洲政治研究杂志》58(3):845–65。doi:10.1111/1475-6765.12338。

- Alexiadou, Despina 与 Danial Hoepfner (2019)。平台、组合与政策：受众成本如何影响多党联合内阁的社会福利政策。《政治科学研究与方法》第7卷第3期：393-409页。
- 阿隆·巴卡特、萨尔和 Sharon Gilad (2016)。政治控制还是合法性缺失？官僚机构对自下而上公共压力的象征性回应。《政策与政治》44(1):41-58。
- 阿尔丝·阿姆斯特登 (2007)。《逃离帝国：发展中国家的天堂与地狱之旅》。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 安德森，本尼迪克特·R. (1991)。《想象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起源与传播的思考》。伦敦：Verso出版社。
- 安德韦格，鲁迪·B. (2000)。《政治招募与政党政府》。载于让·布朗代尔与毛里齐奥·科塔 (编)，《政党政府的本质：欧洲比较研究》观点。伦敦：帕尔格雷夫出版社 (第119-140页)。
- Angelova, Mariyana, Hanna Back, Wolfgang C. Muller and Daniel Strobl (2018)。西欧的否决权玩家理论与改革实践。《欧洲政治研究杂志》57(2):308-32。
- APSA (1950)。迈向更负责任的两党制。《美国政治科学评论》44(3):303-6。
- 阿尔塞，莫伊塞斯 (2006)。《社会中的市场改革：威权主义秘鲁的后危机政治与经济变革》。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
- 阿达蒂，本杰明 (2004)。民粹主义作为民主的幽灵：对卡诺文的回应。《政治研究》52(1): 135-43。
- 汉娜·阿伦特 (1958)。《人的境况》。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汉娜·阿伦特 (2005)。《政治的承诺》(The Promise of Politics)。纽约：Schocken出版社。
- Arrow, Kenneth, J (1951)。《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观》。纽黑文，CT：耶鲁大学出版社。
- 阿斯哈娜·阿努什卡 (2016)。《移民与欧盟公投：英国公众愤怒与挫败之声》。《卫报》，6月20日。
- 萨拉·巴布 (2001)。《管理墨西哥：从民族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巴迪、伯特兰与 Pierre Birnbaum (1983)。《国家社会学》。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Bailer, Stefanie, Mikko Mattila and Gerald Schneider (2015)。金钱驱动欧盟运转：部长理事会冲突的客观基础。《共同市场研究》53(3):437-56。
- 迈克尔·A·贝利、Brian Kamoie 和 Forrest Maltzman (2005)。第十司法机构的信号：总检察长在最高法院判决中的政治角色制作。《美国政治科学杂志》49(1):72-85。
- Balfour, Rosa 与 Sudha David-Wilp (2016)。《关于欧盟的五大迷思》。《华盛顿邮报》，7月15日。
- 特伦斯·鲍尔 (编) (1987)。《布鲁图斯书信集》(The Federalist with Letters of Brutu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班布罗，伦福德 (1963)。《柏拉图的政治类比》。载于彼得·拉斯莱特 (编)，《哲学、政治与社会》。牛津：巴兹尔·布莱克威尔出版社 (第98-115页)。
- 巴尔迪、卢西亚诺、Stefano Bartolini 和 Alexander H. Trechsel (2014a)。《响应与责任？21世纪政治中的政党角色》。《西欧政治》37(2):235-52。
- 巴尔迪、卢西亚诺、Stefano Bartolini 和 Alexander H. Trechsel (编) (2014b)。政党适应与变革及民主危机——纪念彼得·梅尔文集。《政党政治》20(2): 151-59。
- 巴克、安东尼和B.盖伊·彼得斯 (编) (1993)。《专家建议的政治学》。匹兹堡：匹兹堡大学出版社。

- 巴尔, 罗伯特·R. (2009)。民粹主义者、局外人与反建制政治。《政党政治》15(1): 29-48。
- Barro, Robert J. 与 David B. Gordon (1983)。货币政策模型中的规则、自由裁量权与声誉。《货币经济学杂志》12(1):101-21。
- Bauer, Michael W. 与 Stefan Becker (2014)。危机中的意外赢家: 欧盟委员会在经济治理中的强化作用。《欧洲一体化杂志》36(3):213-29。
- David Bearce (2007)。《货币分道扬镳: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国内政策自主权》。安阿伯: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 大卫·比瑟姆 (2013)。《权力的正当性》(第1版)。英国巴斯汀斯托克: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约翰·D·贝尔 (1997)。《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民主化与政治参与》。
- 保加利亚。见 Karen Dawisha 与 Bruce Parrott 主编的《东南欧的政治、权力与民主斗争》,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第 353-402 页。
- 本迪克斯, 莱因哈特 (1964)。《国家建设与公民身份: 我们不断变化的社会秩序研究》。纽约: 威利出版社。
- 贝内维斯特, 盖伊 (1977)。《专家政治学》(第二版)。旧金山: 博伊德与弗雷泽出版社。
- 伯林斯基、塞缪尔、Torun Dewan 与 Keith Dowding (2012)。《部长们的账本: 1945-2007年英国政府的丑闻与存续》。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 Berman, S. (2017)。民粹主义是个问题: Elitist Technocrats Aren't the Solution。外交政策, 12月20日。https://foreignpolicy.com/2017/12/20/populism-is-a-problem-elitist-technocrats-arent-the-solution。
- Berman, S. (2018)。《左翼为何失败: 中左翼的衰落——比较视角》(第一版)。布里斯托尔: 布里斯托尔大学出版社。
- 凯瑟琳·伯施 (2016)。《问题解决优于权力强化的优势》。《比较政治学》48(2): 205-25。
- 埃里·贝尔苏 (2019)。《政治不信任的再思考》。《欧洲政治科学评论》11(2): 213-30。
- Bertsou, Eri 和 Daniele Caramani (2017)。公民的技术官僚态度: 对九个欧洲国家的调查。苏黎世大学。www.ipz.uzh.ch。
- Bertsou, Eri 与 Daniele Caramani (即将发表)。《专家泛滥: 欧洲九国公民的技术官僚主义态度》。《美国政治科学杂志》。
- Bertsou, Eri 和 Giulia Pastorella (2016)。《成熟民主国家的态度表明政治领域仍有独立专家的生存空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博客。
- Bertsou, Eri 和 Giulia Pastorella (2017)。技术官僚态度: 专家决策的公民视角。《西欧政治》40(2):430-58。
- 蒂莫西·贝克利 (2006)。《原则性代理人? 善政的政治经济学》。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 汉斯·格奥尔格·贝茨 (1994)。《西欧激进右翼民粹主义》。基斯托克: 麦克米伦出版社。
- 克里斯托弗·比克顿 (2011)。欧洲新麦迪逊主义者: 多层级政体中有限权力合法性的再思考。《政治研究》59(3):659-73。
- Bickerton, Christopher (2012)。《欧洲一体化: 从民族国家到成员国》。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 Bickerton, Christopher (2016)。《欧盟: 公民指南》。伦敦: 企鹅出版社。
- 克里斯托弗·比克顿 (2017)。《左翼从政治到法律的历程》。载于理查德·埃金斯与格雷厄姆·吉主编的《司法权力与左翼》(伦敦: 政策交流出版社, 第56-61页)。

- Bickerton, Christopher 与 Carlo Invernizzi Accetti (2017)。民粹主义与技术统治：对立还是互补？*国际社会与政治哲学批判评论* 20(2):186-206。
- Biernacki, R. (2009a)。《定量文化社会学之后：将解释科学作为使命》。载于I. Reed与J. C. Alexander (编)，《意义与方法》。科罗拉多州博尔德：Paradigm出版社 (第119-208页)。
- Biernacki, R. (2009b)。《虚假陈述的平庸性》。见I. Reed与J. C. Alexander (编)，《意义与方法》。科罗拉多州博尔德：Paradigm出版社 (第253-262页)。
- Biglaiser, Glen (2002)。《国家守护者？经济学家、将军与拉丁美洲经济改革》。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出版社。
- Bin, Roberto 和 Giovanni Pitruzzella (2012)。公共法。都灵：Giappichelli。
- 比奇, 安东尼·H. (1964)。《代议制与责任政府：英国宪法论文》。伦敦：艾伦与昂温出版社。
- 伯恩鲍姆, 皮埃尔 (1988)。《国家与集体行动：欧洲经验》。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布莱克、朱莉娅和 Robert Baldwin (2012)。《当风险监管目标过低时：一个战略框架》。*规范与治理* 6(2): 131-48。
- 布莱克, 亚伦 (2016)。《特朗普-克林顿总统辩论实录 (附注释)》。《华盛顿邮报》，9月26日。
- Blei, David M. (2012)。概率主题模型。*ACM通讯* 55(4): 77-84。
- Blei, David M. 与 John D. Lafferty (2009)。主题模型。收录于Ashok N. Srivastava与Mehran Sahami (编)，*文本挖掘*。博卡拉顿：查普曼与霍尔出版社/CRC出版社 (第101-24页)。
- 艾伦·S·布林德 (1997)。政府是否过于政治化？《外交事务》76(6):115-26。
- 布洛克, 保罗 (2002)。《变革中的连续性：罗马尼亚经济改革的社会影响》。载于亚历克斯·E·费尔南德斯·吉尔伯托与玛丽克·里特霍夫 (编)，《发展中的劳资关系》。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 (第95-120页)。
- 让·布朗代尔 (1991)。《内阁政府与内阁大臣》。载于让·布朗代尔与让-路易·蒂博 (编)，《西欧政府部长职业》。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 (第5-18页)。
- Blondel, Jean (2000)。政府支持型政党关系的实证分析框架。见Jean Blondel与Maurizio Cotta (编)，《政党政府的本质：欧洲比较视角》，伦敦：Palgrave出版社，第96-115页。
- 布朗代尔、让与 Maurizio Cotta (编) (2000年)。《政党政府的本质：欧洲比较视角》。伦敦：帕尔格雷夫出版社。
- Blondel, Jean 和 Ferdinand Muller-Rommel (编) (2001)。《东欧的内阁》。纽约：Palgrave。
- BNR (2013)。《看护者》。马林·雷科夫总理在布鲁塞尔。3月30日。
- 博比奥, 诺尔贝托 (2005)。《自由主义与民主》。伦敦：Verso出版社。
- Borzel, Tanja A. (2002)。成员国对欧洲化的反应。*欧洲共同市场研究杂志* 40(2): 193-214。
- 博斯科、安娜与 Duncan McDonnell (2013)。《蒙蒂政府与意大利政党的衰落》。载于安娜·博斯科与邓肯·麦克唐纳 (编)，《从贝卢斯科尼到蒙蒂》。纽约：伯格汉出版社 (第37-56页)。
- Bosco, Anna 和 Susannah Verney (2012)。《选举疫情：2010-2011年南欧经济危机的政治代价》。《南欧社会与政治》17(2):129-154。
- 皮埃尔·布迪厄 (2002年)。反对去政治化政策。*政治经济学研究* 69(1):31-41。
- Box, George E. P. (1979)。所有模型都是错误的，但有些是有用的。*统计学中的稳健性* 202: 549。

博伊兰, 德莉娅 (1998)。《先发制人: 智利从威权统治过渡时期的中央银行改革》。《比较政治学》30(4):443-62。

Braun, Benjamin (2015)。《驾驭未来: 欧洲央行在大缓和时期的预期管理》。

《经济与社会》44(3): 367-91. Braun, Benjamin (2018)。《中央银行与金融的基础设施力量》:

欧洲央行支持回购与证券化市场的案例。《社会经济评论》。doi:10.1093/ser/mwy008。

布伦南, 杰森 (2016)。《反对民主》。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威妮迪·布朗 (2015)。《撤销示范: 新自由主义的隐秘革命》。马萨诸塞州剑桥: Zone Books。

布鲁克利克, 米洛斯 (2015)。技术官僚内阁的崛起: 我们已知的, 以及我们应当了解的。《奥地利政治科学杂志》44(3): 57-67。

米洛什·布伦克利克 (2016)。捷克共和国的三届技术官僚内阁: 政党失败的征兆? 《中欧政治》12(2):7-28。

Brunclik, Milos与Michal Parizek (2018): 技术官僚内阁何时形成? 《欧洲政治比较》。doi:10.1057/s41295-018-0124-3。

布坎南, 詹姆斯·B. (1979)。《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印第安纳波利斯: 自由出版社。布坎南, 詹姆斯·B. (1994)。《自由主义宪法札记》。《卡托杂志》14(1):1-9。

彼得·伯纳姆 (2001)。新工党与去政治化政治。《英国政治与国际关系杂志》3(2):127-49。

布西奥克、马达琳娜·E.与Martin Lodge (2016)。公共问责制的声誉基础。《治理》29(2):247-63。

安德鲁·伯恩 (2017)。罗马尼亚抗议者持续打击政府腐败。《金融时报》, 2月7日。

布鲁斯·卡尔德威尔与Leonidas Montes (2015)。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与智利之行。《奥地利经济学评论》28(3):261-309。

卡梅罗、马塞洛与Anibal Perez-Linan (2015)。总统制下部长留任的政治机制。《比较政治》47(3):315-33。

坎普, 罗德里克 (1998)。《墨西哥式技术官僚制: 民主的前身?》米格尔·安赫尔·森特诺与帕特里西奥·席尔瓦 (编), 《拉丁美洲的专家政治学》, 纽约: 麦克米伦出版社, 第196-213页。

Canovan, Margaret (1999)。《信任人民! 民粹主义与民主的两面性》。《政治研究》47(1):2-16。

卡普, 彼得 (2017)。《移民与反移民话语: 英国脱欧的早期修辞》。载于P.卡普 (编), 《恐惧的语言》。伦敦: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 (第67-79页)。

Caplan, Bryan (2007)。《理性选民的神话: 为何民主国家选择错误政策》。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卡拉马尼, 达尼埃莱 (2000)。《1815年以来西欧的选举》。伦敦: 帕尔格雷夫出版社。

卡拉马尼, 达尼埃莱 (2004)。《政治的国家化: 西欧国家选民与政党体系的形成》。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卡拉马尼, 达尼埃莱 (2015)。《政治的欧洲化: 历史视角下的欧洲选民与政党体系形成》。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Caramani, Daniele (2017)。Will vs.原因: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政治代表形式及其对政党政府的批判《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11(1):54-67。

卡迪尼, 菲利波·恩里科 (2014)。《经济危机的英语隐喻分析》。《语言与语言学》9(11):59-76。

卡彭特, 丹尼尔·P. (2010)。《声誉与权力: FDA的组织形象与药品监管》。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Carpenter, Daniel P. 和 George A. Krause (2012). 声誉与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评论* 72(1):26-32.
- 卡尔, 爱德华·H. (1995年[1939年]). 《二十年危机, 1919-1939》. 伦敦: 麦克米兰出版公司
- 卡斯, 奥伦 (2016). 《新中央规划者》. 《国家事务》27 (春季).
- 卡斯塔纽·席尔瓦、布鲁诺、塞巴斯蒂安·容肯茨、马克·赫布林等. 2019. 七种民粹主义态度量表的实证比较. *政治研究季刊*. doi:10.1177/1065912919833176.
- Miguel Angel ·森特诺 (1993). 《新利维坦: 技术统治的动态与边界》. *理论与社会* 22(3):307-35.
- 米格尔·安赫尔·塞尼托 (1994). 《理性中的民主: 墨西哥技术官僚革命》.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 大学公园.
- 森特诺、Miguel Angel 和 Sylvia Maxfield (1992). 《金融与秩序的结合: 墨西哥政治精英的变迁》. 《拉丁美洲研究杂志》24(1):57-58.
- Centeno, Miguel Angel and Patricio Silva (编) (1998). *拉丁美洲的专家政治*. 纽约: Macmillan.
- Cepeda Ulloa、费尔南多和 Christopher Mitchell (1980). 《技术官僚制趋势》. 见阿尔伯特·贝里、罗纳德·赫尔曼和毛里西奥·索劳恩 (编), 《妥协政治: 哥伦比亚的联合政府》. 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 交易图书出版社 (第237-257页).
- 乔纳森·张、Chong Wang · Jordan Boyd-Graber、Sean Gerrish 和 David M. Blei (2009). 《解读茶叶: 人类如何解读主题模型》. *神经信息处理系统*.
- 杰弗里·T·切克尔 (2001). 《为何服从? 社会学习与欧洲身份认同变迁》. *国际组织* 55(3):553-88.
- 克里斯滕森, 约翰 (2017). *国家内部经济学家的力量*. 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 杰弗里·赫维罗思 (2007).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新兴市场资本账户自由化. *国际组织* 61(2):443-63.
- 科利尔, 大卫 (编) (1979). 《拉丁美洲的新威权主义》.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Collier, David 和 John Gerring (编) (2008). 《社会科学中的概念与方法: 乔瓦尼·萨托里的传统》. 纽约: 劳特利奇出版社.
- 科利尔、大卫和 Steven Levitsky (1997). 《民主的形容词: 比较研究中的概念创新》. *世界政治* 49(3):430-51.
- Collier, David 和 James E. Mahon (1993). 概念性“拉伸”再探: 比较分析中的类别适应.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 87(4):845-55.
- Collignon, Stefan 和 Sebastian Diezner (2016). 欧洲央行与欧洲议会的货币对话: 欧元危机期间的效率与问责? *期刊* 《共同市场研究》54(6): 1296-312.
- Collins, H. M. 与 R. Evans (2002). 《科学研究的第三波浪潮: 专家与经验研究》. 《科学社会研究》32(2):235-96.
- Collins, Harry M. 和 Robert Evans (2007). *重新思考专业能力*.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凯瑟琳·康纳汉 (1998). 《危机之星: 秘鲁经济学家的崛起》. 载于米格尔·安赫尔·森特诺与帕特里西奥·席尔瓦 (编), 《拉丁美洲的专家政治》. 纽约: 麦克米伦出版社 (第142-164页).
- 康纳汉, 凯瑟琳·M. 与 James M. Malloy (1994). *混乱的治国之道: 安第斯中部地区的民主与新自由主义*. 匹兹堡: 匹兹堡大学出版社.
- 康诺利, 威廉·E. (1993). 《政治话语的术语》(第3版). 牛津: 巴兹尔·布莱克威尔出版社.
- 康拉德·库尔特内·R. 与 Sona N. Golder (2010). 中东欧民主国家政府存续期与稳定性的测量. *欧洲政治研究杂志* 49(1):119-50.

- 菲利普·E·康弗斯与罗伊·皮尔斯（1986）。《法国政治代表制》。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 马克·科佩洛维奇、Jeffrey Frieden 和 Stefanie Walter（2016）。《欧元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研究》49(7):811-840。
- 哈维尔·科拉莱斯（2004）。《阿根廷技术官僚式政策制定与议会问责制（1983-2002）》。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工作论文。
- 科拉莱斯、哈维尔和 Michael Penfold（2011）。《热带的龙：乌戈·查韦斯与委内瑞拉革命的政治经济学》。华盛顿特区：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
- 路易吉·科里亚斯（2017）。《欧洲权力的空位：争议民主与技术官僚威胁》。《欧洲法律杂志》23(6):482-94。
- Costa Pinto、安东尼奥与 Pedro Tavares·德阿尔梅达（2017）。《专家优先？葡萄牙民主中的非党派部长》。载于安东尼奥·科斯塔·平托、毛里齐奥·科塔与佩德罗·塔瓦雷斯·德阿尔梅达（编），《欧洲民主国家的技术官僚部长与政治领导》。Cham：施普林格出版社（第111-137页）。
- Costa Pinto、安东尼奥、Maurizio Cotta 和 Pedro Tavares·德阿尔梅达（编）（2017）。《技术官僚型部长与欧洲民主国家的政治领导力》。Cham：施普林格出版社。
- Cotta, Maurizio（2000a）。结论：从简单的政党政府世界到更复杂的政党-政府关系视角。见 Jean Blondel 和 Maurizio Cotta（编），《政党的本质：欧洲比较研究观点》。伦敦：帕尔格雷夫出版社（第196-222页）。
- 科塔，毛里齐奥（2000b）。《政党和政府的定义》。载于让·布朗代尔与毛里齐奥·科塔（编），《政党的本质：欧洲比较视角》。伦敦：帕尔格雷夫出版社（第56-95页）。
- 科塔，毛里齐奥（2018）。技术官僚政府与政党政府之争？无党派部长与欧洲民主国家政治领导力的演变。载于安东尼奥·科斯塔·平托、毛里齐奥·科塔与佩德罗·塔瓦雷斯·德阿尔梅达（编），《技术官僚部长与欧洲民主国家的政治领导力》。Cham：施普林格出版社（第267-288页）。
- 科塔、毛里齐奥与 Luca Verzichelli（2002）。《意大利政界风云：政要、党派人物、技术官僚与媒体人》。《南欧社会与政治》7(2): 117-52。凯瑟琳·J·克莱默（2016）。《怨恨政治：威斯康星州的乡村意识与斯科特·沃克的崛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伯纳德·克里克（1962）。《为政治辩护》。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克里斯托夫·克罗姆贝兹（2003）。《欧盟的民主赤字：无事生非？》。《欧盟政治》4(1):101-20。
- 科林·克劳奇（1993）。《工业关系与欧洲国家传统》。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科林·克劳奇（2011）。《新自由主义的奇异非死亡》。剑桥：政治出版社。
- 克劳，克里斯托弗与 Ellen E. Meade（2007）。《全球央行治理的演变》。《经济展望杂志》21(4):69-90。克罗齐尔，迈克尔、塞缪尔·P·Huntington 与 Joji Watanuki（1975）。《民主的危机》。《民主治理能力报告》（提交给三边委员会）。卡尔佩珀，佩珀·D.（2014）。《直接民主的政治经济学：意大利》。马里奥·蒙蒂时期的紧缩政策。《西欧政治》37(6):1264-81。
- 罗伯特·A·达尔（1956）。《民主理论导论》（*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罗伯特·A·达尔（1971）。《多元政治：参与与反对》。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 达尔，罗伯特·A.（1985）。《控制核武器：民主与监护权之争》。西拉丘兹：西拉丘兹大学出版社。

- 爱德华多·达根特（2014）。国家机构能力的国际决定因素。笔记41（74）：9-40。
- 达根特，爱德华多（2015）。《拉丁美洲的技术官僚与民主：专家治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达松维尔、露丝和 Marc Hooghe（2011）。《欧洲选举波动性地图：1946年以来欧洲民主国家选举波动趋势分析》。欧洲比较选举研究会议，索菲亚。
- 威廉·戴维斯（2016）。《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权威、主权与竞争逻辑》。洛杉矶：Sage出版社。
- 费迪南德·德·索绪尔（1983）。《普通语言学教程》，R·哈里斯译。伦敦：达克沃斯出版社。
- De Vries, Catherine E.（2018）。《欧洲怀疑论与欧洲一体化的未来》。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De Vries, Gerard（2016）。《政治家的使命是什么？》收录于布鲁诺·拉图尔与克里斯托夫·勒克莱尔主编的《重置现代性！》（*Reset Modernity!*）一书，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第387-394页。德·维尔德、皮特、安娜·勒波尔德与亨宁·施密特克（2016）。引言：欧洲治理的政治化分化。《西欧政治》39(1):3-22。
- De Winter、Lieven、Arco Timmermans 和 Patrick Dumont（2000）。比利时：论政府协议、福音派、追随者与异端。见 Wolfgang C. Muller 与 Kaare Strøm（编），《西欧联合政府》。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300-55页）。
- 德莫坦，大卫（2011）。《科学家与风险监管》。切尔滕纳姆：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
- 克里斯·德舒尔与 Sam Depauw（编）（2014）。《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代表制》。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Devins, Neal 和 David E. Lewis（2008）。《非独立机构：政党极化与制度设计的局限》。《波士顿大学法律评论》88:459-98。
- 德维里斯、皮特、Jaime Guajardo、Daniel Leigh 和 Andrea Pescatori（2011）。《财政整顿行动数据集新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论文第11/128号。
- Dewan, Torun 和 Rafael Hortalá-Vallve（2011）。政府组建的三大要素：任命、分配与任务。《美国政治科学杂志》55(3):610-27。
- 德扎莱，伊夫与 Bryant G. Garth（2002）。《宫廷战争的国际化：律师、经济学家与拉丁美洲国家转型竞赛》。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朱塞佩·迪·帕尔马（1990）。《民主的构建》。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
- 戴维·迪克森（1981）。《民主的局限：技术官僚与自由主义国家》。《民主》1(1):61-79。
- Diethelm, Pascal 和 Martin McKee（2009）。否认主义：其本质及科学家应如何应对？《欧洲公共卫生杂志》19(1):2-4。
- DiMaggio, Paul、Manish Nag 和 David Blei（2013）。利用主题建模与文化社会学视角之间的亲和性：在报纸中的应用——美国政府艺术资助的报道。《诗学》41(6):570-606。
- Dinas, Elias 和 Lamprini Rori（2013）。《2012年希腊议会选举：民调中的恐惧与厌恶》。《西欧政治》36(1):270-82。
- 西蒙·扬科夫（2015）。《欧尔班治下的匈牙利：中央计划能否重振经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政策简报。
- Djankov, Simeon 与 Jan Zilinsky（2016）。《东欧：压力下的自由》。实时经济问题观察。

- Djankov, Simeon, Elena Nikolova and Jan Zilinsky (2016). 东欧的幸福鸿沟. *比较经济学杂志* 44(1): 108–24.
- 多明格斯, 豪尔赫 (编) (1997). *技术政策: 1990年代拉丁美洲政治与市场的解放*. 大学公园: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
- 多梅特、凯瑟琳与 Luke Temple (2019). 《专家疗法? ——探索专业知识对公众满意度的修复潜力》. *政治研究*. doi:10.1177/0032321719844122.
- Donadio, Rachel (2011). 希腊和意大利寻求技术官僚的解决方案. *纽约时报*, 11月10日.
- Dowding, Keith and Patrick Dumont (2009). *欧洲部长的选拔: 聘用与解雇*. 纽约: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 Drazen, Allan 和 Erkut Y. Ozbay (2015). ‘被选为领导者’ 是否引发非利他行为? 关于互惠的实证研究. 马里兰大学 CEPR 讨论论文 1138.
- Dror, Yehezkel (1967). 政策分析师: 政府服务中的新专业角色. *公共行政评论* 27(3): 197–203.
- Dror, Yehezkel (1971a). *政策科学设计*. 纽约: 爱思唯尔.
- Dror, Yehezkel (1971b). *政策科学的探索*. 纽约: Elsevier.
- 德罗尔、耶赫泽克尔 (1984). 《咨询规则的政策分析》. 载于罗尔夫·汤姆林森与伊什特万·基斯 (编), 《重新思考运筹学与系统分析过程》. 牛津: 佩尔加蒙出版社 (第79–124页).
- 德雷泽克、约翰、安德烈·巴赫蒂格、西蒙娜·钱伯斯等 (2019). 民主的危机与审议科学. *科学* 36 (6432): 1144–46.
- 邓洛普, 克莱尔·A. (2009). 政策转移即学习——捕捉决策者从知识社群中获取学习内容的差异性. *政策研究* 30(3): 291–313.
- 邓洛普, 克莱尔·A. (2014). 潜在专家: 知识共同体如何协商生态系统服务政策中知识使用的障碍. *环境与规划C: 政治与空间* 32(2): 208–28.
- 邓洛普, 克莱尔·A. (2016). 知识、认知社群与议程设置. 见尼古拉斯·扎哈里亚迪斯 (编),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手册*. 切尔滕纳姆: 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 (第273–294页).
- 邓洛普, 克莱尔·A. (2017年). 政策学习的病理机制: 其本质及对政策失败的贡献机制 *政策与政治* 45(1): 3–18.
- 邓洛普、克莱尔·A. 与 Claudio M. Radaelli (2013). 政策学习的系统化: 从单一模式到多维分析. *政治研究* 31(3): 599–619.
- Dunlop, C. A. Claudio M. Radaelli (编) (2016). 《监管影响评估手册》. 切尔滕纳姆: 爱德华·埃尔加出版社.
- Francisco Durand (2006). 《企业制度强化问题》. 见 John Crabtree (编), *建设制度: 民主、发展与1980年以来的秘鲁不平等现象*. 利马: 秘鲁研究所. 罗纳德·德沃金 (1993). *《生命的统治: 关于堕胎、安乐死和个人自由》* 纽约: 克诺夫出版社.
- Earle, Joe, Cahal Moran and Zach Ward-Perkins (2017). *《经济统治论: 论将经济学交给专家的危险》*. 伦敦: 企鹅出版社.
- 东顿, 大卫 (1953). *《政治体系: 政治学研究现状》*. 纽约: 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出版社.
- 大卫·伊斯特顿 (1965). *《政治分析框架》* (英文版). 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 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
- 经济学家智库 (2011-2016). 《年度国家报告》, 伦敦卡伯特广场20号.
- Eggertsson, Gauti B. 与 Erik Le Borgne (2010). 《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政治代理理论》. *《货币信贷与银行》期刊* 42(4): 647–77.

罗伯特·埃尔吉（2006）。政府为何将权力下放给准自治机构？以法国独立行政机构为例。《治理》19(2):207-27。

埃勒纳，史蒂夫（2003）。《乌戈·查韦斯民粹主义的对比变体》

Alberto Fujimori .*Latin American 研究杂志* 35(1):139-62. Ellul, Jacques（1964）。《技术社会》.纽约: Knopf.

亨利·埃尔森（1967）。《技术官僚：自动化预言家》。雪城：雪城大学出版社。

Elster, Jon and Rune Slagstad（编）（1988）。《宪政与民主》.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恩瑟·耶登尼斯，劳伦茨（2014）。《政党政治与央行行长的生存之道》。《欧洲政治研究杂志》53(3):500-19。

恩瑟·耶登尼斯特，劳伦茨（2015）。监管机构的政治化：在党派影响与形式独立之间。《公共行政研究与理论杂志》26(3):507-18。

埃斯科瓦尔，Maria Luisa，Ursula Giedion，Antonio Giufrida 和 Amanda L. Glassman（2009年）。哥伦比亚：十年卫生系统改革。见 Ursula Giedion、Amanda Glassman、Antonio Giufrida 和 Maria Luisa Escobar（编），《从少数到多数：哥伦比亚十年医疗保险扩展》。华盛顿特区：IDB / 布鲁金斯（第1-130页）。

安德斯·埃斯马克（2017）。或许该重新审视技术官僚制了？治理时代行政改革新分析的旧框架。《公共行政研究与理论杂志》27(3):501-16。

埃斯伦德，大卫（2008）。《民主权威：一个哲学框架》。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埃斯特拉达·阿尔瓦雷斯，哈伊罗（2005）。《哥伦比亚的知识精英与经济政策制定》。载于哈伊罗·埃斯特拉达·阿尔瓦雷斯（编），《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技术官僚与新自由主义改革》。波哥大：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安德烈斯·贝略协议/康西尼亚斯出版社。

尤劳，海因茨（1973）。《技能革命与协商联邦》。《美国政治科学评论》67(1): 169-91。

Euractiv（2011）。希腊、意大利押注技术官僚以恢复信心。11月16日。<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lections/news/greece-italy-bet-on-technocrats-to-re-store-confidence/>，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9月11日。

Euractiv（2018）。《成员国不应让欧盟委员会孤立意大利》，作者：Reinout van der Veer。10月26日。

欧洲每日简报（2011年）。意大利改革：蒙蒂政府面临的希望与障碍。11月16日。<https://agenceurope.eu/en/bulletin/article/10495/1>，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9月11日。

欧洲中央银行（2017年）。《欧洲央行的角色：危机时代的审慎与责任》。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彼得·普雷特在海德堡研讨会上的演讲，海德堡，5月11日。

埃文斯，彼得（1992）。《国家作为问题与解决方案：掠夺、嵌入式自主性与结构变革》。载于斯蒂芬·哈格德与罗伯特·R·考夫曼（编），《调整的政治》。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第139-181页）。

Ezrow, Laurence 和 Timothy Hellwig（2014）。《回应选民还是回应市场？全球化时代的政党与公众舆论》。《国际研究季刊》58(4):816-27。

- 费尔克劳夫, 诺曼 (2013)。《批判性话语分析与批判性政策研究》。《批判性政策研究》7(2): 177-97。
- 费伦, 詹姆斯·D. (1994)。国内政治受众与国际争端升级。《美国政治科学评论》88 (3): 577-92。
- 费伦, 詹姆斯·D. (1997)。《外交政策利益的信号传递: 束缚手脚与沉没成本之争》。《冲突解决杂志》41(1):68-90。
- Feindt, Peter H.与 Angela Oels (2005)。《话语是否重要? 环境政策制定中的话语分析》。《环境政策与规划杂志》7(3):161-73。
- 何塞·费尔南德斯-阿尔伯托斯 (2015)。《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政治学》。《政治学年评》18(1):217-37。
- 毛里齐奥·费雷拉 (1997)。《意大利福利国家的不确定未来》。《西欧政治》20(1): 231-49。
- 《金融时报》(2010年)。吉迪恩·拉赫曼所著《欧元危机解析》。
- 《金融时报》(2011年)报道: 希腊总理推出金融投资组合。
- 《金融时报》(2013年)。保加利亚看守人许诺: 在不确定性再度降临前, 将带来稳定局面——作者: 安德鲁·麦克道尔
- 摩西·芬利 (1973)。《民主——古代与现代》。安娜堡: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 弗兰克·费舍尔 (1990)。《技术统治与专家政治》。加利福尼亚州纽伯里公园: Sage出版社。
- 弗兰克·费舍尔 (1991)。《美国智库: 政策精英与专业知识的政治化》。《治理》4 (3): 332-53。
- 弗兰克·费舍尔 (1993)。《政策话语与华盛顿智库政治》。载于弗兰克·费舍尔与约翰·福雷斯特 (编), 《政策分析与规划中的论辩转向》。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 杜克大学出版社 (第21-42页)。
- 弗兰克·费舍尔 (2000)。《公民、专家与环境: 地方知识的政治》。伦敦: 杜克大学出版社。
- 弗兰克·费舍尔 (2009)。《民主与专业: 政策研究的重新定位》。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 罗伯特·M·费什曼 (2016)。《重新思考民主的实证分析维度: 真实性、质量、深度与巩固》。《政治学年鉴》科学19(1):289-309。
- 弗利格斯坦、尼尔、Jonah Stuart·布伦戴奇和 Michael Schultz (2017)。《像美联储那样看问题: 文化、认知与框架在2008年金融危机预期失败中的作用》。《美国社会学评论》82(5):879-909。
- 马修·弗林德斯 (2010)。《为政治辩护》。载于《政治季刊》第8期, 第309-326页。
- 弗林德斯、马修与 Jim Buller (2006)。去政治化: 原则、策略与工具。《英国政治》1(3):293-318。
- Flora, Peter (1977)。《定量历史社会学: 趋势报告与参考文献目录》。《当代社会学》23(2)。海牙: Mouton出版社。
- Flyvbjerg, Bent (2002)。《将权力引入规划研究: 一位研究者的实践故事》。《规划教育与研究杂志》21(4):353-66。
- Flyvbjerg, Bent (2004)。《前瞻性规划研究: 理论与方法论反思》。《规划理论与实践》5(3):283-306。
- Føllesdal, Andreas和 Simon Hix (2006)。《欧盟为何存在民主赤字: 对Majone和

Moravcsik的回应》。 *JCMS：共同市场研究杂志*
44(3): 533–62.

Foster、Chase和 Jefry Frieden（2017）。信任危机：欧洲人政府信心的社会经济决定因素。《*欧盟政治*》18(4):511–35。

- 米歇尔·福柯（1980）。《权力/知识：1972-1977年访谈选集及其他著作》。纽约：Pantheon Books。
- Fourcade, Marion (2009). 《经济学家与社会：1890年代至1990年代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学科与职业》。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福卡德、马里昂、Etienne Ollion 和 Yann Algan (2015)。《经济学家的优越性》。《经济展望杂志》29(1):89-114。
- 福尔卡德-古林查斯、马里昂与 Sarah L. Babb (2002)。《自由主义信条的重生：四国新自由主义发展路径》。《美国社会学杂志》108(3): 533-79。
- 法比奥·弗兰基诺 (2002)。效率还是可信度？——对欧盟委员会授权机制两种逻辑的检验。《欧洲公共政策杂志》9(5): 677-94。
- 弗里德曼，丽莎 (2018年)。“我不知道这是人为造成的，” 特朗普在谈到气候变化时说。是的。《纽约时报》。
- 米尔顿·弗里德曼 (1968)。货币政策的作用。《美国经济评论》58(1):1-17。
- 弗里德曼、米尔顿和 Rose Friedman (1980年)。《自由选择：个人声明》。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律师事务所。
- 卡洛·富萨罗 (2013)。《蒙蒂政府的组建与共和国总统的角色》。载于安娜·博斯科与邓肯·麦克唐纳 (编)，《意大利政治：从贝卢斯科尼到蒙蒂》。纽约：伯格汉出版社 (第78-97页)。
- Gade, Thomas, Marion Salines, Gabriel Glockler and Steffen Strodthof (2013)。唇无坚齿，市场沉沦？政治沟通对主权债券利差的影响。欧洲央行偶发论文系列2013年6月 (150)。
- 加拉索、文森佐和 Tommaso Nannicini (2011)。《在优秀政治家的竞争中》。《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05(1):79-99。
- Walter Bryce Gallie (1956)。《本质上存在争议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学会会刊》56(1):167-98。
- Ganev, Georgy Y. and Michael L. Wyzan (2005)。保加利亚：货币委员会安排下稳定政策的宏观经济与政治经济影响。见 Mats Lundahl 和 Michael L. Wyzan (编)，《改革失败的政治经济学》。阿宾顿：Routledge出版社 (第170-196页)。
- 加德尔，内森 (2012)。《马里奥·蒙蒂在意大利推行的去政治化民主》。《新视角季刊》29(2):27-31。
- 加维里亚、亚历杭德罗、Carlos Medina、Carolina Mejia、David McKenzie 和 Rodrigo Soares (2006)。《评估哥伦比亚卫生改革：从理论到实践》。《经济》7(1): 29-72。
- Geddes, Barbara (1990)。巴西的“国家”自主性构建 (1930-1964)。《比较政治学》22(2):217-35。
- 贝拉·格德斯 (1994)。《政治家的困境：拉丁美洲国家能力建设》。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
- 欧内斯特·盖尔纳 (1983)。《国家与民族主义》。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
- 格尔楚诺夫、巴勃罗与 Carlos Diaz 亚历杭德罗 (1989)。《庇隆主义经济政策 (1946-1955)》。载于吉多·迪泰拉与鲁迪格·多恩布施 (编)，《阿根廷政治经济学 (1946-1983)》。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 (第59-88页)。
- 吉拉德、莎伦 (2012)。《注意力与声誉：监管机构内外部世界的关联》。载于马丁·洛奇与凯·韦格里希 (编)，《危机时代的行政政治》。英国巴斯汀斯托克：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 (第157-175页)。

- 吉拉德, 莎伦 (2015)。政治压力、组织认同与任务专注: 危机前金融监管的案例
分析。《公共行政》93(3): 593-608。
- 吉拉德、沙伦、摩西·莫兰与帕齐特·本-农·布鲁姆 (2013)。组织声誉、公共指
控内容与监管沟通。《公共行政研究与理论杂志》25(2):451-78。
- 法布里齐奥·吉拉迪 (2002)。《政策可信度与独立机构授权: 比较实证分析》。
《欧洲公共政策杂志》9:873-93。法布里齐奥·吉拉迪 (2005)。《监管资本主
义的制度基础》:
西欧独立监管机构的扩散。《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598(1):84-101。
- 法布里齐奥·吉拉迪 (2010)。政策传播过程中的学习者是谁? 《美国政治科学杂
志》54(3):650-66。
- 吉列, 布鲁斯 (2017)。技术官僚制与民主作为公共政策中的正义领域。《政策科
学》50(1):9-22。
- 简·金里奇 (2015)。仍未拆除? 《比较政治学中福利国家解构的遗产》PS: 政治
学与政治学48(2):279-83。
- 朱尼、莉莉娅和 Lucia Rubinelli (2015)。民粹主义与技术官僚主义之争: 政党如
何适应新主导叙事。《牛津政治博客 (Oxpol)》——牛津大学政治博客, 1月14
日。
- Giugni, Marco 和 Maria T. Grasso (2016)。《紧缩与抗议: 经济危机时期的民众抗
争》。伦敦: 劳特利奇出版社。
- 克劳斯·H·戈茨 (2014)。《时间问题: 响应性与责任性的民主政治》。《西欧政治
》37(2):379-99。
- 戈尔德, 索娜·N. (2010)。政府组建过程中的讨价还价延迟。《比较政治研究》43
(1):3-32。
- 约翰·戈尔德索普 (1987)。《战后时期之后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载于查尔斯·迈
尔 (编), 《改变的政治边界: 欧洲国家与社会、公共与私人之间平衡演变的论
文集》。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第363-408页)。
- 冈萨雷斯-罗塞蒂、阿莱杭德拉和 Patricia Ramirez (2000年)。《提高卫生改革的可
行性: 哥伦比亚案例》。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卫生部门改革倡
议第39号,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 戈登·S·伍德 (2003)。《美国革命: 一部历史》(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Hi-
story)。纽约: 现代图书馆出版社。
- 戈登·S·伍德 (1998)。《美国共和国的创建: 1776-1787》(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 教堂山。
- 彼得·古列维奇 (1978)。《第二形象的反转: 国内政治的国际渊源》。《国际组织
》32(4): 881-912。
- 格雷什科维茨, 贝拉 (2001)。《政治盟友还是政敌?》收录于亚诺什·科尔奈、
斯特凡·哈加德与罗伯特·R·考夫曼 (编), 《改革国家: 后社会主义国家的财
政与福利改革》。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第111-141页)。
- 格里默、贾斯汀和 Brandon M. Stewart (2013)。文本即数据: 政治文本自动内容
分析方法的潜力与局限。《政治分析》21(3):267-97。
- Grindle, Merilee (1977)。《权力: Expertise and the "Tecnico": Suggestions-
from a Mexican 案例研究》。《政治学杂志》39(2):399-426。
- Grossman, Gene M. 与 Elhanan Helpman (1996)。《选举竞争与特殊利益政治》。
《经济研究评论》63(2):265-86。

- Grzymala Busse、安娜和 Abby Innes (2003)。《远大前程：东中欧国内政治竞争》。《东欧政治与社会》17(1):64-73。
- Guiso, Luigi, Paola Sapienza and Luigi Zingales (2016)。蒙涅的错误？*经济政策* 31 (86) :247-97。
- Guriey, Sergei和 Ekaterina V. Zhuravskaya (2009)。《转型期的（不）幸福》。《经济展望杂志》23(2):143-68。
- Gygli、Savina、Florian Haelg、Niklas Potrafke 和 Jan- Egbert Sturm (2019)。《KOF 全球化指数——再审视》。《国际组织评论》14:543。
doi:10.1007/s11558-019-09344-2。
- Haas, Peter M. (1990)。《拯救地中海：国际环境合作的政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 Haas, Peter M. (1992a)。引言：认知共同体与国际政策协调。*国际组织* 46(1): 1-35。
- Haas, Peter M. (1992b)。禁止氯氟烃：知识共同体保护平流层臭氧的努力。*国际组织* 46(1): 187-224。
- 哈贝马斯，于尔根 (1970年)。《迈向理性社会》。波士顿：Beacon出版社。
- 尤尔根·哈贝马斯 (1989)。《作为程序的人民主权》。载于尤尔根·哈贝马斯（编），《事实与规范之间》。马萨诸塞州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第463-491页）。
- 尤尔根·哈贝马斯 (2015)。《技术官僚制的诱惑》（The Lure of Technocracy）。牛津：政治出版社（Polity Press）。
- Hagan, Joe D. (1989)。国内政治体制变革与联合国第三世界国家的投票权重重新分配，1946-84年。*国际组织* 43(3): 505-41。
- 乔·D·哈根 (1995)。《国内政治解释在外交政策分析中的应用》。载于劳拉·尼克、珍妮·A·K·海伊与帕特里克·J·哈尼（编），《外交政策分析：第二代的延续与变革》。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第117-143页）。
- 哈格曼，萨拉 (2016) 《2004-2012年欧盟理事会立法活动与投票数据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 Hagemann, Sara和 Bjorn Hoyland (2008)。欧洲委员会中的政党？*欧洲公共政策杂志* 15(8):1205-21。
- 哈格曼、萨拉、Stefanie Bailer 和 Alexander Herzog (2019)。向议会发出的信号？欧盟理事会中政府的投票权与政策声明。*共同市场研究杂志* 57(3):634-50。
- Hagemann, Sara, Sara B. Hobolt and Christopher Wratil (2017)。欧盟政府响应性：来自理事会投票的证据。*比较政治学* 50(6): 850-76。
- 哈格德、斯蒂芬与 Robert Kaufman (1995)。《民主转型的政治经济学》。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彼得·A·霍尔 (1993)。《政策范式、社会学习与国家：以英国经济政策制定为例》。*比较政治学* 35(3):275-96。
- 彼得·A·霍尔 (2013)。《经济不满的政治根源：历史视角下的当代调整问题》。载于迈尔斯·卡勒与大卫·莱克（编），《艰难时期的政治理论：大衰退的比较视角》。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第129-149页）。
- 马克·哈勒伯格 (2004)。《统一欧洲的国内预算：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到欧洲货币联盟的财政治理》。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哈勒伯格、马克、Rolf Rainer ·施特劳赫与 Jurgen Von ·哈根（2009）。《*欧洲财政治理*》。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

汉利, 肖恩 (2009)。《夏日特辑: 以一价换两位捷克总理》。《世界新闻》, 4月11日。

汉利, 肖恩 (2013)。《意外总理的意外后果? 2009-10年捷克共和国费舍尔政府》。《EUSA 第13届双年会》, 巴尔的摩。

汉利, 肖恩 (2018)。合法性与新近欧洲民主国家技术官僚政府的悖论: 捷克共和国费舍尔政府再探。

《东欧政治与社会》32(1): 78-100。

蒂姆·哈福德 (2017)。有些事还是留给技术官僚吧。《金融时报》, 3月17日。

乔治·哈维 (2009)。柏拉图《政治家》与《斐勒布斯》中的技术与善。《哲学史杂志》47(7): 1-33。

哈瑟曼, 西尔雅 (2010)。《欧洲大陆福利国家改革的政治: 艰难时期的现代化》。纽约: 剑桥大学出版社。

霍金斯, 柯克·A. (2009)。《查韦斯是民粹主义者吗? ——民粹主义话语的测量》

比较视角。《比较政治研究》42(8): 1040-67。海伊, 科林 (2007)。

《为何我们厌恶政治》。剑桥: 波利蒂出版社。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 (1979)。《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三卷: 《自由人民的政治秩序》。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布鲁斯·W·希迪 (1974)。《英国内阁大臣: 政治家在行政办公室中的角色》。伦敦: 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社。

海森伯格, 多萝西 (2005)。欧盟中的“共识”机制: 理事会中的正式与非正式决策。《欧洲政治研究杂志》44(1): 65-90。

赫里特尔, 阿德里安娜 (1999)。《欧洲民主合法性要素: 一种替代性视角》。《欧洲公共政策杂志》6(2): 269-82。

赫尔曼、瓦伦丁与约翰·波普 (1973)。西方民主国家中的少数派政府。《英国政治科学杂志》3(2): 191-212。

Hernandez, Enrique 和 Hanspeter Kriesi (2016)。《欧洲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选举影响》。《欧洲政治研究杂志》55(2): 203-24。

埃里克·赫什伯格 (2006年)。技术官僚、公民与第二代改革: 哥伦比亚安第斯地区的困境。收录于埃里克·赫什伯格与保罗·德雷克主编的《冲突中的国家与社会: 安第斯危机的比较视角》(匹兹堡: 匹兹堡大学出版社, 第134-156页)。

赫尔佐格、亚历山大和 Kenneth Benoit (2015)。《最不友好的裁决: 经济危机期间的发言者选择与政府异议表达》。《政治学杂志》77(4): 1157-1175。

Hibbing, John R. 和 Elizabeth Theiss-Morse (2002)。《隐秘民主: 美国人对政府运作方式的信念》。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Hinich, Melvin J. 和 Michael C. Munger (1997)。《分析政治学》。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霍夫曼、埃里克·O. 与 Robbin F. Laird (1985)。《技术官僚社会主义: 先进工业时代的苏联》。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 杜克大学出版社。

霍姆斯, 史蒂文 (1988)。《承诺前与民主悖论》。载于乔恩·埃尔斯特与鲁内·斯拉格斯塔德 (编), 《宪政与民主》。马萨诸塞州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第195-240页)。

- 霍斯特, 凯瑟琳 (2012)。《什么是知识统治?》。载于西门·安德森 Øyen、托内·伦德奥尔森和诺拉·Sørensen·瓦格主编的《神圣科学?》, 瓦赫宁根: 瓦赫宁根学术出版社 (第41-54页)。
- Hooghe, Liesbet与 Gary Marks (2003)。《解构中央集权国家: 路径与类型》。载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97卷第2期, 第233-243页。
- 乔纳森·霍普金 (2012)。《慢速导火索: 意大利与欧盟债务危机》。《国际观察家》47(4):35-48。
- 霍斯利、玛德琳·O.、Mikko Mattila 和 Marc Uriot (2011)。2004年欧盟扩大后欧洲理事会的投票机制: 新老成员国的比较
美国。《共同市场研究杂志》49(6): 1249-70。
- 黄海峰 (2015)。宣传作为信号传递。《比较政治学》47(4):419-44。
- Hubscher, Evelyne与 Thomas Sattler (2017)。选举风险下的财政巩固。《欧洲政治研究杂志》56(1):151-68。
- 亨特、温迪与杉山 Natasha Borges (2014)。《主体向公民的转化: Insights from Brazil's Bolsa Familia. 政治视角》12(4):829-845。
- 赫西, 杰曼 (1990)。《在前沿: 内阁日记1982-1987》。都柏林: 吉尔与麦克米伦出版社。
- 卡洛·因韦尔尼齐·阿切蒂 (2016)。《美国之选》: 今年十一月, 民粹主义者与技术官僚之争。《卫报》, 10月5日。
- 劳伦斯·R·雅各布斯与 Desmond King (2016)。《金融霸权: 金融如何赢得》。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 贾萨诺夫, 希拉 (1990)。《第五分支: 科学顾问作为政策制定者》。马萨诸塞州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 贾萨诺夫, 希拉 (2012)。《科学与公共理性》。伦敦: 劳特利奇出版社。
- 威尔·詹宁斯 (2009)。《公共温度计: 政治响应性与纠错机制——1994-2007年英国边境管控与庇护制度》。《英国期刊政治学》39(4):847-70。
- Jensen, Christian B.与 Jae- Jae Spoon (2011)。验证“政党因素”理论: 解读《京都议定书》目标达成进展。《政治研究》59(1):99-115。
- 约希姆森、贝亚特与 Sebastian Thomasius (2014)。《理想的财政部长: 如何任命财政部长以平衡预算》。《欧洲政治经济学杂志》34(C): 390-408。
- Joignant, Alfredo (2011)。《技术城的政治: 智利1990-2010年的资源、政治能力与集体领导》。《拉丁美洲研究杂志》43(3):517-46。
- 丹尼尔·斯泰德曼·琼斯 (2012)。《宇宙的主宰: 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诞生》。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卡洛斯·E·华雷斯 (1995)。《哥伦比亚经济政策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技术官僚体制与企业政府关系 (1966-1992)》。洛杉矶: 加利福尼亚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 Kaarbo, Juliet (2008)。联邦内阁决策: 制度与心理因素。《国际研究评论》10(1): 57-86。
- 卡博、朱丽叶与 Ryan K. Beasley (2008)。《走向极端: 联合内阁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外交政策分析》4(1):67-81。
- 迈尔斯·卡勒 (1990)。《正统性及其替代方案: 稳定与调整的解释性方法》。载于琼·纳尔逊 (编) 《经济危机与政策选择: 第三世界的调整政治》。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第33-61页)。

- 迈尔斯·卡勒（1992）。《外部影响、条件性与调整的政治》。载于斯蒂芬·哈格德与罗伯特·考夫曼（编），《经济调整的政治：国际约束、分配冲突与国家》。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第89-136页）。
- 安德烈亚斯·卡利瓦斯（2005）。《人民主权、民主与制宪权》。《星座》12(2): 223-44。
- 斯蒂芬·B·卡普兰（2013）。《拉丁美洲的全球化与紧缩政策》。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Kaplan, Stephen B. (2014). 《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危机与技术官僚治理》。华盛顿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
- Kaplan, Stephen B. (2017). 拉丁美洲的党派技术官僚循环. *选举研究* 45:219-29.
- Kaplan, Stephen B. (2018). 战争后的经济困境：拉丁美洲的危机与紧缩政策. *拉丁美洲研究评论* 53(1):19-37.
- 卡斯特纳、斯科特·L.与 Chad Rector (2003)。《国际监管体系、国内否决权主体与资本管制政策稳定性》。《国际研究季刊》47(1): 1-22。
- 凯特、肖恩和 Joshua A. Tucker (2019)。《我们永不改变，对吧？后危机欧洲的经济焦虑与极右认同》。《社会科学季刊》100:494-523。
- 卡茨，理查德·S. (1986)。《政党政府：理性主义概念》。见弗朗西斯·G·卡斯尔与鲁道夫·维尔登曼（编），《政党政府的愿景与现实》。佛罗伦萨：EUI 出版社；柏林：德古意特出版社（第31-71页）。
- 理查德·S·卡茨（Richard S. Katz）主编（1987年）。《政党政府：欧美经验》。柏林：德古意特出版社（De Gruyter）。
- Katz, Richard S. (2014). 人不能同时为两个主人服务：政党政治家、党员、公民与民主的委托-代理模型. *党政政治* 20(2): 183-93.
- Katz, Richard S. 和 Peter Mair (1995). 《政党组织与政党民主模式的变迁：卡特尔政党的兴起》。《党政政治》1(1):5-28. Kaufman, Robert R. 和 Joan M. Nelson（编）（2004）。《关键需求，微弱激励：拉丁美洲的社会部门改革、民主化和全球化》。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中心；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 基尔、卢克、 Suzanna Linn 和 Clayton McLaughlin·韦伯（2016）。《以应有的严肃态度对待时间》。《政治分析》24:31-41。
- 汉斯·凯尔森（2013年[1929年]）。《民主的本质与价值》。兰厄姆：罗曼与利特菲尔德出版社。
- 罗伯特·基奥汉、 Stephen Macedo 与 Andrew Moravcsik (2009)。《民主促进多边主义》。《国际组织》63(1):1-31。
- Kesgin, Baris和 Juliet Kaarbo (2010)。议会何时及如何影响外交政策：以土耳其对伊拉克的决策为例。《国际研究展望》11(1):19-36。
- Khan, Mehreen和 Szu Ping Chan (2015年) 在《每日电讯报》4月9日刊文中指出：‘欧洲央行通过救助希腊银行，成功避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违约风险。’
- 安东尼·金（2015）。《谁统治英国？》，伦敦：企鹅出版社。
- Klasnja, Marko和 Joshua A. Tucker (2013)。经济、腐败与投票：来自瑞典和摩尔多瓦的实证研究。《选举研究》32(3):536-43。

- 克莱恩, 娜奥米 (2007)。《休克主义: 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纽约: 皮卡多出版社。
- 克林, 罗伯特 (编) (1996)。《计算机化与争议: 价值冲突与社会选择》。纽约: 学术出版社。
- 科伊武梅基, Riita Ilona (2010)。《萨尔瓦多的商业、经济专家与保守党建设》。《拉丁美洲政治杂志》2(1):79-106。
- 科佩茨基、彼得、Peter Mair 和 Maria Spirova (2012)。《欧洲民主国家的政党庇护与政党治理》。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 科尔皮、沃尔特和 Joakim Palme (2003)。《紧缩与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政治与阶级政治: 1975-1995年间18个国家的福利国家衰退》。《美国政治科学评论》97(3):425-46。
- 库索基斯, 克莱奥梅尼斯·S. (1994)。《希腊共和国1974-1992年内阁决策研究》。载于迈克尔·拉弗与肯尼斯·A·谢普斯勒主编的《内阁部长与议会政府》(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第270-282页)。克里西, 汉斯彼得 (2014)。《民粹主义挑战》。《西欧政治》37(2):361-78。
- 克里西, 汉斯彼得 (2016)。《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化》。《共同市场研究杂志》第54卷 (年度综述): 32-47页。
- 克里西, 汉斯彼得 (2018)。欧元危机对民主的影响。《欧洲公共政策杂志》25(1): 59-82。
- 克鲁格, 安妮·O. (1974)。《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美国经济评论》64(3): 291-303。
- Kydland, Finn E. 和 Edward C. Prescott (1977)。规则而非自由裁量: 最优计划的不一致性。《政治经济学杂志》85(3):473-92。拉克劳, 欧内斯托 (2005)。《论民粹主义理性》。伦敦: Verso出版社。
- 拉克劳、欧内斯托与 Chantal Moufe (1985)。《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 迈向激进民主政治》。伦敦: Verso出版社。
- 布里吉德·拉凡 (2014)。《试炼时刻: 责任在欧元区日益凸显的首要地位》。《西欧政治》37(2):270-87。
- 拉凡、布里吉德与 Pierre Schlosser (2016)。《欧洲公共财政: 危机阴影下的欧盟经济治理强化》。《欧洲一体化杂志》38(3):237-49。
- Lampsias, Panagiotis K. (2001)。《Το Χρονικό Μιας Προαναγγελθείσης Ήττας》. *To Vima*。
- Landes, David (1969)。《自由的普罗米修斯: 1750年至今西欧的技术变革与工业发展》。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 克劳迪娅·兰德韦尔 (2009)。民主与技术官僚政策审议。《批判性政策研究》第3卷第3-4期: 434-43页。
- 克劳迪娅·兰德韦尔 (2010)。《话语与协调: 互动模式及其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政治哲学杂志》18(1):101-22。
- 托尔比约恩·拉尔森 (1994)。《瑞典内阁部长与议会政府》。载于迈克尔·拉弗与肯尼斯·A·谢普斯勒 (编), 《内阁部长与议会政府》。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第169-186页)。
- 哈罗德·拉斯基 (1931)。《专家的局限性》(《费边社论集》第235号)。伦敦: 费边社。
- 哈罗德·D·拉斯韦尔 (1936)。《政治: 谁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获得什么》(第版)。纽约: 麦格劳-希尔出版社。

克里斯蒂安·拉瓦尔与 Pierre Dardot (2016)。《永无止境的噩梦：新自由主义如何摧毁民主》。巴黎：发现出版社。

- 拉弗、迈克尔与肯尼斯·A·谢普斯勒（编）（1994）。《内阁大臣与议会政府》。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李、莫妮卡和 John Levi·马丁。2015年。《编码、计数与文化地图学》。《美国文化社会学杂志》3(1):1-33。
- 莱纳、托马斯与 Fabio Wasserfallen（2019）。欧元区改革中的政治冲突。《欧盟政治》20(1):45-64。
- Leloup, Lance T.与 William B. Moreland（1978）。《代理策略与行政审查：预算编制中的隐性政治》。《公共行政评论》38(3):232-39。
- 马克·伦纳德（2017）。《马克龙方法》。Project Syndicate, 5月29日。
- 丹尼尔·勒纳与 Harold Lasswell（1956）。《政策科学》。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 Levi-Faur, David（2011）。监管网络与监管机构化：迈向统一的欧洲监管空间。《欧洲公共政策杂志》18(6): 810-29。
- 刘易斯·贝克，迈克尔·S.与玛丽·斯特格迈尔（2000）。选举结果的经济决定因素。《政治学年评》3(1): 183-219。
- 李和（2001年）。技术官僚与民主转型：以中国和墨西哥为例。《国际与区域研究杂志》8(2): 67-86。
- 林德布洛姆，查尔斯·E.（1959）。《摸着石头过河的科学》。公共行政19(2):78-88。
- 林德布洛姆，查尔斯·E.（1965）。《民主的智慧》。纽约：自由出版社。
- 林德布洛姆，查尔斯·E.（1980）。《政策制定过程》。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
- 林德、约纳斯和 Yvette Peters（2018）。响应性、支持与责任：民主响应性如何促进负责任的政府。《政党政治》。doi:10.1177/1354068818763986。
- Linek, Lukas 和 Tomas Lacina（2010）。捷克共和国。《欧洲政治研究杂志》49（7-8）：939-46。
- Llamazares, Ivan与 Wladimir Gramacho（2007）。《欧洲疑虑派与欧洲热衷派：南欧公众意见分析》。《政治学报》42（2-3）:211-32。Lobo, Marina Costa与 Michael S. Lewis-Beck（2012）。《一体化假说》：欧盟如何影响经济投票。《选举研究》31(3): 522-28。
- Lobo, Marina Costa and Pedro C. Magalhaes（2011）。《回旋余地：1976-2005年间葡萄牙政党与选民中的欧洲怀疑主义》。《南欧社会与政治》16(1):81-104。
- 马丁·洛赫林（2003）。《公法的概念》。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多里安·林斯基（2017）：“我本想投反对票”：后悔脱欧的选民。《卫报》，11月25日。
- 麦基，杰里（2003）。《捍卫民主》（Democracy Defended）。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麦基，杰里（2009）。《熊彼特的领导民主》。《政治理论》37(1): 128-53。
- MacLean, Nancy（2017）。《民主的锁链：激进右翼对美国的隐秘计划的深层历史》。墨尔本：Scribe出版社。
- 马加洛尼，贝亚特丽斯（2006）。《为专制投票：墨西哥霸权政党的生存与消亡》。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Jose Magone（2003）。《南欧政治：融入欧盟》。美国康涅狄格州韦斯特波特：普雷格出版社。

- 查尔斯·迈尔（1970）。《泰勒主义与技术官僚制之间：20世纪20年代欧洲意识形态与工业生产力愿景》。《当代历史杂志》5(2):27-61。
- 彼得·梅尔（2008）。《政党政府面临的挑战》。《西欧政治》31（1-2）：211-34。
- 彼得·梅尔（2009）。《代议制政府与责任政府》。科隆：MplfG 工作论文09/8。
- 迈尔，彼得（2011）。《比尼·斯马吉诉各方：代议制政府与制度约束》。佛罗伦萨：欧洲大学研究院 EUI 工作论文/ RSCAS。
- 彼得·梅尔（2013）。《统治虚空》（英文原名： *Ruling the Void* ）。伦敦：Verso 出版社。
- 马约内，贾多梅尼科（1994）。《欧洲规制国家的兴起》。《西欧政治》17(3):77-101。
- 马约内，吉安多梅尼科（1996）。《欧洲的调控》。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
- 马约内，贾多梅尼科（1998）。《欧洲民主赤字：标准问题》。《欧洲法律杂志》4(2):5-28。
- 马约内，贾多梅尼科（2001）。《委托的两种逻辑：欧盟治理中的代理权与信托关系》。《欧盟政治》2(1): 103-22。
- 马约内，贾多梅尼科（2005）。《欧洲一体化的困境：隐秘一体化的模糊性与陷阱》。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马约内，吉安多梅尼科（2009）。《欧洲：一个渴望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欧盟五十年发展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马尔宾，迈克尔·J.（1980年）。《未当选的代表：国会现状与代议制政府的未来》。纽约：Basic Books 出版社。
- 马宁，伯纳德（1987）。论合法性与政治审议。《政治理论》15(3): 338-68。
- 马宁，伯纳德（1997）。《代议制政府的原则》。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曼恩，迈克尔（1993）。《社会权力的来源》（两卷本）。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简·曼斯布里奇（1999）。《黑人是否应代表黑人，女性是否应代表女性？一个偶然的“是”》。《政治学杂志》61(3):628-57。
- 简·曼斯布里奇（2003）。《重新思考表征》。载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97卷第4期，第515-528页。
- Maor、Moshe 与 Raanan Sulitzeanu-kenan（2016）。《响应性变革：机构对声誉威胁的产出应对》。《公共行政研究与理论杂志》26(1):31-44。
- Maor, Moshe, Sharon Gilad and Pazit Ben Nun Bloom（2013）。组织声誉、监管话语与战略沉默。《公共行政研究与理论杂志》23(3):581-608。
- 马兰戈尼、弗朗切斯科与 Luca Verzichelli（2015）。从技术官僚式解决方案到脆弱的大联盟：经济危机对议会的影响
意大利政府。《立法研究杂志》21(1):35-53。
- March、Luke 和 Cas Mudde（2005）。《激进左翼的余波：1989年后欧洲激进左翼的衰落与转型》。《比较欧洲政治》3(1):23-49。
- 马丁·马库森（2009）。《中央银行的科学化：非政治化的政治学》。载于肯尼斯·戴森与马丁·马库森（编），《欧元时代的中央银行：欧洲化、趋同与权力》。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第373-390页）。

伊莎贝拉·马雷斯（2006）。《税收、工资谈判与失业问题》。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

Markof, John 与 Veronica Montecinos（1993）。《经济学家的普遍崛起》。公共政策杂志 13(1):37-68。

马尔科夫斯基、Radosław 和 Joshua A. Tucker（2010）。欧洲怀疑主义与波兰政党兴起。《政党政治》16(4):523-48。

Martin, Lisa L.（2000）。《民主承诺：立法机构与国际合作》。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马特斯、米凯拉、Brett A. Leeds 和 Royce Carroll（2015）。领导层更替与外交政策变化：社会利益、国内制度与投票行为
联合国。《国际研究季刊》59(2):280-90。

欧文·马修斯（2016）。《超越英国脱欧：欧洲民粹主义对移民与全球化的反弹》。《新闻周刊》，6月28日。

Matthijs、Matthias 和 Mark Blyth（2017）。《特蕾莎·梅的糟糕透顶、糟糕透顶、糟糕透顶的一天：民主为何优于技术统治》。《华盛顿邮报》——Monkey Cage 专栏，10月5日。

米科·马蒂拉（2004年）。有争议的决定：欧盟部长理事会投票行为的实证分析。《欧洲政治研究杂志》43(1):29-50。

米科·马蒂拉（2009）。2004年欧盟扩大后的 Roll Call Analysis of Voting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uncil of Ministers。《欧洲政治研究杂志》48(6):840-57。

梅，肯尼斯·O.（1952）。简单多数决策的独立必要充分条件集。《Econometrica》20(4): 680-84。

麦克 Call Rosenbluth、弗朗西斯和 Ian Shapiro（2018）。《责任主体：拯救民主免于自我毁灭》。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McDonnell, Duncan 和 Marco Valbruzzi（2014）。《技术官僚领导型与技术官僚型政府的界定与分类》。《欧洲政治研究杂志》53(4): 654-71。

麦甘，安东尼（2006）。《民主的逻辑：调和平等、审议与少数群体保护》。安阿伯：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麦克尼尔，威廉·H.（1963）。《西方的崛起：人类共同体史》。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Meltner, Arnold J.（1976）。《官僚体系中的政策分析家》。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

Meny, Yves（2014）。欧盟危机管理：另一种隐秘一体化路径？《西欧政治》37(6): 1336-53。

Meny, Yves 和 Yves Surel（编）（2002）。《民主与民粹主义挑战》。伦敦：Palgrave出版社。

《Meridiana新闻》（2018年）报道：萨尔维尼就养老金问题表示：“博埃里应提高国家社会保障局的效率，不应搞政治”，10月15日。

查尔斯·E·梅里亚姆（1938）。《贵族阶层的假设》。《美国社会学杂志》43(6): 857-77。

茂诺，让（1964）。《技术官僚制：神话还是现实？》巴黎：佩约出版社。

让·梅诺（1969）。《技术官僚制》。纽约：自由出版社。

米尔斯，C. 赖特（1956）。《权力精英》。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米尔纳、海伦·V. 与 Dustin H. Tingley（2011）。谁支持全球经济参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的偏好来源。《国际组织》65(1):37-68。

菲利普·米罗夫斯基（2009）。《新自由主义的定义》。载于菲利普·米罗夫斯基与迪特·普莱韦（编），《从蒙特佩勒兰之路：新自由主义思想集体的形成》。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第417-55页）。

- Mohr, John W.与 Petko Bogdanov (2013). 引言——主题模型：其定义与重要性。《诗学》第41卷第6期:545-69.
- Momani, Bessma (200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技术官僚的招募与多元化》.全球社会19(2): 167-87.
- 蒙特西诺斯, 维罗妮卡 (1998)。《经济学家与政党政治：市场时代的智利民主》。载于米格尔·A·森特诺与帕特里西奥·席尔瓦 (编),《拉丁美洲的专家政治》。纽约: 麦克米伦出版社 (第126-141页)。
- 马里奥·蒙蒂与西尔维·古拉德 (2012)。《欧洲的民主》。巴黎: 弗拉马里翁出版社。安德鲁·莫拉夫奇克 (1993)。《欧洲共同体中的偏好与权力》: 自由主义政府间主义方法。《共同市场研究杂志》31(4): 473-524.
- 安德鲁·莫拉夫奇克 (1998)。《欧洲的选择: 从墨西哥到马斯特里赫特的社会目的与国家权力》。纽约州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 莫拉夫奇克, 安德鲁 (2002)。《欧盟合法性再评估》。《共同市场研究杂志》40(4): 603-24。
- 安德鲁·莫拉夫奇克 (2012)。《危机后的欧洲: 如何维持共同货币》。外交事务91(3):54-68.
- 摩根, 埃德蒙·S. (1988)。《发明人民: 英格兰与美国大众主权的兴起》。纽约: 诺顿出版社。
- 莫里诺、莱昂纳多和 Francesco Raniolo (2017)。《经济危机对南欧民主国家的影响》。纽约: 施普林格出版社。
- 莫罗佐夫, 叶夫根尼 (2014)。《拯救一切, 点击这里: 技术解决方案主义的愚蠢》。纽约: 公共事务出版社。
- 莫塔, 马修 (2018)。美国反智主义的动态及其政治影响。《美国政治研究》46(3): 465-98。
- Mounk, Yascha (2018)。《人民与民主: 我们的自由为何受到威胁以及如何拯救它》。剑桥, 马萨诸塞州: 哈佛大学出版社。
- 卡斯·穆德 (2004)。《民粹主义时代精神》。载于《政府与反对派》第39卷第4期, 第542-563页。
- 卡斯·穆德 (2007)。《欧洲民粹主义右翼政党》。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 卡斯·穆德 (2017) 指出, 欧盟对维克托·欧尔班的容忍已持续太久, 必须立即表明立场。《卫报》4月3日。
- Mudde, Cas 和 Cristobal R. Kaltwasser (编) (2012)。《欧洲与美洲的民粹主义》。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 穆勒, 丹尼斯·C. (1997)。《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载于丹尼斯·C.穆勒 (编),《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第1-17页)。
- Muhlbock, Monika和 Jale Tosun (2017)。对不同国家利益的响应性: 欧盟理事会关于转基因生物的投票行为。《共同市场研究杂志》56(2):385-402。
- 穆勒, 扬·维尔纳 (2011)。《民主的挑战: 二十世纪欧洲的政治思想》。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耶鲁大学出版社。
- Muller, Jan-Werner (2016)。《什么是民粹主义?》。伦敦: 企鹅出版社。
- 纳里兹尼, 凯文 (2003)。《枪支与黄油, 抑或两者皆无: 再武装政治经济学中的阶级利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97(2):203-20。
- 内尔金, 多萝西 (1975)。技术专长的政治影响。《科学社会研究》5(1):35-54。
- 纳尔逊, 琼 (1999)。《改革健康与教育: 世界银行、IDB 与复杂制度变革》。巴尔的摩: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 Nelson, Joan (2004). 《卫生部门改革的政治：跨国比较》。见 Robert R. Kaufman 和 Joan M. Nelson (编), 《关键需求, 弱激励: 拉丁美洲社会部门改革、民主化与全球化》。巴尔的摩: 伍德罗·威尔逊中心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 Neto, Octavio Amorim 和 Marina Costa ·洛博 (2009)。《葡萄牙半总统制再审视: 1976年总统在政策过程中的角色评估》
2006.政治研究 *European Jour* 37(3):309-33.
- Neto, Octavio Amorim 和 Kaare Strøm (2006)。《打破议会授权链: 欧洲民主国家的总统与无党派内阁成员》。
《英国政治学杂志》36(4):619-43。
- 《苏黎世新报》(2018年)报道, 欧元集团于11月5日敦促意大利在预算争端中作出让步。
- 埃里克·诺伊迈尔 (2003)。左翼政党力量与社团主义对环境有益吗? 经合组织国家空气污染面板分析证据。《生态经济学》45(2):203-20。
- 尼科拉伊迪斯, 卡吕普索 (2001)。结论: 超越联邦国家的联邦愿景。见 Kalypso Nicolaidis 和 Robert Howse (编), 《联邦愿景: 美国和欧盟的合法性与治理层级》, 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第439-482页。
- 古斯塔沃·诺列加 (2010)。《Indec: 一场骗局的Indima 历史》。布宜诺斯艾利斯: 南美出版社。
- Norris, P. 与 R. Inglehart (2019)。《文化反弹: 特朗普、英国脱欧与威权民粹主义》。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 北, 道格拉斯 (1990)。《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 诺西特, 亚当 (2017)。玛丽娜·勒庞在法国竞选活动中呼应特朗普的悲观民粹主义。《纽约时报》, 2月5日。
- 奥布莱恩、菲利普·J. 与 Jaqueline Rodick (1983)。《智利: 皮诺切特十年——芝加哥男孩的兴衰》。伦敦: 拉丁美洲局。
- 吉列尔莫·奥唐奈 (1973)。《现代化与官僚专制主义》(*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伯克利: 加州大学出版社。
- 吉列尔莫·A·奥唐奈 (1994)。《委托民主》。《民主杂志》5(1): 55-69。吉列尔莫·A·奥唐奈 (1996)。《拉丁美洲的贫困与不平等: 若干政治
反映凯洛格国际问题研究所 (圣母大学), 工作论文第225号。
- 经合组织 (1996年)。《经合组织就业展望》。巴黎: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经合组织 (2016年)。《社会支出数据库: 1980-2013年 SOCX》。巴黎: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奥费, 克劳斯 (1973)。《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问题》。法兰克福: 苏尔坎普出版社。奥利弗, 埃里克和温迪·拉恩。2016。特朗普民粹主义的崛起: 2016年大选中的民粹主义。《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年鉴》667(1):189-206。
- 奥珀曼、凯与 Klaus Brummer (2013)。初级伙伴对联盟政府外交政策影响的模式。《英国政治与国际关系杂志》16(4):555-71。
- 奥尔蒂斯·德·塞瓦略斯、加布里埃尔、雨果·埃萨吉雷、罗莎·玛丽亚·帕拉西奥斯与皮埃里娜·波拉洛洛 (1999) 合著的《秘鲁制度性改革中的政治经济学: 教育、卫生与养老金案例研究》, 工作论文R-3948, 由美洲开发银行 (华盛顿特区) 发布。

- 帕拉西奥斯, 马尔科 (2001)。《知即是力: 哥伦比亚经济学家案例》。载于《民粹主义者、权贵与暴力》。波哥大: 哥伦比亚行星出版社。帕内比安科, 安杰洛 (1988)。《政党: 组织与权力》。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 帕斯奎诺, 詹弗兰科与 Marco Valbruzzi (2012)。《意大利式非党派政府: 决策机制与问责制度》。《现代意大利研究杂志》17(5):612-29。
- Pastorella, Giulia (2014)。《为何要任命技术官僚来治理欧洲民主国家?》Cork: UA-CES General Conference。
- 帕斯托雷拉, 朱莉娅 (2016)。欧洲技术官僚政府: 正确理解批评。《政治研究》64 (4): 948-65。
- 佩德森, 莫根斯 (1979)。欧洲政党制度的动态: 选举波动模式的演变。《欧洲政治研究杂志》7(1):1-26。
- 罗兰·J·彭诺克 (1952)。《响应性、责任与多数决原则》。《美国政治科学评论》46(3):790-807。
- Peters, B. Guy and Anthony Barker (eds) (1993)。《Advising West European Governments》。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Peters, B. Guy与 Jon Pierre (2004)。《公务员政治化: 概念、成因与后果》。载于B.盖伊·彼得斯与琼·皮埃尔 (编), 《公务员政治化: 比较视角下的控制追求》。阿宾登: 劳特利奇出版社 (第1-13页)。
- 菲利普·佩蒂特 (2004)。《民主的去政治化》。《法学杂志》17(1):52-65。
- 菲利普斯, 安妮 (1998)。《在场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esence)。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 Pielke, Roger A. (2007)。《诚实的经纪人: 在政策与政治中理解科学》。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 罗伊·皮尔斯 (1999)。《精英与大众议题关联及责任政党代表模式》。载于沃伦·E·米勒等 (编), 《西方民主国家的政策代表》。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第9-32页)。
- 汉娜·F·皮特金 (1967)。《表征的概念》。伯克利: 加州大学出版社。
- 柏拉图 (1995)。《政治家》。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 柏拉图 (2007)。《理想国》(第二版), 李德译。伦敦: 企鹅经典。
- 柏拉图 (2008)。《普罗泰戈拉篇》。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 Plattner, Marc F. (2010)。民粹主义、多元主义与自由民主。《民主学报》21(1):81-92。
- Poblete, Mario E. (2015)。如何通过三种当前方法评估民粹主义话语。《政治意识形态杂志》20(2): 201-18。
- 乔安弗兰科·波吉 (1978)。《现代国家的发展: 社会学导论》。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 Poguntke, Thomas 和 Paul Webb (编) (2005)。《政治的总统化: 现代民主国家的比较研究》。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Pollitt, Christopher (2015)。《分权管理: 机构与“独立运作”》。托尼·博瓦尔德与埃尔克·勒夫勒 (编) 《公共管理与治理》, 伦敦: 劳特利奇出版社, 第249-264页。
- Pop, Liliana (2006)。《民主化资本主义? 罗马尼亚后共产主义转型的政治经济学 (1989-2001)》。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
- Pop-Eleches, Grigore and Joshua Tucker (2017年)。《共产主义的阴影: 历史遗产与当代政治态度》。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Popper, Karl (1945).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 柏拉图的魔咒. 伦敦: 劳特利奇出版社。

Powell, Eleanor Nef 和 Joshua A. Tucker (2014)。《后共产主义国家选举波动性再探: 新数据、新成果与新方法》。《英国期刊政治学》44(1): 123-47。

普雷滕特里斯, 吉安尼斯 (2001)。《Υπουργοί Σε Νευρική Κρίση》。《致维玛》。

普里德汉姆·格奥弗雷与 Susannah Verney (1991)。《1989-90年希腊联盟: 政党间关系与民主巩固》。《西欧政治》14(4):42-69。

普罗齐克, 奥列赫 (2005a)。东欧半总统制政体中行政内部冲突的政治学研究。《东欧政治与社会》19(2):135-60。

普罗齐克, 奥列赫 (2005b)。《半总统制下的总理身份: 宪法规范与内阁组建结果》。《欧洲政治研究杂志》44(5):721-48。

普热沃茨基, 亚当 (1985)。《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普热沃茨基, 亚当 (1991)。《民主与市场》。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亚当·普热沃茨基 (1992)。《新自由主义谬误》。《民主杂志》3(3):45-59。普热沃斯基, 亚当 (1999)。《民主的极简主义概念: 辩护》。见伊恩

沙皮罗与卡西亚诺·哈克·科尔登 (编), 《民主的价值》。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第23-55页)。

罗伯特·D·普特南 (1977)。《先进工业社会中的精英转型: 技术官僚理论的实证评估》。《比较政治研究》10(3):383-412。

Putnam, Robert D. (1988)。《外交与国内政治: 双层博弈的逻辑》。《国际组织》42(3): 427-60。

奎因、丹尼斯·P.与A. Maria Toyoda (2007)。意识形态与选民偏好作为金融全球化的决定因素。《美国政治科学杂志》51(2):344-63。

拉达埃利, 克劳迪奥·M. (1999a)。《欧盟公共政策: 专家政治何去何从?》。《欧洲公共政策杂志》6(5):757-74。

拉达埃利, 克劳迪奥·M. (1999b)。《欧盟技术官僚制》。纽约: 朗曼出版社。

拉达埃利, 克劳迪奥·M. (2003a)。《公共政策的欧洲化》。见凯文

费瑟斯通和克劳迪奥·M.拉达埃利 (编), 《欧洲化政治学》。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第27-56页)。

拉达埃利, 克劳迪奥·M. (2003b)。《欧盟中的“专业知识表征”》。载于萨宾·索鲁热 (编), 《欧盟中的表征模式》。巴黎: 阿尔马坦出版社 (第279-304页)。

Radin, Beryl A. (2013)。《超越马基雅维利: 政策分析步入中年》(第二版)。华盛顿特区: 乔治城大学出版社。

Rauh, Christian (2016)。《响应型技术官僚制? 欧盟政治化与欧盟委员会的消费者政策》。伦敦: Rowman and Littlefield (ECPR Press)。

劳尼奥, 塔皮奥 (2004)。《芬兰民主的变迁: 议会问责制强化、政党联合与外部约束削弱》。《斯堪的纳维亚政治研究》27(2):133-52。

马丁·雷德拉多 (2010)。《无保留: 对绝对权力的限制》。布宜诺斯艾利斯: 普兰塔出版社。

- 安德鲁·雷菲尔德（2009）。《再思代表制：论政治代表与民主研究中的受托人、代表及陀螺仪》。《美国政治科学评论》103(2):214-30。
- 路透社（2016年）。特朗普与英国脱欧之后，民粹主义浪潮正威胁欧洲主流社会。11月9日。
- 弗雷德里克·F·里德利（1966）。《法国技术官僚制与比较政府》。《政治研究》14(1): 34-52。
- Riker, William H. (1982). 《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抗：民主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的碰撞》。旧金山：Freeman出版社。
- Rimkute, Dovile (2018). 组织声誉与风险监管：声誉威胁对机构科研产出的影响。《公共管理》96(1): 70-83。
- 罗伯茨，阿拉斯代尔（2011）。《学科的逻辑：全球资本主义与政府架构》。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罗伯茨，玛格丽特·E.， Brandon M. Stewart， Dustin Tingley 和 Edoardo M. Airolti (2013)。《结构主题模型与应用社会科学》。论文发表于NIPS会议“神经信息处理系统进展专题研讨会：主题模型——计算、应用与评估”，湖太浩。
- 罗伯茨（Margaret E. Roberts）、 Brandon M. Stewart (Dustin Tingley) 等人 (2014)。开放式调查问卷的结构化主题模型。《美国政治科学杂志》58(4):1064-82。
- 罗德里克，丹尼（2006）。《告别华盛顿共识，迎接华盛顿困惑？——世界银行《1990年代经济增长：十年改革经验》书评》。《经济文献杂志》44(4):973-87。
- 罗哈克、达利博尔、 Sahana Kumar 和 Andreas Johansson·海诺（2017）。《煽动者的智慧：制度、腐败与对威权民粹主义者的支持》。《经济事务》37(3):382-96。
- 罗坎，施坦（1970）。《公民、选举与政党：发展进程比较研究的路径》。奥斯陆：奥斯陆大学出版社。
- Rooduijn, Matthijs 和 Teun Pauwels (2011)。民粹主义测量：两种内容分析方法的比较。《西欧政治》34(6):1272-83。
- 罗珀，史蒂文·D.（2000年）。《罗马尼亚：未完成的革命》。阿宾登：劳特利奇出版社。
- 罗桑瓦隆，皮埃尔（2011）。民主合法性：公正性、反思性与亲和性。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理查德·罗斯（1969）。《政党政府的变异性：理论与实证批判》。《政治研究》17(4):413-45。
- 罗森布鲁姆，南希·L.（2008）。《站在天使一边：对党派与党派主义的思考》。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Rothstein, Henry (2006)。风险的制度起源：风险研究的新议程。《健康、风险与社会》8(3):215-21。
- 亨利·罗斯坦、Michael Huber 和 George Gaskell (2006)。《风险殖民理论：社会与制度风险的螺旋式监管逻辑》。《经济与社会》35(1):91-112。
- 卢克·鲁班（2003）。《公务员政治化》。载于B·盖伊·彼得斯与乔恩·皮埃尔（编），《公共行政手册》。美国加州千橡市：Sage出版社（第310-320页）。
- 卢梭，让-雅克（1997年[1762年]）。《The So 特契约及其他后期政治著作》。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克里斯托瓦尔·罗维拉·卡尔特瓦瑟（2012年）。民粹主义的矛盾性：对民主的威胁与矫正。《民主化》19(2):184-208。

- Ruiz-Rufino, R. 与 Sonia Alonso (2017)。《别无选择的民主：欧元区危机期间公民对政府自主权的认知》。《欧洲政治研究杂志》56(2):320-45。
- 沃伊切赫·萨杜尔斯基 (2013)。《法院前的权利：中欧和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宪法法院研究》。多德雷赫特：克鲁维尔学术出版社。
- Safon、Maria Paula 和 Nadia Urbinati (2013)。《程序民主：平等自由的堡垒》。《政治理论》41(3):441-81。
- 萨马尼、马库斯、Jan Teorell、Stafan Kumlin 和 Bo Rothstein (编) (2010)。《QOG 政策数据集》。哥德堡大学：政府质量研究所。桑切斯-昆卡、伊格纳西奥 (2017)。从民主赤字到技术官僚秩序：欧洲危机后的辩论。《政治学年鉴》20(1):351-69。Santiso, Javier (2003)。《新兴市场的政治经济学：行动者与制度》以及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
- 桑蒂索、哈维尔和 Laurence Whitehead (2006年)。尤利西斯、塞壬与航海艺术：拉丁美洲的政治与技术理性。OECD发展中心工作论文第256号。
- Sarfatti Larson, 马加利 (1972)。《技术官僚制札记：理论、意识形态与权力问题》。《伯克利社会学杂志》17:1-34。
- 乔瓦尼·萨托里 (1968)。《表征系统》。载于《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13卷。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 (第465-474页)。
- 乔瓦尼·萨托里 (1976)。《政党与政党体系：分析框架》(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 萨托里, 乔瓦尼 (1982)。《民主理论再探》，第一部分：古典问题。新泽西州查塔姆：查塔姆出版社。
- 萨托里, 乔瓦尼 (编) (1984)。《社会科学概念：系统分析》。伦敦：Sage出版社。
- 萨托里, 乔瓦尼 (1987)。《民主理论再探》第二部分：古典议题。新泽西州查塔姆：查塔姆研究所。
- 乔瓦尼·萨托里 (1991)。《比较与误比较》。《理论政治学杂志》3(3):243-57。
- 乔瓦尼·萨托里 (2005年)。政党类型、组织与职能。《西欧政治》28(1):5-33。
- 萨尔普, 弗里茨·W. (1999)。《欧洲的治理：有效与民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埃尔默·E·沙茨施奈德 (1942)。《党派政府：美国政府的运作实录》。纽约：法拉尔与莱因哈特出版社。
- 安德烈亚斯·舍德勒 (1996)。反政治建制派政党。《政党政治》2(3): 291-312。
- 弗兰克·席默尔芬尼格 (2014)。《欧元危机中的欧洲一体化：后功能主义的局限性》。《欧洲一体化杂志》36(3): 321-37。
- Schleiter, Petra 与 Edward Morgan-Jones (2009)。欧洲的政党政府？议会制与半总统制民主国家比较。《欧洲政治研究杂志》48(5): 665-93。
- 施密特、埃里克和 Jared Cohen (2013)。《数字新时代：重塑人类、国家与商业的未来》。伦敦：企鹅出版社。
- 施密特, 斯特凡·W. (1974)。官僚作为现代化中介？哥伦比亚的客户主义。《比较政治学》6(3):425-50。
- 施密特, 苏珊娜·K. (2018)。欧洲法院与政策过程：判例法的阴影。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 施密特, 维维安·A. (2011)。技术官僚政府能民主化吗? *Telos*, 11月23日。
- 施密特, 维维安·A. (2016)。《危机时刻的规则“隐秘”重释: 欧洲央行与欧盟委员会的制度主义话语分析》。载于《*西欧政治*》第39卷第5期, 第1032-1052页。
- 施密特、维维安·A.与 Elisabetta Gualmini (2013)。意大利经济问题的政治根源: 在机会主义政治领导与务实技术官僚领导之间。《*比较欧洲政治*》11(3):360-82。
- 施耐德, 本·R. (1998)。《技术官僚制的物质基础: 拉丁美洲投资者信心与新自由主义》。载于米格尔·安赫尔·森特诺与帕特里西奥·席尔瓦 (编), 《*拉丁美洲的专家政治*》。纽约: 麦克米伦出版社 (第77-95页)。
- 米罗斯拉娃·斯霍尔滕 (2017)。《紧跟潮流! 欧盟法律的执行正向“布鲁塞尔”转移》。《*欧洲公共政策杂志*》24(9):1348-66。
- Schon, Donald A. 和 Martin Rein (1994)。框架反思: 解决棘手政策争议的路径。纽约: Basic Books出版社。
- 舒尔茨、安妮、Philipp Muller、Christian Schemer 等 (2017)。《基于三个维度的民粹主义态度测量》。《*国际民意研究杂志*》30(2):316-26。
- 约瑟夫·A·熊彼特 (1942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纽约: 哈珀出版社。
- 莱尔·斯克鲁格斯 (2006)。《社会保险的慷慨性》。《*牛津经济政策评论*》22(3): 349-64。
- 霍华德·西格尔 (1985)。《*美国文化中的技术乌托邦主义*》。雪城: 雪城大学出版社。
- Seligson, Mitchell A. (2007)。拉丁美洲民粹主义与左翼的兴起。《*民主学报*》18(3): 81-95。
- Sen, Amartya (2002)。《*理性与自由*》。剑桥, MA: 哈佛大学出版社。
- 马丁·夏皮罗 (1964年)。《*最高法院中的法律与政治: 政治法学研究*》。伊利诺伊州格伦科: 自由出版社。
- 沙皮罗、马丁与 Alex Stone·斯威特 (1994)。《欧洲新宪法政治》。《*比较政治研究*》26(4):397-420。
- 斯图尔特·希尔兹 (2012)。《反对新自由主义?》波兰的复兴民粹主义与后共产主义转型。《*第三世界季刊*》33(2):359-81。
- 爱德华·希尔 (1956)。《*秘密的折磨: 美国安全政策的背景与后果*》。伦敦: 海涅曼出版社。
- 西金克, 凯瑟琳 (1991)。《*思想与制度: 巴西与阿根廷的发展主义*》。纽约州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 爱德华多·席尔瓦 (1993)。《资本主义联盟、国家与新自由主义经济重构: 智利, 1973-1978》。《*世界政治*》45(4):526-59。
- 帕特里西奥·西尔瓦 (1991)。智利的技术官僚与政治: 从芝加哥男孩到Cieplan修道士。《*拉丁美洲研究杂志*》23(2):385-410。
- 帕特里西奥·席尔瓦 (1994)。《智利国家、公共技术官僚制与政治 (1927-1941)》。《*拉丁美洲研究公报*》13(3):281-97。
- 帕特里西奥·席尔瓦 (2008)。《*以理性之名: 智利的技术官僚与政治*》。大学公园: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
- 斯科克波尔, 西达 (1985)。《重拾国家: 当代研究中的分析策略》。见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吕舍尔和特达·斯科克波尔 (编), 《*让国家回归*》。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第3-38页)。

- 斯奈德, 杰克 (1991). 《帝国的神话: 国内政治与国际野心》. 纽约州伊萨卡: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 Lars 周日 (2010年) *政治家*. www.kolumbus.fi/taglarsson/.
- Stegmaier, Mary 和 Klara Vlachova (2011). 捷克共和国议会选举, 2010年5月. *选举研究* 30(1):238-41.
- 斯特潘, 阿尔弗雷德 (1978). 《国家与社会: 秘鲁的比较视角》.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斯蒂格勒, 乔治·J. (1971) 经济调控理论. 《贝尔经济与管理科学杂志》2(1):3-21.
- 斯特劳曼, 杰弗里·D. (1977). 《技术官僚政治的局限性》. 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 交易图书出版社.
- Strebel, Michael, Andrea, Daniel, Kubler, and Frank Marcinkowski (2019). 民主治理中输入与输出合法性的重要性: 基于四个西欧国家的人口调查实验证据. *欧洲政治研究杂志* 58: 488-513. doi:10.1111/1475-6765.12293.
- 斯特里克, 沃尔夫冈 (2014). 《购买时间: 民主资本主义的延迟危机》. 纽约: Verso Books.
- Strøm、Kaare、Wolfgang C. Muller 和 Torbjorn Bergman (2003). 《议会民主制中的授权与问责》. 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 Stuckler, David, Aaron Reeves, Rachel Loopstra, Marina Karanikolos and Martin McKee (2017). 紧缩政策与健康: 英国及欧洲的影响. *欧洲期刊公共卫生* 27(4): 18-21.
- 杉山、Natasha Borges 与 Wendy A. Hunter (2013). 《客户主义何去何从? 巴西家庭补助计划与善治》. *比较政治学* 46(1):43-62.
- Sunstein, Cass R. (2011). 人性化成本效益分析. *欧洲风险与监管杂志* 2(1):3-7.
- Swank、Duane与Hans- Georg Betz (2003). 《全球化、福利国家与西欧右翼民粹主义》. 《社会经济评论》1(2):215-45.
- 斯威德勒, 安 (1986). 《文化在行动: 符号与策略》. 《美国社会学评论》51(2):273-86.
- 塔巴奇尼克、琳达和 Barbara Fidell (2007). 《多元统计应用》(第5版). 波士顿: 培生.
- 塔尔莱亚, 西尔瓦娜 (2018). 当代社会中的权力与政策制定: 从高等教育到跨国企业路德利奇出版社
- Silvana Tarlea (2019). 中欧与东欧低技能与高技能劳动力市场均衡: 政府应扮演何种角色? *东欧政治与社会* 33(1):157-175.
- Tarlea, Silvana, Stefanie Bailer, Hanno Degner, 等 (2019). 解释政府对经济与货币联盟改革的偏好. *欧洲联盟政治* 20(1):24-44.
- Judith Teichman (1997). 《墨西哥与阿根廷: 经济改革与技术官僚决策》. 《国际发展比较研究》32(1):31-55.
- Judith Teichman (2002). 《私营部门权力与市场改革: 阿根廷经济崩溃与墨西哥政策失败的国内根源探析》. 《第三世界季刊》22(3):491-512.
- Judith Teichman (2004). 《现代与传统的融合: 智利与阿根廷的市场改革》. *比较政治学* 37(1):23-40.
- 菲利普·E·特洛克 (2006). 《专家政治判断》.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撒切尔、马克与 Alec Stone ·斯威特（2002）：《向非正式员工授权的理论与实践》

多数制机构。《西欧政治》25(1):1-22。《经济学人》（2005年）：《他的束缚解除——意大利财政部长》。9月22日。《经济学人》（2011年）：《心智如机器》。11月19日。

欧盟选举委员会（2016年4月13日a）。欧盟公投主要竞选人指定。2017年8月8日检索。 <https://www.electoralcommission.org.uk/findinformation-by-subject/elections-and-referendums/upcoming-elections-and-referendums/eu-referendum/designation-of-lead-campaigners-for-the-eu-referendum>.

欧盟选举委员会（2016年6月24日b）。欧盟公投结果。检索于2017年8月8日。 <https://www.electoralcommission.org.uk/find-information-by-subject/elections-and-referendums/upcoming-elections-and-referendums/eu-referendum/designation-of-lead-campaigners-for-the-eu-referendum>.

欧洲 Reconstruction 与 Development 银行（2016年）。《2016-2017年 EBRD 转型报告》。

Peter Thiel（2014）。《创业笔记：如何打造未来》。伦敦：企鹅出版社。

丹尼斯·F·汤普森（2010）。《代表未来世代：政治当下主义与民主托管》。载于《国际社会与政治哲学批判评论》第13卷第1期，第17-37页。

查尔斯·蒂利（1990）。《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公元990-1990年》。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

Torgerson, Douglas（1985）。政策分析中的语境取向：Harold D. Lasswell的贡献。《政策科学》18(3):241-61。

道格拉斯·托格森（1992）。《政策科学中的牧师与小丑：探究焦点的拓展》。《政策科学》25(3):225-35。

托尔努德，克劳斯（1969）。芬兰内阁组成（1917-1968）。《斯堪的纳维亚政治研究》4(4): 58-70。

托雷，卡洛斯·德拉（2013）。厄瓜多尔的技术官僚民粹主义。《民主杂志》24(3): 33-46。

托雷斯，弗朗西斯科（2013）。《欧洲货币联盟的合法性与欧洲央行在危机背景下的战略政治角色》。《欧洲一体化杂志》35(3):287-300。

托尔塔拉，皮埃尔·多梅尼科（2019，即将出版）。欧洲中央银行的政治化：它是什么，以及如何研究它？《常见市场研究杂志》。doi:10.1111/jcms.12973。

托尔塔拉，Pier Domenico 和 Pamela Pansardi（2019）。欧洲央行主席的个人魅力型领导力：基于语言的分析。《欧洲政治学杂志研究》58(1):96-116。

乔治·策贝利斯（1999）。VetoPlayersandLawProductioninParliamentaryDemocracies: 实证分析。《美国政治科学评论》93(3):591-608。

保罗·塔克（2018）。《非选举权力：中央银行与监管国家中的合法性追求》。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尼克·特恩布尔（2008）。哈罗德·拉斯韦尔的《政策科学中的问题导向》。《批判性政策研究》2(1):72-91。

尼克·特恩布尔（2018）。政策设计：复杂世界中的持久魅力及其创新思考。《公共政策与行政》33(4):357-64。

特纳，弗雷德（2006）。《从反文化到网络文化：斯图尔特·布兰德，全地球网络，和数字乌托邦主义的兴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Turner, Leigh (2008)。政治、生物伦理学与 Science Policy。《HEC 论坛》20(1): 29—47。乌尔比纳蒂, 纳迪亚 (1998)。民主与民粹主义。《星座》5(1):110—24。

- 乌尔比纳蒂, 纳迪亚 (2006)。《代议制民主: 原则与谱系》。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 乌尔比纳蒂, 纳迪亚 (2014a)。《民主的扭曲: 意见、真相与人民》(*Democracy Disfigured. Opinion, Truth, and the People*)。马萨诸塞州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 乌尔比纳蒂, 纳迪亚 (2014b)。《民粹主义现象》。芝加哥大学政治理论研讨会论文。
- 米格尔·乌鲁蒂亚 (1991)。《论哥伦比亚经济民粹主义的缺失》。载于鲁迪格·多恩布施与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主编的《拉丁美洲民粹主义的宏观经济学》(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第369-391页)。
- 马尔科·瓦尔布鲁齐 (2018)。当民粹主义者与技术官僚相遇: 意大利政府组建中的创新实践。《现代意大利研究杂志》23(4):460-80。
- 范德维尔、莱诺特与马库斯·哈弗兰 (2018a)。《面包与黄油还是面包与马戏: 欧洲学期中的政治化与欧盟委员会》。《欧盟政治》19(3):524-45。
- 范德维尔、莱诺特与马库斯·哈弗兰 (2018b)。《(去)政治化与场所选择的政治学: 欧盟金融监管与经济治理的范围界定与研究议程》《欧洲公共政策杂志》。26(9): 1395-416。
- 范德维尔、莱诺特与 Markus Haverland (2019)。《(去)政治化与场所选择的政治学: 欧盟金融监管与经济治理的范围界定与研究议程》。《欧洲公共政策杂志》26(9):1395-1416。
- Van Hauwaert、Steven和 Stijn Van Kessel. 2018. 超越抗议与不满: 民粹主义态度及议题立场对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影响的跨国分析。《欧洲政治研究杂志》57(1):68-92。
- Van Rensburg、Willem和 Brian W. Head (2017)。气候变化怀疑论: 重新思考如何回应气候科学与政策的核心批评。《SAGE Open》7(4):1-11。
- Van Roozendaal, 彼得 (1997)。西方多党民主国家的政府存续: 通过支配实现可信退出威胁的效果。《欧洲政治研究杂志》32(1):71-92。
- 瓦尔纳吉, 雷卡 (2010)。匈牙利。《欧洲政治研究杂志》49 (7-8) : 1001-8。
- 瓦鲁法基斯, 亚尼斯 (2017)。《房间里的成年人: 我与欧美深层建制的斗争》纽约: 法勒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
- Vela, Esteli, Maria Gracia Becerra, Sebastian Garcia, Pablo Roca and Gabriela Ruiz (2014)。社会技术官僚制: 社会发展与包容部技术官僚制的兴起。《政治学: 政治学杂志》9(2): 83-110。
- Verdun, Amy (2017)。欧洲中央银行的政治领导力。《欧洲一体化杂志》39(2):207-21。
- Vergara, Alberto和 Daniel Encinas (2016)。《意外的连续性: 当代秘鲁制度稳定性的解释》。《拉丁美洲研究评论》51(1):159-80。
- Verhoest、Koen, B. Guy Peters、Geert Bouckaert 和 Bram Verschuere (2004)。《组织自主权研究: 概念性综述》。《公共行政与发展》24(2): 101-18。
- Verney, Susannah 和 Anna Bosco (2013)。《平行生活: 紧缩时代的意大利与希腊》。《南欧社会与政治》18(4):397-426。
- 弗兰克·维伯特 (2007)。《非民选者的崛起: 民主与权力分立的新趋势》。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 Visser, Jelle (2013). *ICTWSS: 1960年至2012年间34个国家工会机构特征、工资设定、国家干预和社会契约数据库*. 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高级劳动研究所。
- Wadia, Pheroze (1987). 柏拉图的技艺概念. *哲学研究* 31(1): 148-58.
- 威勒斯坦, 伊曼纽尔 (1974). *《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 《十六世纪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 伯克利: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 沃尔泽, 迈克尔 (1994). *《厚与薄: 国内外的道德论辩》*. 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出版社.
- 瓦瑟法伦、法比奥、迪尔克·勒芬、兹德内克·库德纳等 (2019). 基于新数据的欧盟欧元区危机决策分析. *欧洲联盟政治* 20(1): 3-23.
- 韦伯, 马克斯 (1978 [1922]). *《经济与社会: 解释社会学纲要》*. 伯克利: 加州大学出版社.
- Weible, Christopher M. 与 Paul A. Sabatier (编) (2017). *政策过程理论* (第4版). 科罗拉多州博尔德: Westview出版社.
- 卡罗尔·H·韦斯 (1992). *《协助政府决策: 政策分析机构的职能与影响》*. 载于卡罗尔·H·韦斯主编的《政策分析机构: 协助政府决策》(*Organizations for Policy Analysis: Helping Government Think*),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纽伯里公园: Sage出版社, 第1-18页.
- 库尔特·韦兰 (1999). 拉丁美洲与东欧的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 *《比较政治学》* 31(4): 379-401.
- Weyland, Kurt (2002). *《脆弱民主国家的市场改革政治: 阿根廷、巴西、秘鲁和委内瑞拉》*.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约翰·怀尔德 (1963). 柏拉图的技艺论. 见马尔科姆·T·卡伦 (编), *教育哲学读本*. 底特律: 底特律大学出版社.
- 亚伦·维尔达夫斯基 (1964). *《预算过程的政治学》* (1964). 波士顿: 利特尔·布朗公司.
- 威廉姆斯, 康纳 (2010). 技术官僚主义与民粹主义. *Dissent*, 10月22日.
- 威廉姆斯, 马克·E. (2006). *《摆脱零和博弈: 拉丁美洲民主与技术官僚制之争》*. *政治科学季刊* 121(1): 119-39.
- 威廉姆斯, 梅丽莎·S. (1998年). *声音、信任与记忆: 边缘群体与自由主义代表制的缺陷*.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威廉姆森, 约翰 (1993). 民主与“华盛顿共识”. *世界发展* 21(8): 1329-36.
- 威廉姆森, 约翰 (1994). *《政策改革的政治经济学》*. 华盛顿特区: 国际经济研究所.
- 沃思、维尔纳、Frank Esser、Martin Wettstein 等人 (2016). *《民粹主义思想、策略与风格的吸引力: 分析的理论模型与研究设计》*. *《民粹主义政治传播》*. 苏黎世: NCCR 工作论文第88号.
- 沃达克、露丝、Brigitte Mral 和 Majid KhosraviNik (编) (2013).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 政治与话语》*. 伦敦: 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
- Wendorp, Jaap, Hans Keman and Ian Budge (2000). *48个民主国家的政党政府 (1945-1998): 构成、存续时间、人员*. 多德雷赫特: 克鲁维尔学术出版社.
- 沃林, 谢尔登 (2004). *《政治与愿景: 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与创新》* (扩展版). 普林斯顿: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 Wood, Gordon (1998). *《美国共和国的创建, 1776-1787年》*. 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 教堂山.

沃沙姆、杰夫和 Jay Gatrell (2005)。多重委托人、多重信号：委托代理关系的信号传递理论。《政策研究杂志》33(3):363-76。

Writal, Christopher和 Giulia Pastorella (2018)。《化解危机：危机如何触发技术官僚主导的政府》。《欧洲政治研究杂志》57(2):450-72。

Yılmaz, 费鲁 (2012)。右翼霸权与移民：民粹主义极右翼如何通过欧洲移民辩论实现霸权。《当代社会学》60(3):368-81。

Young, Iris M. (2000)。《包容与民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Zaidi, Salman, Asad Alam, Pradeep Mitra 和 Ramya Sundaram (2009)。满意度

《东欧及前苏联地区的生活与服务供给》。2006年《转型中的生活》调查报告中的若干洞见。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出版物。

安德烈·扎斯洛夫 (2004)。《关闭大门？奥地利与意大利移民政策中激进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影响》。《政治意识形态杂志》9(1):99-118。

Zaslove, Andrej (2008)。排斥、共同体与民粹主义政治经济学：激进右翼作为反全球化运动。《比较欧洲政治》6(2):169-89。

扎隆卡, 扬 (2006)。《欧洲作为帝国：扩大后的欧盟的本质》。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齐林斯基, 扬 (2019)。民主解体再探：年轻欧洲人对民主制度并不不满。《研究与政治》6(1)。doi:10.1177/2053168018814332。